

中国农村贫困线的构成维度研究

王荣党

Rongdang WANG

PhD

Mar, 2014

声明

CERTIFICATE OF AUTHORSHIP/ ORIGINALITY

I certify that the work in the thesis has not been previously submitted for a degree nor has been submitted as par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except as fully acknowledged in the text.

I also certify that the thesis has been written by me. Any help I have received in my research work and the preparation of the thesis itself has been acknowledged. In addition, I certify that all the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the literature used are indicated in the thesis.

Signature of Candidate Production Note:
Signature removed prior to publication.

4

鸣谢

从 2010 年 1 月至今，我有幸成为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的一名博士生，更让人庆幸的是能够师从第一导师杨径青博士和副导师冯崇义博士，有机会亲身感受西方博士教育的风格和特性。这是一段颇有收获却充满艰辛的日子，但却是我人生不可多得和厚重的学术之旅。这当中有许多铭刻在心的事件和抹不去的回忆，只能化为今天简短的鸣谢，并借此传递我内心最诚挚的感谢。

首先要感谢的是第一导师杨经青博士，从录取通知书的寄出、签证的办理、学术训练计划的安排、到今天论文的提交，每一个环节无不凝聚着他的许多辛劳。每个周的“Face to Face”总是让我兴奋不已，盼望早点到来，提前准备问题，而杨博士对每一个问题的热情解答，解开了我学术训练中的一个一个疙瘩，每次就某个主题的热烈讨论和杨博士给出的独到见解，总是使我的思路豁然开朗，课题的研究又前进了一步。这一过程使我对学术研究中常挂在嘴边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三个问题”有了全新的理解，乃至对有的“问题”的解读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感悟。这一过程使我对西方学术的严谨与规范有了更真切地体验。这一过程使我饱尝了杨博士独特而高效的指导方法以及对学生的宽厚与平等。这些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和今后努力的方向。同时要感谢我的副导师冯崇义博士对完善选题和文献阅读方向提出的宝贵指导意见。

感谢 UTS 图书馆的 Wei Cai 老师提供的耐心细致的文献检索帮组，并让我学会了 Reworks 等文献管理工具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文献调研的效率。特别要感谢人文与社会科学院梁明老师在我学习的每一阶段所提供的朋友般的帮助，还有 Liz 老师给予的帮助。从她们一丝不苟的工作状态和敬业精神，让我分享到服务第一所带来的喜悦。还要感谢文化与艺术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同事们所给的支持。

最珍贵的是在异国他乡认识了同窗好友成晓毅、苏岗、周蕴玉，你们使我艰难的求学之路平添了许多乐趣。首先要特别感谢小成有求必应式的帮助，使我在求学中碰到的许多困难，总是很快找到答案。小周的干练与爽快也帮我克服了不少困难。老苏的直爽和厚道使我受益多多。我们每次坦诚交流和热烈讨论不断地

巩固了论文中的某些观点，并避免了少走弯路。还要感谢圣童同学对论文初期提纲提出的修改意见。

感谢云南财大领导汪戎书记、熊术新校长和殷红副校长，是他们的大力支持，我才能有两度到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读博的宝贵时间。在这期间，要感谢我工作过的国际工商学院的刘尔思院长、朱文副书记和班子其他成员及同事们，更要感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的和览副处长、王智慧副处长及全处成员，是他（她）们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我得以抽出时间在悉尼潜心研读。

要特别感谢的是我的妻子梁彩云，在我两度到悉尼期间，除了工作还包揽了全部家务和接送女儿王玥上学的重担，没有她默默无闻的支持，我要完成博士论文是不可想象的。也要感谢爱女王玥，虽然在初三阶段一度学习出现了大的波动，但最终还是以理想的成绩迈进了重点中学昆八中，也使我能第二次安心到悉尼科技大学去学习。

最后要感谢国际工商学院管理与科学硕士研究生张静同学，帮我处理了部分数据的计算。

目录

声明.....	i
摘要.....	x
1 绪论.....	1
1.1 问题的背景.....	1
1.2 选题的缘由.....	3
1.2.1 严重性驱使：中国农村贫困的现状.....	3
1.2.2 责任感召：中国政府的农村反贫困历程和成效.....	5
1.2.3 问题呼唤：中国农村贫困线制定的问题所在.....	7
1.3 文献综述.....	9
1.3.1 国际的研究.....	9
1.3.2 中国的研究.....	12
1.4 研究的问题.....	18
1.5 研究的价值.....	19
1.6 内容框架.....	20
2 贫困和贫困线的度量理论.....	22
2.1 各种定义的盛宴.....	22
2.1.1 学术定义.....	22
2.1.3 数量定义.....	29
2.2 四根支柱.....	32
2.2.1 参考子群.....	34
2.2.2 绝对内核.....	35
2.2.3 价值判断.....	35
2.2.4 度量尺度.....	36
2.3 度量理论.....	36
2.3.1 贫困线理论的渊源.....	37
2.3.2 贫困线的专有理论.....	38
2.4 角色定位.....	43
2.4.4 追因角色.....	45
2.4.5 调节角色.....	46
2.5 家族成员.....	46
2.6 构造方法的归纳.....	49
2.6.1 绝对贫困线.....	49
2.6.2 相对贫困线.....	58
2.6.3 主观贫困线.....	63
2.6.4 剥夺贫困线.....	66
2.6.5 共识型贫困线.....	67
2.6.6 混合贫困线.....	68
2.7 数理和公理分析.....	69
2.7.1 贫困线的数理解释.....	70
2.7.2 贫困线度量公理.....	71

3 研究方法	73
3.1 研究方法.....	73
3.1.1 文献分析法.....	73
3.1.2 田野调查法.....	74
3.1.3 计量分析法.....	75
3.2 技术线路.....	75
4 中国农村贫困线：适应性评价	77
4.1 农村贫困线的产生与发展.....	77
4.1.1.产生过程：多种方法打造了一条线.....	77
4.1.2.变迁历程：“一二一”	79
4.2 适应性评价.....	85
4.2.1. 适应面.....	85
4.2.2. 不适应面.....	91
4.3 危害与影响.....	101
4.3.1 漏检贫困人口.....	101
4.3.2 扭曲扶贫绩效的评价.....	102
4.3.3 贫困线异化为贫困县.....	103
4.3.4 干扰扶贫政策的制定.....	105
4.3.5 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	105
4.3.6 误导国际声音.....	105
4.4 哪里出发？	106
4.4.1 视角：公平与效率.....	106
4.4.2 理论基础：一主多依（辅）理论体系.....	107
4.4.3 可比性：四个可比.....	107
4.4.4 成本与效益：三性.....	108
4.4.5 内生式：尊重和倾听穷人的声音.....	108
4.4.6 调整的机制体制：制度化和公开化.....	108
5 优化贫困线的哲学基础：效率与公平的再度抉择	110
5.1 效率与公平的社会诉求.....	110
5.2 反贫困有市场机会吗？	115
5.3 效率与公平的中国践行.....	117
5.4 效率与公平的反贫困选择.....	121
6 贫困线构成维度的选择.....	126
6.1 贫困维度=贫困线维度吗？	126
6.2 可接受的标准.....	128
6.2.1 社会认可的最低基本生活水平.....	130
6.2.2 地区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	131
6.2.3 贫困人群的基本需求.....	131
6.2.4 国家的财政能力和反贫困战略目标.....	132
6.2.5 物价水平.....	132
6.2.6 国际贫困标准.....	132
6.3 经济发展维度.....	134

6.3.1 维度的依据考量.....	134
6.3.2 指标的选择.....	137
6.4 贫困人群需求维度.....	137
6.4.1 维度来源的考量.....	137
6.4.2 指标的选择.....	142
6.5 国家资源与战略维度.....	143
6.5.1 维度来源的考量.....	143
6.5.2 指标的选择.....	144
6.6 物价水平维度.....	145
6.6.1 维度来源的考量.....	145
6.6.2 指标的选择.....	147
6.7 国际反贫困维度.....	147
6.7.1 维度来源的考量.....	147
6.7.2 指标的选择.....	149
6.8 来自田野的选择.....	149
7 维度和指标的 Shapley 优选与实证.....	155
7.1 Shapley 方法的原理.....	155
7.2 模型变量的选取.....	156
7.3 数据来源与清洁.....	158
7.3.1 数据的来源.....	158
7.3.2 缺失数据的处理.....	159
7.3.3 数据的清洁.....	160
7.3.4 分析工具.....	163
7.4 模型的建立.....	163
7.5 实证分析.....	163
7.6 回归比较.....	166
7.6.1 回归值与真实值的比对.....	166
7.6.2 模型优化.....	167
7.7 结果的政策含义.....	171
8 结论和政策建议.....	174
8.1 主要结论.....	174
8.2 政策建议.....	176
8.2.1 优化贫困线的三个立足点.....	176
8.2.2 具体政策建议.....	179
8.3 局限性和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180
附录.....	182
1. 《中国农村贫困线的适应性调查》问卷 A.....	182
2. 《中国农村贫困线的适应性调查》问卷 B.....	187
参考文献.....	191

图目录

图 2-2	马丁法的几何解析.....	53
图 2-3	主观贫困线的几何解释	64
图 3-1	农村贫困线的构成维度研究的技术路线.....	76
图 4-1	中国财政扶贫资金增长情况（1986-2009）	88
图 4-2	扣除物价影响的贫困线	97
图 4-3	中国农村贫困线与 CPI 的变化比较.....	98
图 4-5	贫困线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	99
图 4-5	中国农村贫困线与国际贫困线的比较	99
图 4-6	贫困线优化的线路图.....	109
图 5-1	收入再分配会损失经济效率	124
图 6-1	维度的来源.....	129
图 6-2	贫困线维度构架	133
图 6-3	马斯诺的需求层次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139
图 6-4	农村贫困线与农村 CPI.....	146
图 7-1	6 个变量残差图	165
图 7-2	5 个变量残差图	169

表目录

表 1-1	贫困线低于一天 1 美元的国家.....	8
表 2-1	学术定义比较.....	23
表 2-2	政策定义比较.....	28
表 2-3	六种贫困线和贫困率的定义.....	30
表 2-4	贫困线的要素比较.....	33
表 2-5	贫困线分类方法比较.....	47
表 2-6	全球贫困状况.....	55
表 2-7	绝对贫困线的方法比较.....	57
表 2-8	相对贫困线的方法比较.....	61
表 2-9	六种主要贫困线方法的比较.....	68
表 3-1	各数据库的主要检索任务.....	73
表 3-2	田野调查样本结构和分布.....	75
表 4-1	2000—2005 年中国贫困标准比较.....	79
表 4-2	中国农村贫困线调整差异的比较.....	83
表 4-3	中国农村历年贫困线.....	84
表 4-4	中国农村贫困线发展阶段对比.....	87
表 4-5	2010 年世界贫困人口（用 2005 年 PPP 和 1.25 美元/天贫困线统计）.....	89
表 4-6	世界分地区贫困人口比例（2005 年 PPP 和 1.25 美元/天）.....	89
表 4-7	世界分地区贫困人口情况（2005 年 PPP 和 1.25 美元/天）.....	90
表 4-8	中国农村历年贫困线增幅比较.....	96
表 4-9	2000—2007 年调整贫困线后的比较.....	101
表 4-10	中国扶贫瞄准区域比较.....	104
表 6-1	2000—2004 年 7 个发达国家个人贫困线.....	135
表 6-2	7 个发达国家贫困线占人均 GDP 的比重（%）.....	135
表 6-3	中国农村贫困线占 GDP 的比重（%）.....	136
表 6-4	户主教育程度与贫困状况（%）.....	141
表 6-5	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与财政总收入、总支出的对比情况表（单位：亿元）	144
表 6-6	中国农村贫困线的国际比较.....	148
表 6-7	三个主体对现行贫困线的评价.....	150
表 6-8	贫困农村日常生活支出排序.....	151
表 6-9	贫困线纳入因素比较.....	152
表 6-10	贫困线衡量指标的选择.....	153
表 6-11	贫困户认为最能反映贫困状况的指标.....	153
表 6-12	维度和指标的小结.....	154
表 7-1	贫困线维度和指标初选.....	156
表 7-2	数据的来源渠道.....	158
表 7-3	1984—2010 年中国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	160
表 7-4	变量的统计描述.....	160
表 7-5	变量的 ADF 检验.....	161

表 7-6	8 个变量统计检验	163
表 7-7	6 个变量统计检验	164
表 7-8	历年贫困线的估计值 A.....	166
表 7-9	5 个变量统计检验	167
表 7-10	历年贫困线的估计值 B.....	169
表 7-11	贫困线维度和指标的终选	170

摘要

反贫困的基本前提是识别穷人。以往中国农村贫困线研究的焦点是“如何制定贫困线”，却忽略了一个基础性和前瞻性的问题——“贫困线应由哪些维度构成”。本课题综合应用文献分析、田野调查及计量分析三种方法，研究发现，它的构成维度是客观存在、可构建并转化为政策的。其最优维度是四个，社会认可生活标准、贫困人群需求、国家资源和战略及国际反贫困。而一般构成则增加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为 6 维度。这是一种制定贫困线的新方法。

Abstract

The basic and precondition of anti-poverty is to identify the poor. The formal research about Chinese rural poverty mainly focused on “how to draw poverty line”. However, neglected a basic and prospective issue: “what are the dimensions which consist of poverty line?” This research project synthesizes three research methods, namely: document analysis, field research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We find out that, the constitution dimension of poverty line is exist objectively; it is constructable and can be transfered into the relevant policies as well. There are four optimal dimensions: living standard recognized by the society; the need of the poor population; national resources and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anti-poverty. There are six dimensions for the general constitution, plu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ice level. This is a new way to draw poverty line.

1 绪论

1.1 问题的背景

贫困是人类有史以来面临较为广泛的社会问题之一，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著名的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在谈到研究贫困问题的重要性时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倡议：“我衷恳地希望经济学家们在构筑自己的理论大厦时不要忘记给贫困问题留点地位”^①。众多的数据表明：世界的贫困在亚洲，亚洲的贫困在印中，中国的贫困在农村，农村的贫困在西部。毫无疑问，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缓解过程和速度左右着中国整体的反贫困绩效，也会对世界千年发展目标（MDGs）产生影响。实践证明中国的反贫困对世界具有重要的牵引性。但是众多的国际组织和中国学者均认为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困线普遍偏低^②，如果稍微提高农村贫困标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将显著膨胀，更不用说现实中国农村依然庞大的贫困人口的客观事实。如果按 2009 年新实施人均纯收入 1196 元的扶贫标准计算，将有 4007 万人成为新的扶贫工作对象^③。所以，贫困线（Poverty line）对于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具有“门槛效应”，伴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何有效地识别出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将是新阶段（2011—2020）反贫困工作的基础工程。本研究仅限于对农村贫困的“门槛”——贫困线。

度量贫困有多种方法和指标，但贫困线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乃至国际组织识别贫困人口最常用的方法和工具。贫困线既是穷人和非穷人的“分水岭”，也是评价反贫困绩效的重要尺度。它对贫困人口有很强的敏感性^④。如果以布什（Booth, 1889）研究英国伦敦的贫困时提出的第一条贫困线——绝对贫困线的时间算起，贫困线的研究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这上百年的时间

^① [美]西奥多·W·舒尔茨. 论人力资本投资[M]. 北京:北京经济出版社, 1990:67.

^② 此观点的更多论述参见陈少华、马丁·瑞沃林（2008）；尤努斯（2010）；盛来运（2000）；林毅夫（2002）；刘玉森（2003）；李芝兰（2005）；萧灼基（2005）；刘纯彬（2006）；李静，杨国涛，孟令杰（2006）；王荣党（2006）；骆祚炎（2006）；王萍萍（2007）；姚金海（2007）；郑建平，刘兴武（2007）；郭佩霞（2007）；陈见影，王哲（2008）；王增文（2009）；陈明远（2009）；王振军，马利邦（2009）；刘娟（2010）；冯瑛，陈建东，朱悦衢（2010）；张全红，张建华（2010）；田飞（2010）；顾昕（2011）。

^③ 人民日报评论员. 实施 1196 元新扶贫标准新在哪?[N]. 2009-03-20(01).

^④ 更多的论述详见阿特金森（Atkinson, 1993）；阿尔柯克（Alcok, 1993）；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 1976）。

里，贫困线的研究总是植根于贫困的研究，并在贫困线制定方法的研究上累积了丰富的成果，产生了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这两种经典的方法。后来，为反映贫困者的需求又有了主观贫困线。这些成果的研究焦点是“如何制定贫困线”，即使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些方法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也是带有前瞻性的问题，即“贫困线由什么构成”的问题，或者说，“贫困线应由哪些维度来构建”。因为贫困线的不同虽然有制定方法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产生于构成内容的不同，换句话说前者的影响是甚微的和表层的，后者的才是巨大的和內生的。只有构成维度和内容相同的贫困线才有共同对比的基础，也才能为贫困线的调整和完善找到一个客观的依据。

从实践方面看，反贫困的前提条件是合理地界定贫困并确定贫困线。回首中国的反贫困历程，无论反贫困的方式如何变化，从由以区域为主的瞄准机制整县推进到整村推进，再到扶贫到户，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先决条件或者说基本问题，即首先必须弄清楚“谁是穷人”，而后才能确定“扶谁”。不过它确实是一条难划的线，涉及大量技术性的问题与价值判断。虽然国际上已经有不少成熟的办法，也有国际贫困线，但将它完整地引入中国，要么有的数据要求太高，要么有的理论根据模糊，表现出一定的“水土不服”。特别是世界银行集团制定的国际贫困线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直接把它作为国家贫困线，更多地是把它作为一种统计和监测功能被人们认同。在中国这一领域的研究尚不令人满意，更多的成果是对国外贫困线制定方法的介绍和验证，而对中国贫困线到底应该“如何制定”，特别是“应该考虑哪些必不可少的因素”是一个薄弱环节。所以，贫困线制定在中国既是一个理论课题，也是一个实践课题。

中国农村贫困线是用世行的马丁法改进后形成的，从产生到现在是一个“一条线管全国”的现象。这条线是国家统计局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设定的，正如周彬彬所言，“1986 年开始执行的‘划分标准’，并没有一个科学的定义，也没有进行过最小基本需求的测算。我国的“官方标准”不是一个贫困标准而是一个扶贫标准，是一个由此确定谁能得到政府补贴的标准，具有明显的“安抚性质”

①。按此估计的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已经从 1978 年的 2.5 亿下降到 2007 年的 1478 万，贫困发生率从 31.6% 下降到 2%^②。虽然这种“一条线定乾坤”的贫困度量方法对中国 30 余年反贫困成绩的取得和改写全球反贫困的历史功不可没，但随着贫困人口分布和扶贫瞄准机制的变化以及近年来不断调整贫困线的绝对标准，人们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两千多块钱是按什么标准定出来的？”农村贫困线的适应性越来越受到了质疑。贫困线是否真实和恰当地覆盖了贫困人群，反映了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是否能继续有效地识别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农村贫困，以及是否适应 2011-2020 年农村反贫困战略的需要？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2 选题的缘由

1.2.1 严重性驱使：中国农村贫困的现状

在当今世界随机选择一个穷人，他很可能就是一个生活和劳作在农村的农民。虽然对贫困数据存在争议，但最新的研究表明世界 76% 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其比例远远高于生活在农村的人口比率（58%）^③。中国也不例外，无论是按世界银行的收入贫困线还是按其消费贫困线来衡量，99% 的中国贫困人口都主要来自于或生活在农村地区（收入线 99.2% 和消费线 99.4%），远远高于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 72.5% 的比率。城市贫困人口不足 1%（0.8% 和 0.6%）。即便像很多国家的住户统计那样，扣除农民工人数，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仍然占总贫困人口的 90%^④。这样高的农村贫困人口比率无疑是值得高度关注的。

农村是中国贫困人口的主要集中地，所以，中国官方从 2000 年开始建立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持续监测机制，最近的农村贫困监测数据也显示，2010 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 2688 万人，贫困发生率为 2.8%。但 2011 年 11 月中国政府颁布新的反

①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外贫困研究文献译丛第一册[M]. 北京: 改革出版社, 1993: 4.

② 汪三贵, Albert Park.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估计与瞄准问题[J]. 贵州社会科学, 2010, (02): 68.

③ Steffen Dercon. 农村贫困: 新背景下的老问题[M]//左常升. 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3:15.

④ 世界银行. 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 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EB/OL]. (2009-3-21)<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a>. p45.

贫困规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随即大幅度调整了扶贫标准，将原有贫困线从 2010 年的 1274 元调整至 2300 元（2010 年不变价），相应农村贫困人口立马从 2688 万人增至 1.28 亿人，贫困发生率也由 2010 年的 2.8% 跃升至 19.1%^①。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又回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水平（1985 年农村贫困人口 1.25 亿）。

城市贫困问题是伴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企业的下岗职工日益增多而产生的新问题。虽然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还没有制定和公布城市贫困线，但有关方面利用与中国官方农村贫困线可比的城镇贫困线做出的估计表明，与同期的农村贫困人口比较，城市贫困水平是微不足道的^②。如 1998 年中国官方估计的城镇失业人口 570 万人，到 2001 年上升到 700 万人，2002 年亚洲开发银行（ADB）的估计数是 1500 万人^③，这一数据被众多的研究者所接受。到了 2010 年底中国民政部公布的城市低保对象（贫困人口）为 2310.5 万人。同时，城市的下岗工人的家庭是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最低收入救助的，比起基本靠自力更生的农村贫困人口来说，城市的贫困可以说是续发性贫困，而农村的贫困是原发性的贫困。换句话说，中国农村的贫困是最厚重、最面广的贫困。

最有力的证据来自世界银行，2013 年 4 月 18 日世界银行发布的用 1.25 美元/天的新国际贫困线（2005 年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新贫困人口，并将全球贫困数据更新到 2010 年。中国仅更新到 2009 年，该年中国总贫困人口 1.571 亿人，贫困发生率为 11.80%，比世界的平均贫困发生率低 8.83 个百分点。其中农村贫困人口 1.534 亿人，贫困发生率为 20.57%，与此同时，城市的贫困人口仅有 375 万人，贫困发生率仅为 0.64%，不足 1%^④。农村贫困人口是城市的 40.9 倍，贫困发生率是城市的 32.1 倍。所以无论从贫困人口的总量，还是从贫困发生率来看，中国的贫困人口几乎全部集中在农村。中国农村贫困已经成为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建成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面前，必须逾越的一道门槛。从而，农村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反贫困的主战场。

^① 陈宗胜，沈扬扬，周云波.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绝对与相对变动[J].管理世界，2013，（01）:77.

^② 世界银行.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EB/OL]. (2009-3-21)<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a>. 概要 v.

^③ 王国良.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04.

^④ 世界银行[DB/OL]. (2013-4-18)<http://iresearch.worldbank.org/PovcalNet/index.htm>.

1.2.2 责任感召：中国政府的农村反贫困历程和成效

中国的贫困主要集中于农村，所以中国的反贫困也是从农村开始的，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极为重视农村的反贫困工作，从而也成为最大的反贫困主体，并凝集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模式。这种模式不断持续深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反贫困成果。根据中国官方的估计，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规模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人，贫困发生率也由30.7%降到2007年1.6%（国家统计局，2008）。世界银行称赞道，如此众多的人口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摆脱贫困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没有中国的扶贫努力，20世纪最后20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数量将不会减少^①。

这一历史进程可以用“五个阶段”和“三个规划”来概括。

1. 体制改革推到扶贫阶段（1978—1985）

以家庭联产承包制、农产品价格逐步放开和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为主的多项改革政策，构成了这一阶段中国农村反贫困的主要动力，从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减缓贫困最为显著的时期。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1985年的1.25亿人，相应的贫困发生率由30.7%下降到14.8%，年平均减少贫困人口1786万人。

2. 区域性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3）

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1986年中国政府成立了负责扶贫的专门机构，标志着中国开始了政府主导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农村贫困人口从1.25亿人减少到8000万人，相应的贫困发生率由14.8%下降到8.7%，平均每年减少640万人。

3. 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

这一阶段最突出的工作是，1994年4月中国制定了第一个扶贫规划——《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目标是到2000年底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到2000年底，基本实现了这一计划的目标，使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从8000万人锐减到3209人，贫困发生率降到3.5%。

^① 世界银行.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EB/OL]. (2009-3-21)<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a.P4>.

4. 整村推进阶段（2001—2010）

这一阶段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将中国农村的扶贫瞄准机制由县级转移到村级，确定了 148051 个贫困村。其核心思想体现在 2001 年制定并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中，并对农村扶贫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重新确定了 592 个扶贫工作重点县，以贫困村为基本瞄准单位，强调科技、教育、文化和卫生扶贫，推行参与式村级扶贫开发规划等^①。这些政策使得在 2007 年中国贫困线合并之前，农村贫困人口下降到 1479 万人，相应的贫困发生率从 3.5% 降低到 1.6%。

5. 连片特困区开发阶段（2011—2020）

2011 年制定了中国第三个反贫困规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确定了 14 个连片特困地区，并把它作为中国未来十年反贫困的主战场。提出了“两不愁、三保障”的扶贫总目标，实行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有效衔接的扶贫方针。为此，2011 年 11 月中国政府将农村贫困线由 2009 年 1196 元提高到 2300 元，提高了 92%，相应的贫困人口由 2009 年的 3597 万人攀升到 1.28 亿人，贫困发生率也由 3.8% 上升到 19.1%，中国又一次进入了扶贫的攻坚阶段。

如上所述，尽管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农村扶贫，但是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或者至少和政策的力度不成正比。问题出在哪里呢？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以为农村贫困问题没能得到有效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贫困线制定的问题。

世界银行 2009 年在对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评估报告中也支持这一观点。尽管中国在区域和全球的减贫进程中都处于中心地位，但鉴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按照国际贫困线衡量，中国是仅次于印度的世界第二大贫困人口国。2005 年直接问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仍然有 2.54 亿人口每天的花费低于 1.25 美元（按 2005 年购买力平价）。这样的贫困人口数量与中国官方公布的 1500 万不一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官方贫困线标准（2007 年为人均每年 785 元，或

^① 王国良.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5:65.

者说，按照 2005 国际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平均每天 57 美分) 偏低造成的^①。所以，贫困线到底如何制定是一个关乎反贫困全局的大事，怎么制定才能最客观和准确地反映中国农村贫困的现实和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是一个摆在研究者和政策层面最重要的课题。

1.2.3 问题呼唤：中国农村贫困线制定的问题所在

尽管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制定的贫困线，在过去几个阶段的反贫困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随着中国的反贫困进入攻坚阶段，隐藏在制定中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1.食物挂帅

中国农村扶贫的政策目标定位一直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使用的贫困线是一条绝对贫困线，它是用基本需求法根据贫困群体的基本生存所需的最低营养标准制定的。食物支出占到贫困线的 85%，远远高于恩格尔系数 60% 的国际“赤贫”标准，极度地打压了合理的非食物需求空间。这是农村返贫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2.无空间和价格差异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饮食习惯和生活水平差异较大，用一条统一的贫困线去衡量中国千差万别的农村贫困人口，难免有些牵强。

3.指标单一

中国农村贫困线使用的唯一收入指标是农民人均纯收入。虽然该指标资料易于取得，但即使非常贫困的人，其基本需求性的支出是硬性的，同时，支出更能有效地衡量贫困家庭节俭到不能再节俭的消费，且比收入指标更为稳定。所以国际上通常采用消费指标来制定贫困线。另外，一些贫困人口不可或缺的健康、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等非货币性指标也被排除在外。

4.国际剪刀差较大

^① 世界银行.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EB/OL]. (2009-3-21)<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a.P15>.

2004 世界银行对有官方贫困线的国家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有 11 个国家的贫困线低于一天 1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中国位列其中。从贫困发生率来看，用国家标准衡量较高的是——赞比亚和冈比亚，两国均超过 50%，最低的是中国，仅为 4.6%；若采用世界银行的国际贫困线衡量，有 7 个国家的贫困发生率高于 50%，最高的赞比亚，达到 75.8%，最低的还是中国，仅为 16.6%。若结合起来看，国家标准较为接近世界银行标准的是 3 个国家——冈比亚、赞比亚和贝宁，均在 93%以上，中国是远离世界银行标准最大的国家，仅为世界银行标准的 27.7%。这样，中国是这 11 个国家中国民收入水平最高，但贫困线标准最低的国家，形成了人均国民收入与贫困线之间巨大的剪刀差。而其他国家多为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都远远落后于中国，这就隐含中国农村贫困线的提高仍有较大空间。（见表 1-1）。

表 1-1 贫困线低于一天 1 美元的国家

序号	国家	贫困发生率%		两者之比 (%)	人均国民收入	
		国家标准	一天 1 美元		数值	排位
全球			19		6329	
1	贝宁	29	30.9	93.9	450	174
2	布隆迪	36.4	54.6	66.7	90	208
3	中国	4.6	16.6	27.7	1290	129
4	冈比亚	57.6	59.3	97.1	280	190
5	加纳	39.5	44.8	88.2	380	182
6	印度	28.6	34.7	82.4	620	159
7	马里	63.8	72.3	88.2	330	184
8	尼日利亚	34.1	70.8	48.2	430	175
9	坦桑尼亚	35.7	57.8	61.8	320	185
10	赞比亚	72.9	75.8	96.2	400	178
11	津巴布韦	34.9	56.1	62.2	620	159

资料来源：李文，李芸. 中国农村贫困若干问题研究[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61.

总之，中国农村贫困线是一个低水平、单维度和狭义的贫困线，满足这一标准的贫困户的实际生活水平是很低的，甚至达不到最低营养需求。产生以上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没有关心贫困线的制定维度，更没有从方法和技术层面思考如何将这些维度便捷和有效地纳入到贫困线的制定中，并使其成为贫困群体必不可少的需求构件。

1.3 文献综述

1.3.1 国际的研究

自英国的布思（1889）和朗特里（Rowntree，1901）开启贫困度量研究的先河以来^①。贫困线的研究在西方贫困度量的研究成果中可以说汗牛充栋，并集中体现在贫困线理论、贫困线的构造方法和贫困线度量公理三个方面^②，但对中国农村贫困线的研究就显得凤毛麟角了。不过这些相对稀少的成果，还是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

一、贫困线水平的研究

国际上对中国农村贫困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国际组织和少部分学者，并且这些成果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是，贫困线的构成维度没有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的马丁·瑞沃琳（Martin Ravallion）是研究中国贫困的忠诚者和大成者，无论对中国农村贫困还是城市贫困、也无论是贫困的识别还是贫困的分解，甚至无论是扶贫理论还是项目推动，他几乎都涉猎过，但就没有对农村贫困线的构成维度进行研究。他在2004年与陈少华合作的《中国减贫工作取得不平衡的进展》一文中对中国的农村贫困线进行了评价，在他看来，旧标准看来已经过时，主要原因是两个：一是标准过低，二是忽略了不同地区生活费用的差别（2004新的农村贫困线为850元/年）。^③。Ravallion 和 Chen

^① [印]阿玛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M]. 王宇，王文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6.

^② 这将在第二章进行介绍，这里仅对国际机构和学者关于中国农村贫困线的研究进行述评。

^③ Martin Ravallion, 陈少华.中国减贫工作取得不平衡的进展[R].世界银行,http://econ.worldbank.org.

(2004)，以及 Meng, Gregory 和 Wang (2005) 都对分省的食品贫困线做过测算，两项研究发现，现在的中国农村贫困线在满足当前食品和非食品的基本成本需要方面或许不足。Ravallion and Chen 还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合作设计了一条中国农村贫困线，即按 2002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每人每年 850 元的贫困线。而最厚实的成果是 2009 年与陈少华合著的《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早先的设想更贫困，但反贫困斗争依然成功》，采用 2005 年的购买力平价方法，将国际贫困线确定为日均生活费 1.25 美元，用此匡算的全球贫困人口为 14 亿人。该书特别对两个贫困大国印度和中国的进行了国别分析，指出中国和印度所采用的贫困线接近 1 美元（2005 年价格）。^①说明中印两国的贫困线标准依然很低。

当然，真正对中国反贫困和农村贫困线进行全面分析的力作是，2009 年世界银行（WB）《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的报告。按人均日消费 1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计算，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所占的比例从 1981 年的 65% 下降到 2004 年的 10%，使 5 亿多人摆脱了贫困，成就令人称羡。同时也尖锐地指出中国官方贫困线的三个严重缺陷，一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贫困线标准相比，中国官方的贫困线标准（按 1993 购买力平价计算，合一天 71 美分，若以 2005 年的 PPP 美元计算，仅相当于每人每天 57 美分）相对较低。二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相对于不断上升的收入和贫困人群的期望来讲，中国官方贫困线似乎也过低。三是中国的贫困线或许没有包括食品之外的必需品。为此，在为中国政府开列的扶贫的主要优先事项中，第一项就是建议中国目前需要考虑采用一个更高的贫困线来识别和瞄准贫困人口。^②所以，中国贫困线偏低是国际组织和学者的普遍共识，如何提高中国农村贫困线是中国持续反贫困的第一要务。

二、贫困线方法的研究

Simon Appleton 与夏庆杰、宋丽娜（2010）在研究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时测定了三种国际贫困线，结果发现，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

^① Martin Ravallion, 陈少华. 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早先的设想更贫困，但反贫困斗争依然成功[DB/OL]. (2008-9-16) <http://econ.worldbank.org/povcalnet>.

^② 世界银行. 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EB/OL]. (2009-3-21) <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a.P15-19>.

在哪里，在 1988—2002 年中国农村贫困都在显著下降。这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开发计划署（UNDP）等国际组织的观点类似，如果采用高的农村贫困线，中国的反贫困绩效将更为显著。

主观贫困线法（SPL）上世纪 70 年代首先在欧洲发达国家中使用，这一方法推广到中国的研究也极具特色。世界银行利用中国统计局 2004 年城镇家庭的短表调查的数据，分别测算了中国城市和农村的主观贫困线。结果是 2003 年的城市主观贫困线是人均每年 4147 元，而农村的主观贫困线为人均每年 2935 元，两者均相当于中国官方贫困线的数倍^①。相反的观点是 Gustafsson 与岳希明合作（2006）利用主观贫困线法开展了中国农村居民对于贫困的理解所作的研究，他们通过 22 个省份的农村调查数据推导出推导出一条 SPL 贫困线。研究发现，SPL 贫困线与中国统计局的农村低收入线（高于农村贫困线）非常接近^②。笔者赞成世界银行的观点。Bishop, Luo 和 Pan（2006）利用 SPL 贫困线方法对中国沿海、中部、东北和西北的贫困状况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结果发现，1988 年主要地区之间的贫困差距很小，其中东北地区的贫困率最高；到 1995 年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贫困率显著降低而中部地区和西北地区的贫困率没有发生明显的下降。这说明主观贫困线方法在中国的应用，虽有空间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探索。

Albert Park 和汪三贵（2010）研究发现，中国的农村扶贫在对象的选择和瞄准方面还存在相当大的问题。中国需要改善贫困统计方法，建立一个统一的贫困人口的识别系统和瞄准机制。这可能代表了西方学者和国际研究机构的普遍观点，即中国应该寻求更为科学的贫困线制定方法。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国际上对中国农村贫困线水平的判断，还是对中国农村贫困线制定方法的研究，都表明了一个事实，中国农村贫困线偏低并应该提高。但如何提高，采用什么方法提高，特别是贫困人群的哪些基本需求应该成为贫困线制定的中心内容，并没有引起西方学者和国际组织的关注。

^① 世界银行.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EB/OL]. (2009-3-21)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a.P18.

^② Gustafsson, Ximing Yue. Rural People's Perception of Poverty in China[R]. IZA Discussion Paper No.2486, 2006.

1.3.2 中国的研究

国内对贫困线的研究起步较晚，开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较早的一篇相关度较高的论文是罗国梁译自〔荷兰〕伯纳德·范普拉格等著的《贫困线的定义及其计量方法》（1983），中国学者直接的成果是巫继学、王建生合著的《贫困线以下的生活状态是绝对贫困化的社会表现之一》（1985）。以此为限，回顾至今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其逻辑主线是有选择性地传播西方贫困线的研究成果和探索部分方法在中国的应用，从成果的层次上主要表现为介绍型和方法探讨型，现择其重点述评如下。

一、贫困线度量理论：两线推进

中国学者对贫困线理论的研究是沿着两条线推进的：一条是介绍西方的贫困线理论；另一条是探讨建立中国本土化的贫困线理论。前者是主要形式，产生了很多成果，几乎形成了一种模式，即大凡对中国的贫困线进行研究都要从介绍西方的贫困线理论开始。但这方面也不乏有一些极具奠基性和总结性的成果。如开启中国了解西方贫困度量理论之门的《走出贫困的选择》（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0—1992）和《国外贫困研究文献译丛》（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丛书；较早也是较为全面介绍西方三大贫困线理论：客观相对贫困标准、客观绝对贫困标准和主观贫困标准（童星、林闽钢，1994）；对国别贫困线理论的介绍当属黄安年（1997），他介绍了 1965 年以来美国奥斯基提出划分贫穷的最低生存线、最低充足线和最低舒适线三个水平。

后者的研究则表现为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就贫困线的设计理论进行探索：国家统计局（1990）的《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研究》打开了中国官方研究贫困线理论的大门，其中对农村贫困线的界定、标准的规定和调整方法等成果一直沿用至今。针对贫困标准层次单一，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农民生活发展的现状和存在差距，有的学者提出用特困线（活命线）、温饱线（贫穷线）、发展线（脱贫线）代替现行单一的贫困线（脱贫线）（林闽钢，1994；童星、林闽钢，1994）；按照这一研究思路，唐钧、王婴（1995）根据市场菜篮法装入菜篮子中内容不同重新设计了三条线：生存线、温饱线和脱贫线。有的从判断个体福利满足的方式把贫困线分为主观法确定的贫困线和客观法确定的贫困线，并认为食品能量摄入量

(FEI)和基本需求成本法(CBN)是使用客观法确定绝对贫困线的两种传统方法(杨国涛,2005)。有的从中国开发式扶贫角度提出宜建立“输血线”和“造血线”为标准的双层贫困线(侯震,2007)。还有的从贫困标准测算的理论角度将其分两类:一是相对标准测算理论,二是绝对标准测算理论(梁柠欣、陈云端,2008)。另外的则认为中国贫困线的划分应根据具体国情,因家庭规模、收入状况及地区分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丁萌萌、卓玛措,2006)。这些成果对中国贫困线理论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但对比西方的贫困线理论整体还属于绝对贫困理论下的成果,虽然也提出主观贫困线和其他类型的贫困线理论,但没有进一步的成果,社会剥夺理论和多维贫困理论至今还是一个稀缺领域。

从上可以看出,中国贫困线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在开发式扶贫的大背景下,探讨中国应设计什么类型的贫困线,这些贫困线叫什么名字、包括哪些内容、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等,并且主要体现为绝对贫困论的成果。而对各种类型的贫困线应该由哪些内容构成,哪些因素是不能回避的缺乏研究。所以贫困线如何制定除了国家统计局和扶贫办外,其他人无从知晓。

二、贫困线度量方法:传播与探索

在传播西方贫困线理论的过程中,实证和探索西方主要贫困线测度方法在中国的应用,形成了贫困度量中最为丰硕的成果。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如此之庞杂,以至于从中确定哪一个是使用面最广的都将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不过这些方法从研究的成果上体现为三类:方法的比较、传统方法的验证和新方法的探索。

(一)方法的比较

1.“马丁法”

这当中无论官方还是学者都抱有热情的是“马丁法”。中国国家统计局1995年开始使用世行度量贫困线的主流方法——“马丁法”测算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在这之后,马俊贤(2001)的研究表明高贫困线更好地反映了扶贫成果。非常有趣的是张全红(2010)运用中国国家统计局使用的“马丁法”测算了中国1980年以

来农村的贫困状况，结果表明农村实际贫困线要比官方公布的低收入线还要高出1倍，贫困口也要大得多^①。

2. 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ELES）法

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中国学者们对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ELES）法表现出十分浓厚的兴趣。其研究的目标可分为两个：一个是方法的比较研究，这可见于骆祚炎（2006）；唐运舒、于彪（2009）；汪晓文、马凌云、李玉洁（2011）等研究。二是方法的可行性研究。如祝梅娟（2003）；张艳涛、白云涛、韩国栋（2007）；王振军、牛叔文（2008）；陈明等（2009）；姚金海（2007）。这两方面研究的共识是：该方法与其他方法比较有其优势，在分别用于宏观（如中国）、中观（省）和微观（市）的贫困线测度中都有较好可行性，但若用于整体与部分地区的比较中应谨慎。

（二）对传统方法的验证

1. 基本需求法

该法在西方是较有影响的方法之一，郭宏（1995）用基本需求法测定了京郊贫困线，说明中国贫困线确实偏低。刘福成（1998）按照CBN法确定中国农村贫困线。

2. 食物份额法

刘富成（1998）认为食物份额法是确实中国农村贫困线较为理想的方法。

3. 恩格尔系数法

黄大利、李亚奇（1996）研究发现不能简单的应用恩格尔系数法直接测算中国贫困线；常婕（2006）提出存在恩格尔失灵和恩格尔悖论；骆祚炎（2006）认为利用恩格尔系数来测定贫困线不符合中国现实情况。他们的共同结论是经过修订后的恩格尔系数法是可以用来测度中国贫困线的。

4. 洛伦兹曲线法

王增文（2006）发现收入分布函数不仅能够测算贫困线，而且在收入分配的数量研究中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王祖祥等（2009）测算结果说明，七年间湖北省

^① 张全红.对中国农村贫困线和贫困人口再测算[J].农村经济, 2010, (02):51.

农村的基尼系数增加了 1.2%左右；无论是按国家统计局定义的绝对贫困线还是低收入线，除 2006 年稍有好转外，湖北省农村贫困程度都存在逐年增加的趋势。

5. 相对贫困线法和主观贫困线法

由于对收入界定在农村地区的不确定性，主观贫困线方法在中国的应用还不多见。让人兴奋的是：Gustafsson 和岳希明（2006）研究发现：主观贫困线（SPL）与国家统计局的农村低收入线（高于农村贫困线）非常接近。王兢（2007）研究发现，贫困人口规模对贫困线的移动相当敏感，贫困线很小的移动都会引起贫困人口的很大的变化。

（三）新方法的探讨

1. 供方贫困线

上百年来，无论东方学者还是西方学者一直习惯从穷人的需求来讨论贫困线的设置，中国有学者却从供方的角度来研究贫困线的制定，这给贫困线的度量提供了一个新视野。田飞、张颖(2010)从供求双方来设计贫困线，无疑是一种崭新的尝试，它至少说明一个国家对反贫困的工具可能，从而也拓展了贫困线制定的视野。

2. 指数法

贫困指数通常用来度量贫困程度的指标，令人欣慰的是田飞（2010）尝试了一种较为独特的方法，用贫困指数测度农村贫困线。另一成果是研究贫困指数与贫困线的关系：张全红、张建华（2010）研究发现，虽然农村贫困状况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基于不同贫困线标准衡量的贫困程度相差悬殊，这使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变得更加复杂。

3. 购买力平价法

为了解决贫困线度量的可比性，国际上通用的办法是采用购买力平价法。申付亮、朱红波（2010）认为要测算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贫困线时，也可以引入购买力平价的思想，结果表明中国各省的贫困线差异是显著的。

但对在中国使用哪种方法确定贫困线更适应中国国情学者们看法不一^①。这说明对于生产力水平多层次的中国选择一条适应全国上下的制定贫困线的方法本身确实是有难度的，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从上看出，在中国制定贫困线方法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无论是从方法的比较还是传统方法的验证以及新方法的探索上。贫困线的构成维度是什么，使用什么方法可以更有效地筛选出这些维度仍然成为贫困线研究中的空档。

三、贫困线合理性的评价：指出病因，未开处方

对中国贫困线合理性的探讨，现有文献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一是作国际比较；二是作国内比较。就国际比较来看，其主要的观点是与其他国家和国际贫困线相比中国贫困线是比较低的（刘纯彬，2006；李静、杨国涛、孟令杰，2006；王荣党，2006）；中国贫困线应像国际标准靠近（郑建平、刘兴武，2007；周敏凯，2008；王亮亮，2008；陈明远，2009；李锡明，2009）。

从国内比较来看，近年来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制定的贫困线标准太低，难以真实反映农村贫困的程度和规模（张全红、张建华，2010；田飞，2010；吴国宝，2008）。一些研究称，用农村消费价格指数来计算实际的贫困线，发现经过价格指数调整过的贫困线高于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因此，农村贫困发生率被低估了^②。一些最新的研究也显示，即使按照贫困线应该达到的客观标准（最低生存所需支出以及满足衣食等基本生存需要）来衡量，中国官方的贫困线水平可能也太低^③。因此，更多的学者支持无论是基于“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的概念，中国的贫困线都相对偏低的观点^④。

那么怎么办呢？有的学者提出新时期农村的贫困标准应该调整（盛来运，2000；刘玉森，2003；李芝兰，2005）；更多的学者认为中国贫困标准应该从目

^① 更多的认识见黄大利，李亚奇（1996）；刘福成（1998）；马俊贤（2001）；祝梅娟（2003）；刘建平（2003）；朱海玲（2003）；骆祥炎（2006）；姚金海（2007）的论述。

^② 冯瑛，陈建东，朱悦衡.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总支出的研究[J]. 前沿, 2010, (12): 22.

^③ 李锡明. 新扶贫标准和国际贫困线[J]. 学理论, 2009, (24): 123.

^④ 支持太低观点的还有盛来运（2000）、林毅夫（2002）、刘玉森（2003）、李芝兰（2005）、萧灼基（2005）、骆祥炎（2006）、王荣党（2006）、姚金海（2007）、郑建平、刘兴武（2007）、张宏升、赵玉（2008）、王增文（2009）、陈明远（2009）、刘娟（2010）、冯瑛、陈建东、朱悦衡（2010）。

前的水平提高^①。进而如何调整，怎么提高呢？部分学者试图从影响贫困线的因素中寻找办法，如郭佩霞（2007）认为考虑到民族地区地域环境特点和贫困发生的独特性，当前贫困线划定参考因素可以先引入地域面积、人口、平均灾害损失率、因病返贫率以及因教育返贫率等指标；杨立雄（2010）分析了物价波动、收入增长和地区差距对中国贫困线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贫困线的增长机制只与物价挂钩，不与收入挂钩。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快于消费价格，导致贫困线的绝对购买力下降；同时，随着收入的快速增长，贫困线相对购买力其实是急剧下降的。后两个研究十分可贵，但他们都未就如何将影响贫困线主要因素纳入贫困线的具体方法进行研究，也就是说贫困线如何改进还是一个反贫困中的“拦路虎”。

如此说来，当前中国农村贫困线既低于贫困人口的实际基本生活需求，也低于中国经济水准，还低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贫困线，更不能恰当地反映扶贫的绩效，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是到了必须科学调整的时候了。正如区域经济学家陆学艺所认为的，农村贫困线设定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就不能准确反映中国扶贫工作取得的成就，甚至出现悖论：一方面是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人均GDP已达到中等发展中国家水平，而另一方面社会贫困阶层感到，统计数据和真实感受并不一样，“形势好意见大”的情况就会发生。不谋而合的是世界银行在对中国开列的扶贫政策的优先次序中也是把它列为第一目标，即“中国目前需要考虑采用一个更高的贫困线。因为它能使政策关注正确的目标群体，更适应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②。但从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看，目前的进展似乎只是指出了事实、提出了问题——农村贫困线偏低，应逐步提高的建议。但未对解决问题——如何提高贫困线提出可行的方案，特别是未就哪些是应该纳入中国农村贫困线的维度进行深层次的探究，这就是本研究想重点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无论从国际研究还是从国内研究看都指出了中国农村贫困线偏低的这个基本事实，但如何解决还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总结这些问题不断出现并在不断在分化出新的问题的背景和原因，其实是研究贫困线必须解决的一

^① 更多论述见林毅夫（2002）、萧灼基（2005）、骆祚炎（2006）、王荣党（2006）、姚金海（2007）、郑建平 刘兴武（2007）、王增文（2009）、陈明远（2009）、刘娟（2010）、冯 璞、陈建东、朱悦衡（2010）、张全红（2010）、朱 四 倍（2010）、张全红 张建华（2010）、顾 昕（2011）。

^② 世界银行. 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EB/OL].（2009-3-21）
<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a>.

个基本问题被忽视了，即贫困线的构成维度是什么？由于对贫困线的构成不清楚，就导致贫困线的制定失去理论依据，贫困线的比较缺乏可比性，贫困线的实施降低了操作性，最终导致反贫困绩效不具备客观性。对于中国农村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联系农村实际哪些维度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进一步研究应该回答的问题。

1.4 研究的问题

贫困是全球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它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障碍。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减少贫困人口不仅是国际发展机构开展工作的源动力，也是众多发展机构的行动主题和奋斗的首要目标。而这些工作的基础是如何识别贫困人口，以确定贫困的规模和程度。即首先必须判定谁是穷人，才能估计穷人的规模和贫穷的程度。现在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反贫困政策制定中，还没有找到比确定贫困线更为简单和便捷的识别贫困人口的方法。所以如何制定贫困线就成了贫困度量和反贫困战略的关键环节。如果将贫困线设定在收入分布的众数附近，就会高估贫困程度和夸大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低估收入分配变动对贫困的影响^①；如果贫困线设定得较低，虽然很好地突出了反贫困成绩，但更多真正需要救助的穷人却又被排斥在外，这似乎是一个两难选择。

对贫困线的研究无论是中国还是国际上似乎都十分钟情于制订方法的研究，而有两个问题一直很少关注或者说关注得不够：这就是贫困线到底应该包括哪些构成要素（维度），这些要素（维度）在贫困线设计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和数量关系（重要性如何确定）？如果这两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那么贫困线制定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性将受到质疑。同时在贫困人口居世界第二位的中国，这两个问题对于完善中国瞄准机制，科学地选择新世纪第二阶段（2011~2020）的扶贫战略和制定扶贫公共政策至关重要，乃至对于促进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因此，本研究将试图通过中国农村贫困线构成维度的研究来回

答下列问题：

1. 贫困线的基本构成维度是哪些？

^① 张全红，张建华. 中国农村贫困变动：1981-2005[J]. 统计研究，2010，(02)：31.

2. 这些维度是如何选择出来的？
3. 中国现有贫困线适应性如何？
4. 如果适应性不佳，在基本构成维度条件下应如何改进？

1.5 研究的价值

世界银行认为，科学的贫困线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贫困的分布和严重程度有了更好的了解，有助于为世行的发展规划确定优先重点，并衡量这些规划的进展情况^①。因此，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政府都把贫困线的制定视为反贫困中基础性和前瞻性的工作。如何科学地制定贫困线，筛选和确定贫困线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其先决条件。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就是通过理论分析和田野调查的资料，提出中国农村贫困线的一般构成维度，并探讨用什么便捷的方法选择出这些维度。因为在中国农村贫困线的准确性受到了普遍的质疑，而只有客观科学的贫困线才能摸清贫困规模、分析贫困的程度，为反贫困提供政策依据。同时，农村贫困问题是中国现在和今后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也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及建设新农村要解决的重要难题之一。对这项既源于民众需求又关乎国家发展未来的课题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从学术上看，贫困线构成维度的确立，使贫困线的制定有了更为科学的依据。科学合理的贫困线不仅可缓解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带来的不平等，抑制贫富分化加剧，促进社会公正，而且可以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贫困线理论。

其次从实践上看，贫困线构成维度的研究，回答了哪些需求是贫困人群最关心的基本需求，从而提高了反贫困政策设计的吻合度。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带来如下贡献：

1. 提出了一个以前被忽略的问题——贫困线的构成维度；
2. 能够有效提高贫困线制定的精度和适应程度，促进贫困线制定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3. 提供贫困原因分析和反贫困绩效评价的有力证据，从而为确定扶贫的重点，选择扶贫的路径，设计反贫困政策的优选顺序提供依据；

^① 世界银行.有关新的贫困估算问题解答[EB/OL]. (2010-2-17) <http://go.worldbank.org/U70GMZ1AX0>.

4. 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贫困线制度抛砖引玉——贫困线的维度决定了贫困线的结构，从而影响到穷人的需求结构和数量规模，这为贫困线的构成要素的研究提供参考；

5. 提高贫困线的可比性。只有贫困线的维度相对一致，才能使贫困数据的收集有统一的基础，即实现内容可比，从而推进其他方面的可比。

1.6 内容框架

本研究共分 8 章。

第一章绪论着重阐述研究问题的提出过程、选题的缘由和主要内容。首先分析了研究问题的背景，在中国研究农村贫困线有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强烈的需求空间以及多样化的地理资源，接着粗略回顾了国际上对中国农村贫困线研究的主要视角和成效，以及中国农村贫困线研究的进展和现状，从中得出贫困线究竟应该包括哪些构成维度，如何确定这些维度在贫困线设计中的地位和数量关系，以及中国农村的贫困线适应性如何？是被长期忽略的问题。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为科学评估贫困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也可为反贫困战略的正确选择和有效实施提供有益借鉴及技术支持。最后提出本研究的内容框架。

第二章是对贫困和贫困线度量理论与方法的回顾，以提供贫困线分析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本章更系统的阐述了贫困线的理论体系，它们少不了对贫困线进行界定，在多视角的解释中提出贫困线定义四个支柱，意在使贫困线的定义更加规范化；阐述贫困线的理论和家族也是必要的，最后汇集于贫困线制定的主流方法的归纳。

第三章专题探讨研究方法。接着描述了能将本研究理论分析与实地调查融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三种方法——文献分析法、田野调查法及计量分析法。

第四章用适应性标准对中国农村贫困线进行评价，分析其适应的方面与不适应的表现，从而提出优化思路。

第五章是从哲学视角思考贫困线制定的理论根基。即如何抉择效率与公平的优先序：要是只讲效率优先，会使富人驶上快车道，同时拉大社会成员的收入差

距；若只讲公平优先，则会减少社会的阶层差别，同时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前进步伐，正确的选项是“效率与公平兼顾”。本章着重探讨了反贫困中的市场机会、中国践行的效率与公平之路和反贫困中的效率与公平的中国抉择。

第六章对适合中国农村的贫困线维度进行了筛选。在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初选出贫困线构成的基本维度和相应的二级指标，力图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国农村贫困线结构和指标体系，这其中经济发展的水平、贫困人群的需求、国家扶贫资源和战略的供给、物价水平和国际反贫困都是不可忽视的维度。

第七章对这些维度的代表性指标进行数量分析，以检验与贫困线的密切程度。从而构建一个数量模型来说明他们在贫困线制定中的地位和数量关系，用中国宏观数据实证后并作回归，与实际的中国贫困线进行比对，以观察贫困线模型的拟合优度和操作性，最终择定最优化的维度和指标体系。

第八章是结论和政策建议。总结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提出政策建议，指出研究中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2 贫困和贫困线的度量理论

2.1 各种定义的盛宴

人们对贫困定义的关注往往超过对贫困线的关注，在众多的学术研究中它常受到冷落。其实，在我们界定了贫困之后，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将穷人和非穷人分开，到目前为止，最简单、最常用乃至可以称之为主流的方法是划定贫困线。那么何为贫困线呢？

最早的贫困线表达来自于布思如下的著名论断：我所指的贫困，是指那些有极少固定收入的（家庭），例如一个一般家庭每周只有 18 到 21 先令的收入。跌至这个标准以下就是“赤贫”，他们或者长期没有稳定的工作、患有疾病，或者有一大群小孩子^①。

这只是贫困和贫困线的历史性表述，不能称其为一个科学定义。为了全面了解贫困线定义的实质，特别是把握这些定义的核心要素，下面分别从其学术定义、政策定义和数量定义三个层面作一比较。

2.1.1 学术定义

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记载，在美国最早给贫困线下定义的是亨特（Hunter）在 1904 年完成的，并且发展成一系列的研究，例如为纽约市编制的“最小限度的舒适”和其他预算，还有经济报告联合委员会关于 1949 年低收入家庭的报告^②。但由于资料渠道的原因，一直未查到这一定义的准确表达，但它并没有影响美国贫困线界定起点的记载。其实这一开创性的工作发生在大英帝国，布思和朗特里就是开拓者。很多中国学者认为朗特里最早提出“贫困线”一词，其实布思才是这项工作的先行者。Gillie（1996）在《贫困线的起源》一文中对此作了全面的挖掘和佐证：“人们通常把区分穷与非穷的线称作贫困线，尽管它的同义词“穷人的线”曾在布思 1887 年的笔记中使用，但在他的公开发表论文中没有发现这个词。公开使用“贫困线”一词可以追溯到 1894 年和 1896 年，

^① Gillie, Alan. The Origin of the Poverty Line [J].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96, 49(04):715.

^② 约翰·伊特韦尔，默里·密尔盖特，彼得·纽曼.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 K-P[K].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995.

例如，Helen Bosanquet 提到“现在所称的‘贫困线’一词来自布思的书里”。Seebohm Rowntree's (1950) 宣称“第一次尝试科学确定贫困线是他自己的估计,1901 年出版的满足适当的营养和其他基本开支最低成本的收入调查（于伦敦 1899 年）”。不过，在朗特里的文章中首先引用的是布思的“穷人的线”，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参考的是 1899 年之前的贫困线。毫无疑问，这些描述都是一致的，或者说是明白无误的，认为贫困线是布思的发明。布思的传记作家 Simey 声称布思发明的贫困线概念，也许是他对社会科学最引人注目的独有的贡献”。^①因此，我们不应该再怀疑布思是第一个提出贫困线这个概念的人。但同时也不能否认朗特里是对贫困线作出科学定义的第一人。

对贫困线定义的探讨引发了众多国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他（她）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提供对贫困线的认识和思考成果（见表 2-1），从而使贫困线的研究迈上了科学化的旅程。

表 2-1 学术定义比较

学者	贫困线定义	核心要素
国外学者		
Rowntree (1899)	朗特里的定义是：“仅为维持身体正常状态所需的起码开销”，即：衣食、房租、燃料以及必需开支的家用杂费 ^② 。	起码开销 消费指标
Goedhart (1977)	贫困线是判断公民是否需要政府补贴其收入的一项标准 ^③ 。	补贴标准 收入指标
Orshansky (1963)	贫困线为最低食品消费支出的 3 倍 ^④ 。	食品消费
Stiglitz	贫困线是指最低维持生活水准的所得 ^⑤ 。	所得水准

^① Gillie, Alan. The Origin of the Poverty Line [J].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96, 49(04):715.

^② Theo Goedhart, Victor Halberstadt, Arie Kapteyn and Bernard van Praag. The Poverty Line: Concept and Measurement[J].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77, 12 (04):505.

^③ Theo Goedhar, Victor Halberstadt, Arie Kapteyn and Bernard van Praa.The Poverty Line: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J].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76, (12): 506.

^④ 周彬彬.向贫困挑战[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2.

^⑤ 唐钧.确定中国城镇贫困线方法的探讨[J].社会学研究, 1997, (02):64.

德布拉吉·瑞(2002)	贫困线是一个关于收入、消费,或更一般地讲,对产品或服务可得性的门槛,在此门槛之下的人们被认为是穷人。那么,贫困线就是在特定时间、特定社会中的一个最低“可接受的”经济参与水平 ^① 。	可得性门槛 经济参与水平
Martin Ravallion (2005)	贫困的度量通常假定存在预定且明晰的生活标准的水平线——“贫困线”——一个人如果被认为不贫困则必须达到这一水平线 ^② 。	生活标准
Martin Ravallion (2006)	贫困线可以视为扣除通货膨胀(物价)因素后的不同生活成本 ^③ 。	生活成本
国内学者		
张建国(1994)	贫困线也称最低生活标准线。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它是对不同时期人们的最起码的社会生存条件或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差距所作的量化的界定。从社会生活实践上看,它是指一个国家为救助其社会成员中收入难以维持家庭基本生活需要者(也可称为低收入者),而制定的一种社会救济标准。其的核心内容是由政府向低收入者提供在金额上足以满足基本生活消费需要(也可称作最低生活标准)所需的救济金,以保证低收入者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 ^④ 。	平均生活水平 量化的界定 社会救济标准 救济金
吴国宝(1995)	贫困线,简单说就是一个国家确定的一个人或家庭在一定时期内为了取得社会认为体面的生活所必需的一定数额的收入或营养标准 ^⑤ 。	收入标准 或营养标准 体面生活
朱凤歧、高天虹等(1996)	衡量个人、家庭或某一地区贫困与否的界定标准或测定体系,称为贫困标准或贫困线 ^⑥ 。	标准体系 确定的量值

① 谭诗斌.现代贫困学导论[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2:118.

② [美]马丁·瑞沃林.贫困的比较 [M].赵俊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7.

③ Martin Ravallion. Testing Poverty Lines [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06, 52 (03) : 399.

④ 张建国.关于制定社会“贫困线”的研究与思考[J]. 经济研究参考, 1994, (41) : 8.

⑤ 吴国宝.贫困线建立的理论和方法述评[J].经济学动态, 1995, (11) : 73.

⑥ 朱凤歧,高天虹.中国反贫困研究[M].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6:3.

唐钧 (1997)	贫困线, 亦称最低生活保障线, 是指为度量贫困而制定的针对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或者相对社会中等生活水平的差距所作的定量化的界定 ^① 。	生存或生活差距 量化界定
莫泰基 (1997)	收入少于中位数的一半的为贫困者。	收入 中位数的一半
陈怒祥 (2000)	所谓贫困线, 乃是一种收入水平线, 按照一定年份生活资料价格和服务收费标准, 一定人口的家庭获得这样的收入, 可得到维持生活最必须的商品和服务, 低于这个水平的家庭, 就属于贫困家庭 ^② 。	收入水平线 生活和服务标准
马俊贤 (2001)	所谓贫困线, 就是指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 人们维持基本生存需求所必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用价值量表示)。具体到农村贫困线, 可以表述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刚好达到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最低费用的界限 ^③ 。	最低费用 物品和服务 价值形态
杨国涛 (2005)	绝对贫困线一般按照满足人们最低的消费水平定义的, 即人们生存所需要的衣食住等消费的最低水平 ^④ 。	最低水平 消费
王碧玉 (2006)	简单说就是一个国家(地区)或组织确定一个人或家庭在一个时期、一定地区、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 为了取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包括一揽子食品和非食品)或取得社会认为体面的生活所必需的全年费用, 一般量化为货币形式。具体到农村贫困线, 可以表述为农村人均纯收入刚好达到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最低费用 ^⑤ 。	必需费用 生活必需品或 体面生活 价值形态
张小军、裴晓 (2007)	贫困线是指一定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	最低费用

^① 唐钧. 确定中国城镇贫困线方法的探讨[J]. 社会学研究, 1997, (02): 64.

^② 陈怒祥. 美国贫困问题研究[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6.

^③ 马俊贤. 农村贫困线的划分及扶贫对策研究[J]. 统计研究, 2001, (06): 31.

^④ 杨国涛. 贫困线理论及其在中国农村的实践[J]. 乡镇经济, 2005, (09): 5.

^⑤ 王碧玉. 中国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36.

	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所必须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它又叫贫困标准 ^① 。	物品和服务
周敏凯 周 薇 (2008)	所谓贫困线标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维持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所必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标准;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社会成员基本生活质量与发展权利必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标准。	基本生存 最低费用标准 生活质量与发展权利
李芝兰 (2008)	贫困线也称为贫困标准,这是一种按照收入或消费水平来确定和衡量贫困的办法 ^② 。	贫困线性质 衡量方法
王春萍 (2009)	贫困线的确切含义是指维持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基本生存的收入水平。其具有三层含义:其一,它是一个相对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指标。其二,贫困线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其三,贫困线仅仅是一个经济的概念。而绝对贫困线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收入水平 ^③ 。	收入水平 相对指标 静态 经济概念

资料来源:自己编制。

从上看可以看出,各学者定义的关注点不一样。国外学者朗特里 1899 年给贫困线下的定义是一种生存概念,没有列入生病所需的费用,也无供赌博、烟酒的费用,或有余钱可以供老年或殡葬之用。最低预算中不包括除维持身体正常状态必需开销之外的其他费用。就这一点而言,贫困的标准就是节俭。乃至是一种苛刻的生存标准。西奥·歌德哈特的定义是从社会政策的角度作出的,是某种政治性的决定,这样的贫困线其实是一种救助标准。即考虑在什么条件下社会愿意给予他的贫困公民特别的照顾。奥斯基的方法是建立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的,根据她的观察,美国家庭大约平均将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饮食。根据这一情况,

^① 张小军,裴晓梅.能力与贫困——中国城市贫困人口个案研究 [M]. 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集团,2007:2.

^② 谢和平.反贫困与国际区域合作[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145.

^③ 王春萍.当代贫困的测度体系及其经济学涵义分析[J].2009, (02): 120.

贫困线一般定义为饮食费用的三倍。以后尽管略有修改，但时至今日，美国社会仍用这一方法调整和公布国家贫困线。斯蒂格利茨（Stiglitz）和马丁·瑞沃林的定义（Martin Ravallion）考量的是生活水准，而德布拉吉·瑞的定义关注的则是经济参与水平，其实是一种权利的反应，即“可得性门槛”。

其实对收入和消费两种不同指标的选择，反应了贫困度量的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若选择收入指标，主要考察的是穷人的生活标准，若选择消费指标，则主要考察的是穷人的对资源的最低权利。“在前一种方法，目标是人们达到一个指明的消费水平（或者特定的商品的消费）；在后一种方法，作为公民，人们被看作有权得到一个最低的收入，对收入的支配则是他自己的事。”^①

中国学者对贫困线的研究大多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几乎晚于西方近一个世纪，但它们有三大特点：一是使用收入指标定义贫困成为主流。除马俊贤（2001），杨国涛（2005），王碧玉（2006），张小军、裴晓（2007），周敏凯、周薇（2008）的定义是从消费角度作出的外，其余定义多是从收入的角度界定贫困线。二是定义中定性的成分多于定量得的成分。其中李芝兰（2008），朱凤歧、高天虹等（1996）的定义直接对贫困线的性质的描述，它是一种标准的“测定体系”或“衡量方法”，只有莫泰基（1997）的定义借鉴欧盟国家的传统做法，把中位收入以下的一半视为贫困者。三是贫困线的设定是以维持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要为目标。

2.1.2 政策定义

为了避免学术定义的严谨和难以统一，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在反贫困的实践中，从社会公共政策的角度提出了执行层面的贫困线定义（见表 2-2）。

阿玛蒂亚·森指出“在选择贫困线时还存在一个在实践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一选择当被为‘描述性’行为是，还是一种‘规范性’行为”^②。所以，政策的设计者们往往提出一个操作性的政策定义。

^① 约翰·伊特韦尔，默里·密尔盖特，彼得·纽曼.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三卷 K-P[K].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995.

^② [印] 阿玛蒂亚·森. 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M] 王利文，于占杰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34.

表 2-2 政策定义比较

机构	贫困线定义	核心要素
卢森堡收入研究所 (LIS)	贫困线是一个国家或一年内可支的中等收入的 50% 定义的 ^① 。	中等收入
世界银行 (2000-2001)	贫困线, 即收入或消费额的重要临界线, 在此线以下, 一个人或家庭被确定为穷人或贫困家庭 ^② 。	临界线
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OECD)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 50%~60% 作为贫困线 ^③ 。	收入比例
俄罗斯	是指在社会发展阶段能够保障居民最起码的生活条件和维持人的劳动能力和健康所需要的费用 ^④ 。	保障费和维持费
美国	是通过把一套最低食物补贴 (也就是每年养活一个特定家庭的最低成本) 与家庭收入中直接用于食物购买的估计比例结合起来得出的值 ^⑤ 。	生活成本 食物比例
英国 (1979)	家庭收入低于收入中位数的 60% ^⑥	收入比例
中国 (1990)	它是指可以满足一个家庭在食品、住房、衣着等方面最低需求的生活水平标准值 ^⑦ 。	基本需求 最低需求

资料来源: 自己编制

世界银行的定义直接支持贫困线的属性, 它是个人或家庭是否列入贫困的“临界线”。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定义则进一步确定了用“收入比例”来确定这个“临界点”。1997年10月24日俄罗斯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最低生活保障法》中对贫困线的解释是以生存为准则的, 即只以“能够保障居民最起码的生活条件”和“维持人的劳动能力和健康所需要”为限, 采用价值指标计量。由美国社会保障部门1964年提出的官方贫困线则是一条社会救济的最低门槛。而英

① (英) 安东尼·B·阿特金森, (法) 弗兰科伊斯·布吉尼. 收入分配经济学手册 [K]. 蔡继明等, 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320.

② 2000, 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编写组. 世界发展报告: 2000-2001 与贫困作斗争 [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③ 骆祚炎. 对恩格尔系数测定贫困线的思考 [J]. 改革与战略, 2006, (02): 23.

④ 马蔚云. 俄罗斯贫困线: 基本概念与测定方法 [J].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8, (05): 26.

⑤ [美] 威尔逊. 真正的穷人: 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 [M]. 成伯清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44.

⑥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课题组. 世界各国贫困标准研究 [R]. 2010, (01): 5.

⑦ 中国统计局. 中国统计摘 2006~2009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国 1979 年以来，对贫困和贫困线的定义直接用数字表示，即“家庭收入低于收入中位数的 60%”。从上表中不难看出，中国官方的定义和俄罗斯一样侧重定性描述，而英美的定义侧重于量化界定。

有学者指出政策定义也存在两个困难：政策是政治组织的职能，取决于包括政府的性质、其权力来源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压力等在内的许多因素。第一，实际政策的制定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超越了它应该做什么这一一般性观念。第二，即使这里“政策”所代表的不是实际执行中的政策，而是在社会中得到广泛支持政策措施，问题仍然会存在。很明显，“贫困”概念不同于应该用“政策”消除的东西。政策措施必定依赖于可行性评估（“应该做什么蕴含着能够做什么”），而承认某些贫困无法立即消除并不等于承认它们可以不被视为贫困。阿玛蒂亚·森对此经典地描绘到：“老人家，你要明白，你挨饿不是你真的很贫穷，而是因为目前的经济环境中，不可能使每一个人的收入水平都高于消除饥饿所必需的水平”^①。不过，为了拓展定义的视角，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

另一特点是政策定义是一个操作性定义，往往受扶贫资源和政府意向的影响，由各国政府制定，并非完全依据贫困群体的需要未能满足的实际情况而做出。政府制定的贫困定义和贫困线常常受到民间团体、学术发现以及社会问题本身的质疑和挑战：被政府贫困线划入贫困的社群是否是真正的贫穷？是否有社会成员贫穷但是又被贫困线排斥在贫困社群之外的现象？

2.1.3 数量定义

在这两种定义的争论声中，一些研究者试图从更精确的角度去定义贫困线，于是涌现出不少贫困线的数量定义，下面几种是较有影响的定义（见表 2-3）。

^① [印]阿玛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M]. 王宇, 王文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30-31.

表 2-3 六种贫困线和贫困率的定义

Definition	Poverty Line	Poverty Percentage
(1) Basic needs, Rowntree	$\ln z_1 = \ln (c_0 + oc_0)$	$\Pi_1 = N \left(\frac{\ln (c_0 + oc_0) - \mu_y}{\sigma_y}; 0, 1 \right)$
(2) Basic needs, Orshansky	$\ln z_2 = \ln c_0 - \hat{\alpha}_0 + (1 - \hat{\alpha}_1)\mu_y$	$\Pi_2 = N \left(\frac{\ln c_0 - \hat{\alpha}_0 - \hat{\alpha}_1 \mu_y}{\sigma_y}; 0, 1 \right)$
(3) Food ratio	$\ln z_3 = \frac{\hat{\alpha}_0 - \ln \gamma_0}{1 - \hat{\alpha}_1}$	$\Pi_3 = N \left(\frac{\hat{\alpha}_0 - \ln \gamma_0 - (1 - \hat{\alpha}_1)\mu_y}{(1 - \hat{\alpha}_1)\sigma_y}; 0, 1 \right)$
(4) Percentage median income	$\ln z_4 = \ln \tau_0 + \mu_y$	$\Pi_4 = N \left(\frac{\ln \tau_0}{\sigma_y}; 0, 1 \right)$
(5) Percentile	$\ln z_5 = N^{-1}(\epsilon_0)\sigma_y + \mu_y$	$\Pi_5 = \epsilon_0$
(6) Leyden method	$\ln z_6 = \frac{\hat{\beta}_0 + \hat{\beta}_2\mu_y + \hat{\beta}_3\sigma_y\mu_\delta}{1 - \hat{\beta}_1}$	$\Pi_6 = N \left(\frac{\hat{\beta}_0 + (\hat{\beta}_1 + \hat{\beta}_2 - 1)\mu_y + \hat{\beta}_3\sigma_y\mu_\delta}{(1 - \hat{\beta}_1)\sigma_y}; 0, 1 \right)$

资料来源： Hagenars, Aldi J.M et al. A Synthesis of Poverty Line Definition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1985, 31(02):139-154(148).

其中最著名的的是以下两种：

(1) 市场菜篮子定义。其实最原始、最直接的数学定义来自于朗特里的食物篮子法，奥珊斯基制定的美国贫困线也遵循了原理，这种方法制定的贫困线常常被称为绝对贫困线。它通常指定一个商品篮子，用向量 X^* 表示，用 P 表示商品的价格，于是可得到贫困线的公式为：

$$Z = (1+h) X^* \cdot P \quad (1)$$

其中 h 是对无效支出或浪费的准备，或是对未能包括在商品表 X^* 中的项目的准备， $h=2$ 则是为在其他商品上的支出留有余地^①。

(2) 热量定义。Satya Paul 提出了定义贫困线一种模型，即以所有热量和营养消费的最低支出水平作为贫困线，对这些要求根据每一个住户的年龄、性别和职业特征进行调整。这种方法回避了所有传统方法的主观性的武断和概念的嵌

^① 约翰·伊特韦尔，默里·密尔盖特，彼得·纽曼.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三卷 K-P[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996。

套，此模型曾用于印度一个省的贫困线的简易界定和计算（Satya Paul, 1989）

①。

$$\log_e(X_{jk}/m_{0jk}) = \alpha + \beta_0 \log_e(\bar{y}_{0jk}/\bar{Y}_{0JK}^*) + \sum_{i=1}^N \beta_i \log_e(Y_{ijk}/Y_{ijk}^*) + \mu_{jk} \quad (2)$$

取对数后，变形为

$$\frac{\bar{Y}_{0jk}}{\bar{Y}_{0jk}^*} = \frac{Y_{0JK} - (y_{ijk} \times 4)}{Y_{0JK}^* - (y_{ijk}^* \times 4)} + \mu_{jk} \quad (3)$$

这样，贫困线为：

$$\left[\frac{\bar{X}}{m_0} \mid (\bar{Y}_0/\bar{Y}_0^*) \equiv \dots \equiv (Y_7/Y_7^*) \equiv 1 \right] \equiv e^{\bar{x}} = z \quad (4)$$

贫困线这个术语被按不同意义使用的事实，突出表明了澄清这个基础概念的必要性。

不同的贫困线定义对贫困度量有何影响呢？戴莱克通过精密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由于选择的定义不同，即使使用完全相同的数据样本，得出的贫困水平也可能不一致。^②如前所述，贫困是动态的，贫困的概念本身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对贫困的理解会因民族文化和生活水平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衡量贫困的标准，即“从非穷人中把穷人区别开来的标准，趋向于反映特定的民族优先权及有关福利和权利的规范性概念”^③也是动态的。

① Satya Paul. A Model of Constructing the Poverty Line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9, (30):129-144.

② [英] 安东尼·B·阿特金森，[法] 弗兰科伊斯·布吉尼. 收入分配经济学手册 [K]. 蔡继明等，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319-320.

③ 谭诗斌. 现代贫困学导论[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71-72.

区分这三个层面的定义是为了挖掘出贫困线定义的核心要素和本质。其本质正如席勒（Schiler）所简明指出的：“我们把穷人从非穷人中分离出来所划定的贫困线，并不表明什么是足够的——它仅充分自信的断言什么是太少了。”^①

以上定义有几个共同关注点：

(1) 贫困线是一个阈值。它是穷人与非穷人的分界线，体现在某一点上，即贫困点（临界点），这一点因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

(2) 贫困线是一个“测定体系”或“衡量方法”。贫困线是对贫困的度量，个人、家庭或某一地区是否贫困需要某种标准或测定体系来衡量，这一度量贫困的标准和体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生活状态进行某种区分，划出一个界线。高于这条线的人跻身于非穷人，低于这条线的人就成了真正的穷人。那么这个尺度由什么来担当呢？它可以是收入、消费、资产，乃至产品和服务或者其他表明生活水准的指标。

(3) 贫困线是对个人、家庭和群体基本生活水平的表达。贫困总是存在具体的时空范围内，并表现为个人、家庭和群体乃至某一地区与社会大众所过的生活水平的差距，总是要获得过上基本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在亚当·斯密看来，这种生活必需品概念是“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物品”以及“没有它”就会被“社会习俗视为有伤风化”的物品。

2.2 四根支柱

贫困线内涵的界定直接关系到贫困测度指标的选取和测度结果的表达。按国际通行的看法，贫困线是由两个基本要素构成，即最小需求和收入。^②这可称之为两要素论：最小需求反映的是社会公认的最低福利水平，最小收入是社会公认的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国内有另一种两要素说，指的是人的基本需求和国家的经济实力。当然还有学者从数理方面提出了三要素说和其他的多要素说，详见表 2-4。

^① [美]威尔逊.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M].成伯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46.

^② 周彬彬. 向贫困挑战[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

表 2-4 贫困线的要素比较

类别	要素内容	著者
两要素	一般来说，构成贫困标准最基本的要素是贫困户的收入和最小需求	周彬彬
两要素	(1) 人的基本需求，即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2) 国家的经济实力 ^① 。	向国春、朱静秋、阎正民
三要素	(1) 选择相关的变量(S)y；(2) U 函数的选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代理关系；(3) 临界水平 δ ^② 。	Hagenaars and bernard
十要素	(1) 理论假设；(2) 测量方法；(3) 标准构成；(4) 最小需要；(5) 收入；(6) 测量单位；(7) 时间；(8) 区域；(9) 价格；(10) 操作程序 ^③ 。	周彬彬

来源：自己编制。

但这些都难以囊括上述国内外定义的核心要素，其实无论学术定义、政策定义还是数理定义，有四个词是它们的共同支柱，这就是：参考子群、绝对内核、价值判断、度量尺度，或者说它们是构成一条完整贫困线的四个要件，其关系见图 2-1。

^① 向国春，朱静秋，阎正民. 界定贫困的标准研究综述[J]. 中国卫生资源，2009，(06): 262.

^② By Aldi J. M. Hagenaars and Bernard M. S. Van Praag. A Synthesis of Poverty Line Definitions [J] . Rev.Income Wealth, 1985, 31 (02) 140.

^③ 周彬彬. 向贫困挑战[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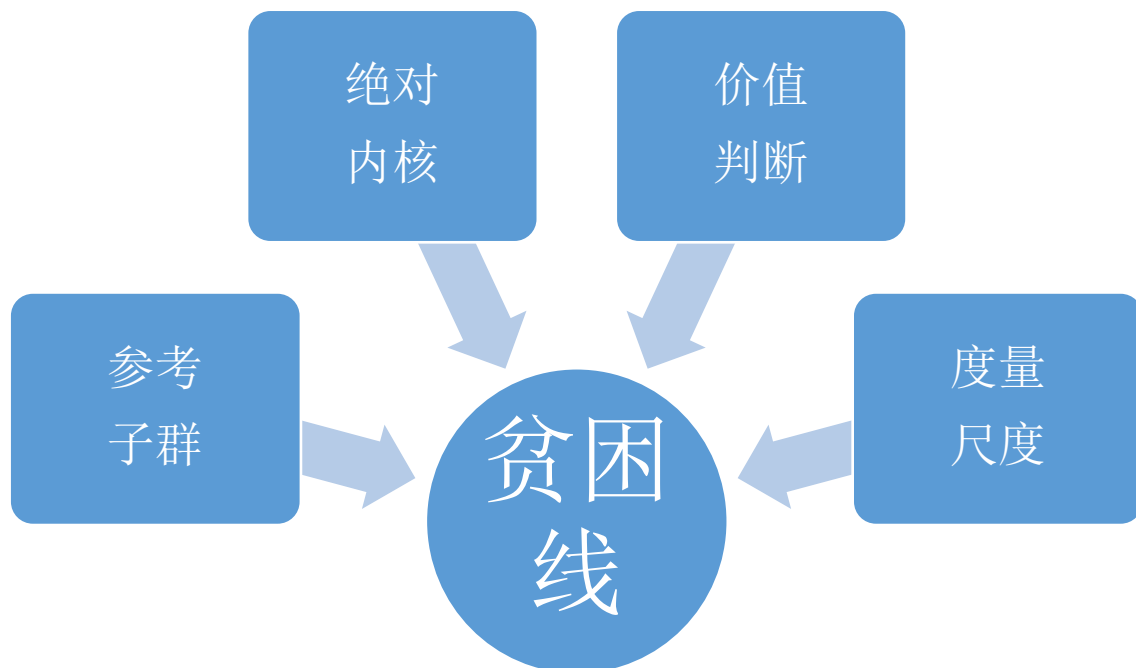


图 2-1 贫困线四个支柱关系图

2.2.1 参考子群

贫困是一种比较劣势，是与大众群体相参照的结果，他们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与社会大众共同前行中的不幸阶层，是生活匮乏和极度困难的底层群体。正如罗尔斯伊恩指出，这个阶层可能是非技术工人组成的，或者是一些“收入和财富低于平均值的一半”的人。他对不幸阶层所下的这个描述，体观了一条贫困线的基本作用^①。即将穷人与非穷人相区别的一种尺度。这种区分只能就其所在的社会或阶层而言，即就其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可接受的生活质量而言，他们的生活是困苦的，使得他们无法像周围的普通人那样生活、工作，处在一种相对受到剥夺的地位。贫困线以下的群体意味着他们首先在物质和社会生活条件上处于一种相对于他人的匮乏状态，随之而来的是，他们无法履行一个社会中一般公民所履行的社会职能。这也就暗示贫困线会因国家和地区不同而各异，在同一个社

^① A.B.阿特金森.论贫困衡量方法[M]//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外贫困研究文献译第一册.北京：改革出版社，1993：314.

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甚至同一社会同一时间的不同区域，其具体标准也会不一样的；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贫困线也会同步提高。

2.2.2 绝对内核

贫困线无论从那个角度去定义，绝对视角、相对视角还是主观视角，都永远脱离不了对“满足基本需求”或者说“最低生活水平”的度量。虽然穷人的肤色、语言、饮食习惯和居住国度不同，乃至对生活需求的资源和范围都有很大的差别，但对维持生存的“基本需求”或“最低生活需要”的主要内容大致是一致的，这就像空气、阳光和淡水对于穷人和富人都同等重要，这就是贫困线的绝对内涵。长期以来，对于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人来说，这个绝对内涵是相对稳定的。斯坦·林恩（1985）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关系中对这一特征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虽然贫困的含义应同所涉及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但贫困的概念不可能是完全相对的。如森所陈述的：“在我们对贫困的看法中，有一个不可缩小的绝对贫困的核心。它把对饥饿、营养不良及可见的困苦的报告变成对贫困的判断而没有首先弄清有关的情况。”因此，就绝对贫困而言，相对贫困法补充了而不是取代了对贫困问题的分析^①。这样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划定贫困线，最关键的就是首先找到合理的“绝对内核”。它通常包含三层涵义：一是从绝对意义上讲，就是指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限度的饮食和居住条件，而不致受冻挨饿。二是从相对意义上看，就是指享有当时当地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相对属于数量最少的消费数据和服务。多数西方国家的贫困线就是以相对意义上的最低生活水平而确定的。三是从主观愿望看，就是过着一种当地大众认为十分寒酸（活得下去）的生活。

2.2.3 价值判断

贫困线的度量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文化和伦理问题。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在民族、文化、饮食习惯等方面的不同，加之对贫困的界定不一样，

^① 斯坦·林恩.走向贫困衡量尺度的第三阶段[M]//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外贫困研究文献译丛第一册.北京：改革出版社，1993：20.

所以形成贫困线的价值判断也各异。现实中不存在普世性质的贫困线。Fine and Asch（1995）认为贫困的衡量也是一种带有主观性的描述，它把主流社会认同的道德观念用于对贫困问题的分析和贫困社群的分类，形成了贫困烙印^①。从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贫困线。而且这种价值判断不是固定不变的，贝弗里奇（Bevridge,1993）指出：“在某种程度上，适当地确定人们维持生存需要什么是一个判断的问题，对于这一点的估计会随时间而变化，一般在一个进步的社区中，这种变化是向上发展的。”^②

2.2.4 度量尺度

贫困线的制定是一种福利的测量，在斯坦·林恩看来：“贫困应该被定义为多种福利问题的累积构成，即是指资源和生活方式两方面的问题而言。”^③在福利经济学中，经济福利的测量是从物品和服务的消费能力产生的福利效用函数开始的，对于任何个人、家庭的生存和福利来说，一定数量的货物和服务是必不可少的，缺乏获得这些物品和服务的经济资源或经济能力的个人和家庭也就跌入了贫困状态。考察福利无论是宏观的资源还是生活方式，还是具体的物品和服务都得使用一定的指标或指标体系，但无论如何它最终永远是一个量值。这些指标从资源空间上来讲可以是收入、消费、资产等货币指标，也可是健康、教育和社会参与等非货币指标，具体要根据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反贫困战略、财力和数据的可获取性来选择。

2.3 度量理论

从西方贫困研究的演进历程可以看出，贫困线理论脱胎于贫困理论。贫困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回答什么是贫困的问题？并以此为依据设定贫困线，界定贫困人口，设计反贫困政策。所以，理解贫困理论是理解贫困线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充分了解贫困理论的发展脉络，才能清晰地区分贫困理论与贫困线理论之间

^① 彭华民.社会福利与需要满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29.

^② 唐钧.中国城镇居民贫困线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17.

^③ 斯坦·林恩.走向贫困衡量尺度的第三阶段[M]//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外贫困研究文献译丛第一册.北京：改革出版社，1993:13.

的明显差别，并准确把握两者之间的联系。同时，实践中人们经常把贫困理论等同于贫困线理论。从而，要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谈到贫困线理论就不得不提及贫困理论。因此，下面从贫困线的基础理论来源和专有理论的诞生与发展两个方面来阐述这一关系。

2.3.1 贫困线理论的渊源

贫困线理论基础来源于贫困理论，早期贫困理论的代表性成果有马尔萨斯建立的关于贫困起因的理论，并且根据他自己认为是正常的人口增长的模型得出著名的悲观结论。马克思建立了一个体系，它把进步的果实归之于资本所有者。马歇尔的企业概念有贫困减少的进步的含义。然后庇古以福利计划来补充这个概念。但是现代经济学家还没有发现贫困是符合于他们的分析兴趣的^①。之后发展经济学家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出发形成了以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等为代表的自由派理论和以阿明的“依附理论”、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等为代表的激进派理论。联合国受自由派提出的“间接滴流理论”及罗斯托的“经济成长模式”影响而提出的“两个发展十年计划”。汤森、奥本海默、世界银行等主要从“缺乏”的角度对贫困进行的社会、精神文化研究。森（Sen）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作为“能力剥夺的权利贫困理论”等等^②。

这些理论构建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以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提出的“收入可能性曲线”和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中提出的“漏斗理论”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简称主流经济学；二是以霍布森、阿瑟·庇古和阿尔马蒂亚·森为标杆性人物的福利经济学派；三是以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的反贫困思想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派^③。20世纪60年代以来，更为抢眼的贫困理论研究成果是在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

^① (美)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 向穷人投资: 一个经济学家的见解[J].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1965, (11): 12.

^② 李泉, 王茜. 贫困的度量: 贫困线与公理化标准[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0, (01): 103.

^③ 更详细的论述见程丹峰. 中国反贫困——经济分析与机制设计[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不难看出，以上研究贫困的一般理论并不直接与贫困度量，特别是贫困线相关，其研究内容从性质上讲，只是一种理论性的工作，但在为反贫困理论发展和反贫困行动的有效进行提供理论基础的同时，客观上也为贫困线专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可算作是间接的理论基础。

2.3.2 贫困线的专有理论

真正从计量的角度来研究贫困的早期经典著作是，1889年英国的查尔斯·布什（Booth）的论著《伦敦人民的劳动与生活》和1901年本杰明·朗特里（Rowntree）的《贫困：城镇生活研究》，他们提出了贫困和绝对贫困的观念及度量方法，从此开启了一个贫困度量的新时代。之后经济学界对贫困线测量的研究日益深入，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这些成就是从围绕两个主题来展开理论研究的：一是贫困的识别，二是贫困的加总。对于贫困信息的加总，西方学者有许多成熟的方法和详细的评述^①，虽然没有人对贫困线的理论体系进行过完整的概括，本研究认为这一过程大体是按绝对论→相对论→主观论→剥夺论→能力论→多维论的逻辑推进的，从而形成贫困线的六个专有理论。其主要观点如下：

1. 绝对论

贫困究竟该从绝对还是相对角度来定义，一直是上百年来贫困研究中人们反复争论的一个问题。虽然这方面的讨论以森（Sen,1983、1985）与汤森（Townsend, 1985）的争论达到了顶峰，但是经济学家们还未就此达成共识。不过通常认为贫困的定义可以是绝对的，一直是一支强劲的力量^②，他们认为绝对贫困是一个客观的定义，“它建立在维持生存这个概念的基础上。维持生存就是延续生命的最低需求，因此低于维持生存的水平就会遭受绝对贫困，因为他没有足以延续生命的必需品。”^③最有代表性是朗特里（Rowntree,1899）的观点，他把贫困定义为“如果一个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不能支付家庭人口基本生存所需的食

^① 对贫困加总的讨论详见沃茨（Watts,1968）、福斯特（Foster,1984）、赛德尔（Seidl,1988）、瑞沃琳（Ravalion,1994）以及森（Sen,1997）的讨论。

^② 这方面更多的的讨论参见 Sen (1979,1983,1992)；Hossain (1990)；Atkinson (1989)；Hagenaars (1986)；Hagenaars & Van Praag (1985)；国民研究会 (1995)；Townsend (1979, 1985)；Nolan & Whelan (1996b)；、Ringen (1987)；Hagenaars & De Vos (1988)；Kaplteyn, Kooreman & Willemse (1988)。

^③ 唐钧.确定中国城镇贫困线方法的探讨[J].社会学研究,1997,(02): 62.

物、衣着、住房和燃料的最低费用”^①。所以绝对论是从人的生理或生存角度来认识贫困的，他们核心观点是贫困对于一定时点上相应的空间而言是固定不变的，并且从那一时点开始固定在一定空间的“绝对”数值上，它是与自身的客观需求比较的结果。

2. 相对论

与绝对论不同的是相对论则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认识贫困，它是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较的结果。如英国的彼特·阿尔柯克(Pete·Alcock)在《认识贫困》一书中指出“相对贫困是一种较为主观的标准，它直率地承认其中某些判断要素与确定贫困的标准缠绕在一起，……一个相对贫困的定义是建立在将穷人的生活水平与其它不贫困的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比较的基础上的，通常这包括对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的总体平均水平的测度。”^②这一概念已经被广泛地用于贫困的分析。Reynolds(1986)认为，相对贫困就是年收入相对低于全国全部家庭的平均数^③。英国政府使用的相对贫困是指相对于平均水平而言，个体缺乏日常生活所需的一些资源。或者说相对于平均水平而言，个体不能获得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全部资源^④。汤森(Townsend, 1984)则从能力的角度提出相对贫困是一个社会性的人在参与社会活动中能力不足的反映^⑤，使相对论讨论有了更广阔的空间。所以相对论视野中的贫困是一个社会道德范畴，属于社会公平的主题。它没有一个稳定的、具体的标准，只是相对于所在地的其他社会成员所拥有的消费资料而产生的贫困现象。该理论受到了OECD成员国的青睐，一直在使用此理论作为其贫困线制定的理论依据。

3. 主观论

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贫困居民具有不同的生活形态。贫困既是一种客观状态，同时也是一种主观感受，最了解穷人社会形态的莫过于穷人自己。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不同于上述的两种理论的主观论“试图通过大规模的调查

^① 吴国宝. 贫困线建立的理论和方法述评[J]. 经济学动态, 1995, (11): 70.

^② 唐钧. 确定中国城镇贫困线方法的探讨[J]. 社会学研究, 1997, (02): 62.

^③ 雷诺兹. 微观经济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④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课题组. 世界各国贫困标准研究[EB/OL]. 中国扶贫研究中心网, (2011-08-21) <http://www.iprcc.org.cn>.

^⑤ 彭华民. 社会福利与需要满足[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129.

直接得出贫困线以克服绝对和相对贫困线的武断”（Kristian Niemietz, 2011）^①。它假定个人是他们自己经济状况的最好的评判者，而不是远离他们生活情境的专家或第三者。主观贫困线方法通过设计问题来调查个人对于自己经济状况的评价，并在人们对于问题回答的结果的基础上通过计量模型推导出贫困线。

Hagenaars 与 Van Praag（1985）的实证性研究表明，主观论在某种意义上是绝对论和相对论的一个混合体^②。所以，它是与自己的主观意愿比较的结果。

4. 排斥论

“社会排斥”或称“社会剥夺”不仅是目前西方的一个热词，而且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政策的研究重点。关于社会排斥的研究文献已是汗牛充栋，而且新的研究文献还在不断涌现。就“社会排斥”一词来讲是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e Lenoir, 1974）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英国的汤森对此的研究引人注目，他运用“相对剥夺”来定义和度量贫困，认为“人们常常因社会剥夺而不能享有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该享有的生活条件。假如他们缺乏或不能享有这些生活条件，甚至因此而丧失成为社会一员的身份，他们就是贫困的”。^③上世纪80年代末，“社会排斥”概念很快被欧盟所采纳，成为反贫困行动3轮项目的主题^④。欧洲委员会把它定义为是一些个体因为贫困、或缺乏基本能力和终身学习机会，或者因为歧视而无法完全参与社会、处于社会边缘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得这些个体很少获得工作、收入、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无法参与社会和共同体网络以及活动^⑤。阿特金森（2005）认为社会排斥不仅包括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排斥，而且还包括来自生活其他方面的排斥，尤其是消费。

阿马蒂亚·森（2005）认为社会排斥理论的有益之处不在于其概念的新颖，而在于它极力强调关系特征在剥夺方面产生的重要影响，并指出“社会排斥”兼具建构性和工具性两种特征^⑥。在森（2005）看来社会排斥本身就是能力贫困的

^① Kristian Niemietz. A New Understanding of poverty: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M].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2011:44.

^② 曲大维. 主观贫困线研究述评[J]. 当代经济, 2011, (09)下: 166.

^③ 唐钧. 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 [J]. 江苏社会科学, 2002, (03):45.

^④ 自1975年以来，欧盟就开始更多地介入反贫困行动。在1975年到1994年期间，欧盟曾先后开展了三轮反贫困行动，分别是1975年到1980年、1984年到1988年，1989年到1994年。

^⑤ 李鑫宇. 社会排斥理论的界定及应用价值分析[J]. 人民论坛, 2011, (11)中:156.

^⑥ [印]阿马蒂亚·森. 论社会排斥[J]. 王燕燕, 摘译.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 (03): 2、4.

一部分。社会排斥本身不但是能力剥夺的一部分，而且也是造成各种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比如，对一个人就业或获取信贷等机会的排斥会导致他在经济上的穷困，而经济上的穷困反过来又会导致其他形式的剥夺（如营养不良或无家可归）。如果从能力不足的角度来审视贫困，那么，很显然我们可以用社会排斥来解析贫困^①。查里斯·戈尔（Charles Gore）在分析社会排斥的独到之处是，把社会排斥视作关系概念，从而为摆脱阿马蒂亚·森率先提出的社会弱势的福利主义观点提供了思路^②。

英国是欧洲国家中对社会排斥问题关注最全面并切实采取应对措施的国家之一，政府设立了社会排斥局，还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成立了社会排斥分析中心。这样对待贫困的研究由最初侧重于物质匮乏转变为社会不利状况，包含精神和符号方面的“社会排斥”概念逐步得以形成，进而得到欧洲委员会的认可，现已广泛流行于国际社会，用来分析解释各种社会现象，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工具。所以，它是与社会机会比较的结果。

5. 能力论

在发展中国家关于贫困理论和方法的辩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是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1992、1996、1999）的能力方法论。森提出人类的福祉应该通过直接观察人的能力，人们能做什么和做成什么进行衡量，这些构成发展的结果^③。这样森构建了一个分析贫困的可行能力框架，提出了能力贫困

（Capabilities Poverty）的概念。可行能力指的是人们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的能力（Sen, 1980、1984、1985）。森（Sen）的这个分析框架与传统的收入分析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于贫困成因的解释，突破了传统的收入贫困的概念。他认为尽管低收入与贫困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的低下，贫困的考察不能仅仅停留在收入上，而是可行能力的贫困，他关注的是通过扩大个人的选择范围来发展人的能力。

^② [印]阿马蒂亚·森. 论社会排斥[J]. 王燕燕, 摘译.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 (03):3.

^③、^④ Sabina Alkire & Moizza Binat Sarwar. 贫困和福利的多维测量[DB/OL]. 中国扶贫研究中心网, (2011-7-26) [http:// www.iprcc.org.cn](http://www.iprcc.org.cn).

他坚持认为个人的福祉是以能力为保障的。而贫困的原因就是能力的匮乏，而能力是由一系列功能构成的，它包括免于饥饿的功能、免于疾病的功能、接受教育的功能等等。作为一个社会人，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包括获得足够的营养、基本的医疗条件、基本的住房条件、一定的受教育机会等（Sen,1983）。这些功能的丧失不仅仅是贫困产生的原因，而且它们本身就是贫困的表现。这些功能不仅具有消除贫困的工具性价值，而且它们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人类福祉。如果一个家庭和个人缺少这些功能或者其中一项功能，那就意味着处于一种贫困状态^①。森对能力论的突破性贡献，带领人们认识和理解贫困进入了一个新的境地。但量化能力特别是量化实质自由的困难使其也引来不少的批评，为此森（1999）确定了与经济发展成就紧密相关五个有关自由衡量的工具，他们是：政治自由，经济设施，社会机会，透明性和安全性^②。从而使能力贫困的度量有了新的进展。因而，它其实是与社会发展比较的结果。

6. 多维论

其实能力方法是一种多维度的测量贫困和社会福利的方法，该方法不仅描述经济和社会部门引起的贫困和生活社会变化，而且全面描绘了人们自由价值享有和缺乏的状况。虽然森的能力方法关注发展的结果，但是人们也非常关心识别方法的效率问题（Sabina Alkire & Moizza Binat Sarwar, 2011）。学术界普遍认为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理论主要创始者同样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自 Sen（1976）提出多元贫困的概念以来，贫困的外延不断拓展，人们对贫困的认识也不断提升。多维贫困的核心观点是，人的贫困不仅仅是收入的贫困，也包括饮用水、道路、卫生设施等其他客观指标的贫困和对福利的主观感受的贫困^③。在森（2005）看来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观——贫困指的是不具备享有体面生活的能力，其思想源远流长。值得我们珍视的各种能力与功能有很多，因此，贫困的能力观必定是一个多维的观点^④。

^① [英]萨比娜·阿尔基尔. 贫困的缺失维度[M]. 刘民权, 韩华为,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ii.

^③ 王小林, Sabina Alkire.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估计和政策含义[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 (12): 4-10+23.

^④ [印]阿马蒂亚·森. 论社会排斥[J]. 王燕燕, 摘译.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 (03): 2.

有学者称多维贫困已经不是一个从政治或者哲学尺度上是否应该纳入操作规范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操作的问题（Wagle, 2008）^①。贫困维度的选择是多维贫困度量的关键，近年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Alkire, 2002a、Clark, 2002、Nussbaum, 2003、Hulme & McKay, 2008），但至今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UNDP 每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所使用的维度对各国来讲是一个较好的参考。自从 Bourguignon 和 Chakravarty（2003）研究多维贫困的度量问题以来，也有学者构造多维贫困指数（Chakravarty et al., 2005）^②，不过较有影响的还是 2010 年 UNDP 使用的多维贫困指数（MIP）。总之这是一个刚刚开启的领域，有许多问题和困难等待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来回答及攻克。所以，它其实是与社会表现比较的结果。

不难看出，以上六个贫困线专有理论无论是绝对论、相对论、主观论、剥夺论、能力论还是多维论，探讨的主题是从什么角度，以什么依据来制定贫困线，间或也关注什么是贫困和怎样看待贫困，及贫困形成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从根本上讲是如何认识和度量贫困的问题。并没有涉及贫困线的维度问题，即没有解决贫困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2.4 角色定位

贫困识别是贫困研究的基本问题。斯坦·林恩（1985）指出：“量化贫困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确定贫穷的个人或家庭。如果确定的对象不当，那么以后的全部判断都是谬误的，无论其目的是估计贫困的发生率即：贫困人口的比例，推测贫困问题的大小范围（例如：贫困缺口，即使所有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达到贫困线水平所需要的收入转移总额），还是分析贫困人口的组成（例如：穷人当中收入分布的情况），或对这一群体的社会——人口特征指标的统计”^③。显然，既要确定贫困的概念（什么是贫困？）也要明确衡量的办法（何者为穷人？）。

^① 叶初升，王红霞. 多维贫困及其度量研究的最新进展：问题与方法[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0，8 (06):8.

^② 叶初升，王红霞. 多维贫困及其度量研究的最新进展：问题与方法[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0，8 (06):5.

^③ 斯坦·林恩. 走向贫困衡量尺度的第三阶段[M]//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外贫困研究文献译丛第一册. 北京：改革出版社，1993：12.

在确定什么是贫困以后，接下来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将穷人和非穷人分开，这项工作首先得有个尺度，这个尺度目前在国际上最简单，也是最流行的方法就是制定贫困线。正如阿玛蒂亚·森所言：“贫困概念首先要回到一个问题是誰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消费标准（consumption norms）’或‘贫困线（poverty line）’也许能部分地完成这一任务：‘穷人’是消费水平低于消费标准的人，或者他们的收入水平低于贫困线”^①

贫困线在贫困度量中担当着以下角色：

2.4.1 甄别角色

扶贫第一要务是找到目标人群，即“扶谁”或者说判定谁是穷人？从理论上讲，甄别贫困一般是“假定我们在社会中，能够任意选择两人比较谁支配的资源更多，这样就可以把社会中的所有人按其‘贫穷’程度排队衡量出谁穷谁不穷？显然这种想法是做不到的，衡量贫困首先要确定贫困线；资源支配量低于贫困线水平才能属于穷”^②。特别是像中国这种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这种想法就更加不可能了。

所以识别贫困最流行，也是最简单地做法就是在目标人群中确定贫困线。找到这条线对于任何国家或地区，就知道什么算穷，什么是不穷？继而就可以将国民分成穷人和非穷人两个阵营，扶贫的对象也就自然圈定了。所以阿玛蒂亚·森对此深信不疑：“判定贫困的主流方法是明确设定一个‘贫困线（Poverty Line）’，收入低于此‘贫困线’者就可以认为是贫困者”^③。这种方法至今仍广泛使用。它最主要的是甄别出哪些是确实需要帮助的群体，以便以政府或其它组织的名义提供救助和补助。一旦划得过低，就会把大量事实上的贫困者排斥在贫困认定之外，而得不到公共财政应有的救助；划得过高，穷人虽然得到了及时的帮助，政府可能因此而背上沉重的负担，也影响了其它群体的积极性。

2.4.2 指导角色

^① [印]阿玛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7.

^② 西奥·戈德哈特，维克托·哈尔贝·施塔特，阿里·卡普坦，伯纳德·范普拉格. 贫困线的概念和标准[M]//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外贫困研究文献译丛第一册. 北京：改革出版社，1993：336.

^③ [印]阿玛蒂亚·森. 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M]. 王利文,于占杰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13.

贫困线作为识别“穷人”的工具，同时也是监测贫困变动和制定反贫困政策的主要依据。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政府或各级地方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反贫困政策中都要涉及到贫困线的测定问题，只有确定出一个科学的贫困线才能分出谁是贫困人口，测定出贫困人口的准确数量，并在此基础上弄清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离贫困线的距离有多大，匡算出所需的扶贫资金，从而制定相应的扶贫政策。香港学者莫泰基认为，制定贫困线有利于政府向公民发布贫困状况，避免政府隐瞒事实，亦可用于制定反贫困目标，成为反贫困政策的重要依据。香港乐施会和香港社会保障学会等机构也一致认为，“任何扶贫机构和扶贫政策的基础是贫穷线的制定，这样才可以量度贫穷问题的结构和严重性^①。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贫困线是反贫困的基础。

2.4.3 评价角色

正如世界银行指出的：只要把国际贫困线稍微调整几个美分就能对世界贫困人口的估计数产生重大影响，让上百万人“摆脱”或“回到”贫困^②。有了贫困线就可检测和评价政府或其他扶贫机构的政策或投入所产出的扶贫绩效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如何科学确定农村贫困线，应该说是全面描述和正确评估农村的贫困现状和脱贫进程、精确瞄准贫困人口及有针对性地采取反贫困对策进而提高扶贫实效的关键。

2.4.4 追因角色

测量贫困不仅仅反映的是个人的经历，而且还可以从总体上反映贫困的状况，因而它有助于形成关于贫困产生原因的假设，并对这些假设进行验证。贫困的测算可以反映一段时间内贫困的总体面貌，可以使政府或国际社会为自己设定判断行动是否正确的可量化的目标^③。通过贫困线可以挖掘贫困的原因，确定贫困的类型，从而为政府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地扶贫提供依据；另外通过比较不同时期贫困发生率的变化，可以把握贫困动态，预测贫困趋势，并从中寻找最有效的减缓和消除贫困的途径。

^① 刘祖云，刘敏.香港的贫困及救助:从理论到现实的探讨[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07):72.

^② 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编写组.世界发展报告 2000-2001 与贫困作斗争[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2001：21.

^③ 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编写组.世界发展报告 2000-2001 与贫困作斗争[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2001：21.

2.4.5 调节角色

贫困线直接影响一个国家贫困人口的数量计算，也直接影响政府扶贫投入的抉择公平。贫困线的变更和贫困的定义是社会公平和效率平衡的过程。具体地说，贫困定义的演进及其相应的贫困线反映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过程，不仅如此，它还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短期和长期的平衡过程，特别是在社会稳定受到贫困威胁的时候。它是政府在扶贫投入方面抉择公平的前提。贫困线作为一种实现社会公平的分配机制，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缩小人们之间收入水平差距的作用，以保证低收入者有足够的物质条件（接受教育、技能训练、身体保健等）参与社会竞争。但这种调节作用有四个约束条件。首先仅限于在“基本生活需要”方面缩小差别。其次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再次在个人消费品分配中只起到一种辅助作用。第四，这种调节是另外在保证社会效率的前提下进行的。目前西方一些国家纷纷削减福利支出，就是由于他们认为现有的“福利规模”已经影响了社会效率，影响了经济发展。所以，看似简单的贫困线的制定工作，其实背后反映的是效率与公平的抉择，最终在调节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贫困的度量如此之重要，但时至今日贫困识别问题却仍然制约着贫困问题研究的进行，特别是贫困线设定问题。布拉德肖和芬奇

（Bradshaw and Finch）曾使用三种不同贫困线对同样样本的贫困测算表明，三种贫困线识别出的贫困人口基本不存在重合^①。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研究中使用的贫困线不同，那么识别出来的贫困人口显然就会不同。

2.5 家族成员

研究农村贫困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划分贫困线的类别。只有科学地划分农村贫困线，才能够准确地分辨出贫困人口，测定贫困规模和分布及贫困程度，从而为制定有效的扶贫战略提供政策依据。在已有的研究中谈到贫困线的类别，人们总是自然地想到“绝对”与“相对”、“客观”与“主观”这些词语，其实这

^① 池振合，杨宜勇. 贫困线研究综述[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07):56.

是从制定贫困线的依据来看的。这里说的分类是从贫困线家族来看有哪些分类方法。

我们最常见的是两分法，除此之外，还有三分法、四分法和五分法等更为精确的分类方法。在各种分类法中，又细分为若干种子方法，下面就所收集到的文献作一个历史归结（见表 2-5）。

表 2-5 贫困线分类方法比较

序号	类别	分类依据	来源
<i>两分法</i>			
1	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	贫困线的性质	Martin Ravallion (2005)
2	初级贫困和次级贫困	家庭总收入	Rowntree (1901)
3	主观贫困线和客观贫困线	个体福利满足的方式	杨国涛 (2005)
4	狭义贫困线和广义贫困线	贫困线的范围	马俊贤 (2001)
5	内生式贫困线和外生式贫困线	贫困线的决定因素	Björn Gustafsson (1995)
<i>三分法</i>			
1	生存线、温饱线和脱贫线。	装入菜篮子中的内容	唐钧、王婴 (1995)
2	最低生存线、最低充足线和最低舒适线	家庭生活费用	Orshansky (1996)
3	绝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线和主观贫困线	贫困线的计算方法	张建华 (2010)
<i>四分法</i>			
1	特困线(活命线)、温饱线(贫穷线)、发展线(脱贫线)和小康线。	贫困程度	林闽钢 (1994)
<i>五分法</i>			

1	特困线、温饱线、发展线、小康线 和富裕线	社会层次	童星, 林闽钢 (1994)
---	-------------------------	------	-------------------

来源：自己编制。

上述种种划分的关系:其一,对贫困外延的划分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和“五分法”。“四分法”和“五分法”是对贫困程度所作的划分。二分法可以说是国际上对贫困划分的一般理解。三分法则似乎富有“东方的”或“华人社区的”色彩,它更为详细地分析了贫困的实情,指出介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间还有一部分上下浮沉,不稳定状态的贫困者。于是干脆也把他们分为一类,这就是莫泰基说的“基本性的贫困”、江亮演说的“极贫”和童星、林闽钢说的“生活贫困”。就定量研究、可操作性和在制订政策时的实用性而言,三分法可能更为有用。其二,童星和林闽钢的论著中,将绝对贫困(包括生存贫困和生活贫困)和相对贫困看成两个(或三个)程度不同又相互衔接的独立概念,这给我们以启发,因为他们将这几个曾在西方为之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概念统一到一个概念框架中了。我们赞同这种划分方式,但在理解上有所不同,倾向于将绝对贫困看成是一个内核,贫困的程度或对贫困理解的范围以它为核心向外扩展,第一波是基本贫困,第二波是相对贫困,然后是其它贫困。与童星、林闽钢的诠释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均以绝对贫困为圆心,提到基本贫困时,已包含绝对贫困了;再提相对贫困时,绝对贫困自然还是它的圆心。其实,世界上有许多关于贫困的研究都认可上述的逻辑关系。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发展中国家1985年的贫困状况的统计可作佐证,它将贫困状况分为“赤贫”和“穷人”,而特别注明“穷人(包括赤贫)”。

分类法的变化趋势:这种变化是向三个方面发展的,一是向对立角度提出认识,如 Björn Gustafsson (1995) 的内生式贫困线和外生式贫困线。二是向整合方向发展,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待和认识贫困线,张建华(2010)从计算方法上提出的绝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线和主观贫困线就是典例。三是向系统化方向发展,从更深、更细的角度来理解贫困线,童星,林闽钢(1994)的分类就是这样。总体来说,第一、二种趋势分别在两分法和三分法方面较为突出,第三种趋势在四分法和五分法方面更为明显。

这些多样的分类既进一步明确了贫困线的个性，为我们全面认识贫困线家族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为贫困线的制定时的选择带来纠结，究竟选哪一种贫困线更为合适呢？。

2.6 构造方法的归纳

提起贫困线的构造，人们总是无可争辩地给了(Charls Booth, 1889)和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对伦敦的贫困研究(Rowntree, 1901)。对此《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给了历史性的评价：“通常认为在央格鲁萨克逊世界对贫困的科学研究是从十九世纪末布思和朗特里的考察开始的”^①。后面的追随者和开拓者对此乐此不疲，探索出绝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线→主观贫困线→社会剥夺贫困线→共识型贫困线→综合贫困线的逻辑主线。

2.6.1 绝对贫困线

绝对贫困线测定的经典性方法是由朗特里(Rowntree)提出。1899年他在研究约克郡的贫困时创建的。其理论假设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下，应该存在某种最低水平的基本需要，包括物质性和社会性的需要，而且这种基本需要应该是常态的。所以他在创建约克郡的贫困线时，首先提出了仅仅维持身体正常功能所需要的“一篮子”生活必需品清单，如食品、衣服、房租和取暖等的种类和数量；然后，以当时各种商品的最低市场价格，得出足以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②。绝对贫困线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水平平等，就是处于贫困线上的个体必须具有相同的生活水平，而不管其生活环境差异如何。换句话说，要根据个体的生活环境对贫困线做出调整，以期个体之间的平等对待。第二知晓影响个体生活环境的主要因素，诸如年龄、性别、种族、气候条件、工作性质和行业等。第三一致性，就是实际的贫困线不会因空间和时间的变化而改变^③。

^① 约翰·伊特韦尔，默里·密尔盖特，彼得·纽曼.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 K-P[K].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997.

^② B. Seebohm Rowntree. Poverty: A Study of a Town [M]. Life. Bristol: policy Press, 2000: 110.

^③ 张建华. 贫困测度与政策评估——基于中国转型时期城镇贫困问题的研究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101: 46.

在绝对理念的指导下产生许多具体方法，成为一个庞大的贫困线家族，其中最耀眼的成员有：基本需求法（CBN）、食物热量摄入量（FEI）、马丁法、恩格尔系数法、国际贫困线和数学模型法，下面主要从他的理论假设、数理公式和现有争论三个方面做一归纳。

1. 基本需求成本法（CBN）

它有多个名字，常称预算标准法(Budget Standard)、市场菜篮子法(Shopping Basket Method)，也称标准法、必需品法，还称生物学法或营养构成法，是至今为止最古老、使用最广泛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由英国的朗特里 1899 年在研究英国的约克郡的贫困时创建的，自此以后有无数的例子，包括美国官方贫困线也是使用此法^①。马丁·瑞沃琳曾认为在实践中用“基本需要成本”（CBN）法是构造贫困线最常见的方法之一^②。

它的基本假设是人的生存必须拥有一定的生活资源，这些资源从市场中获得必须支付一定费用。通常先规定一个足够满足“基本消费需求”的消费篮子，然后再估计其每一个用来进行贫困比较的组群的成本属性。贫困篮子是典型的锁定在特定的环境下与常见饮食一致的食物能量需求。然而，非食品类商品津贴也包括在内，以确保基本非营养需求也得到保障^③。所以，最终贫困线是食物贫困线（ Z_f ）和非食物贫困线（ N_f ）之和。其中非食物贫困线的确定是一个难点，一般通过两种方式加以解决：一种是直接选择非食品支出项目，在实践中由于缺乏选择的标准，很少这么做；另一种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确定食品支出的份额。如果食品按 1/3 的份额假定，贫困线就是食品贫困线的 3 倍，非食品贫困线也可以相应地推算出来，奥珊斯基（Orshansky）就是用这种方法在 1965 年制定美国贫困线的，并使用至今。

当然，更常用的是将必需的食物支出乘以一个反映食物支出与非食物支出之间比例关系的系数。这样贫困线就可以表示为：

$$Y^* = [P \times X_p^*] / FR \quad (1)$$

^① 见 Orshansky (1963) and Citro and Michael (1995).

^② 对该方法和选择方案的概述在实践中的表现，见 Ravallion(1994、1998).

^③ Ravallion Martin, Lokshin Michael .Testing Poverty Lines [J]. Review of Income & Wealth, 2006, 52(03): 402.

其中 x_p^* 为食物消费束， P 为相应的价格向量， FR 是样本中所有家户的食物支出占总支出的平均比例。

沃茨(WattS)对这种方法也较为青睐，专门列出了它的四种用途：（1）提供一个既定家庭形态的生活水准常模；（2）可被用来比较不同家庭形态的生活水准；（3）可被用来比较不同时间的的生活水准；（4）可被用来比较不同区域的生活水准^①。近年来有的学者进一步把它分为合意预算标准法 (con-sensual budget standards, CBS)、可接受最低生活成本法 (low cost but acceptable) 和最低健康生活收入法 (minimum in-come for healthy living)^②。乃至一些国际组织如世行、国际劳工组织还常使用这种方法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进行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2. 食品能量摄入量 (FEI)

该方法是根据维持人们生存所需要的食物摄入量来构造贫困线的。其理论假设是食品能量的摄入和消费支出水平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人体能量摄入的多少是由其消费食物种类和数量所决定的，而消费食物的种类和数量则是由收入决定的，所以在一定时期内人体能量摄入量由其收入决定。我们知道，食品能量摄入是个随机变量，随着生活环境、活动水平、饮食习惯和支出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个体或者同一个体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上基本需求会有较大的差异，因此理论上确定一组固定的食品能量的需求是十分困难的。

常见的处理方式是：通常假设一个代表性个体的营养需求量作为该群体的参考值，然后用人口比例作为权重求出平均值，最后换算成相应的货币价值。这种方法受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③，格雷尔和索贝克 (Greer and Thorbeche, 1986) 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建立了人体能量摄入量与食物消费支出的表达式：

$$\ln C = \alpha + \beta k \quad (2)$$

式中， C 代表食物支出额； k 代表能量总量； α 和 β 为待定参数。则食物贫困线为：

^① 唐钧，王婴. 我们往“菜篮子”里装什么[J]. 民政论坛, 1995, (5): 4.

^② Christopher Deeming. Minimum income Standards: How Might Budget Standards be Set for the UK? [J]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005, 34(04): 621.

^③ 更多论述国外学者见 Greer and Thorbeche (1986)、Paul (1989)、Ahmed (1991) Ercelawn (1991)、Ravallion (1994) and Fambon et al. 2000; 国内学者见陈永昌 (1990)、童星, 林闽钢 (1994)、刘富成 (1998)、杨国涛 (2005) 和杨宜勇 (2012 等)。

$$Z_f = e^{(\hat{\alpha} + \hat{\beta}k)} \quad (3)$$

这里， Z_f 代表食物贫困线； $\hat{\alpha}$ 代表 α 的估计值； $\hat{\beta}$ 代表 β 的估计值。国际上一般将 k 设定为维持人体生存最低能量摄入量人均每天2250大卡，中国人均每天2100大卡。此法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应用。

3. 马丁法

如前所述，贫困是对福利的度量，绝对贫困是由基本需求和收入水平两个变量所决定的。如果一个社会收入分布为既定条件，那么贫困状况就取决于维持基本生存所需要的消费水平，在维持基本生存的各类消费品种中，食物支出是维持生存的物质基础，所以在绝对贫困线制定过程中都强调食物支出，即食物贫困线的确定^①。马丁·瑞沃林(Martin Ravallion)更是认为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贫困线应当总是绝对的，绝对贫困线更好地为反映贫困政策提供了信息。通常讨论对贫困线的估计方法是对绝对贫困的估计(Ravallion, 1997)^②。为此他提出了计算两条贫困线：一条是“低的”贫困线，即食品贫困线加上最基本的非食品必需品支出；一条是“高的”贫困线，是那些达到食物贫困线的一般住户的支出。其基本原理依然是是贫困线=食物贫困线+非食物贫困线。即： $Z=Z_F+N_F$ 。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非食物贫困线。马丁的处理思路是：将那些刚刚能够达到食品营养要求的家庭的非食物商品需求，也就是说消费总量刚达到食品贫困线的家庭通常的非食物消费作为低的非食物贫困线；而将那些实际达到食物贫困线的家庭的非食物消费金额作为高的非食物贫困线。而这一切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当一个家庭的总支出等于食品贫困线时，该家庭为了获得基本的非食物需求而愿意放弃的食品需求部分，就是基本的非食物需求。其几何解析见图2-2。

^① 池振合、杨宜勇.贫困线研究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 (7): 57.

^② 杨国涛. 贫困线理论及其在中国农村的实践[J].乡镇经济, 2005, (09):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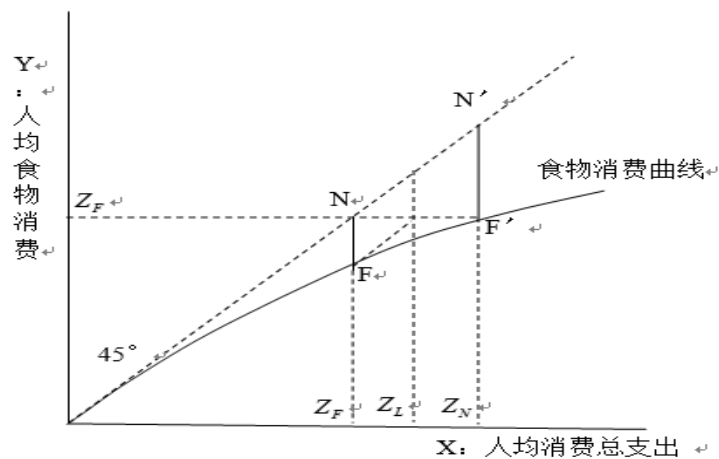


图 2-2 马丁法的几何解析

资料来源：谭诗斌. 现代贫困学导论[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135。

图 2-2 中横轴和纵轴分别代表人均消费总支出和食物消费，曲线 F' 是估计出来的食物消费曲线，纵轴上的 Z_F 代表食物贫困线。如果一个家庭愿意牺牲自己的基本的食物消费而获取少量的非食物消费，这就产生了低的贫困线： $Z_L = Z_F + N_F$ ；如果一个家庭的食物消费刚好等于已测得的食物消费贫困线，那他的非食物消费就是 N'_F ，这样就产生了高的贫困线： $Z_N = Z_F + N'_F$ 。

为了完善此方法，马丁还建立了食物消费函数的回归模型：

$$Y_i = a + b \ln(X_i / Z_F) \quad (4)$$

式中 Y_i 表示 i 家庭的食物消费支出， X_i 表示 i 家庭的生活费用总支出， Z_F 为食物贫困线， a 、 b 为函数系数。中国从 1995 年开始引入此方法制定农村贫困线。

4. 恩格尔系数法

恩格尔系数是目前国际公认的较为简单易行的用于分析特定国家或地区民众生活水平和贫困程度的方法。它的基本假设是：由于食物消费达到一定水平后会相对稳定，不会随收入或消费的增加而提高。因此，恩格尔定律的含义是，如果一个人或者家庭越贫困，那么他就必须将更大比例的收入用于维持基本生存的支出，也就是说他必须将其更大比例的收入用于食物支出。其操作方法是首先确定一个最低食物支出标准，用这一标准除以恩格尔系数贫困值（即 0.6），便得到了绝

对贫困线。所以，使用恩格尔系数法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食物支出。常用计算公式为：

食物支出对总支出的比率：

$$R_1 = \frac{\text{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text{总支出变动百分比}} \quad (5)$$

或食物支出对收入的比率：

$$R_2 = \frac{\text{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text{收入变动百分比}} \quad (6)$$

R_2 又称为食物支出的收入弹性. 也可以表示为：

$$\text{贫困线} = \frac{\text{基本食物支出}}{\eta} \quad (7)$$

η 为恩格尔系数。联合国粮农组织根据恩格尔系数高低提出确定贫富程度的标准：系数在 60%为绝对贫困，在 50-59%，为勉强度日，40-49%为小康水平、30-39%为富裕，30 以下为最富裕。所以，不少国家常采用 60%的恩格尔系数来计算贫困线就是源于此。

5. 国际贫困线

国际贫困线起源于 1990 年，实际上是由多条贫困线组成，至今为止常用的有 3 条：一是用于发展中国家的“1 天 1 美元”贫困线；二是用于发达国家的“1 天 2 美元”贫困线；三是用于洲际的贫困线，如亚行制定的“1 天 1.35 美元”的贫困线。世界银行为了进行国家间的贫困问题的比较和评估，对有贫困标准的 34 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进行了研究，发现如果按 1985 年购买力平价

(PPP) 计算从每年 200 多美元到约 3500 美元不等，而且贫困标准与各国居民收入水平成高度正相关。其中 12 个最贫困国家的贫困标准集中于 275—370 美元。世界银行在这一年即采用了 370 美元作为国际通用贫困标准衡量各国的贫困状况，同时为了有效地反映印度、孟加拉国、印尼、埃及、肯尼亚等国的贫困变化，将 275 美元(约合 1 天 0.75 美元)作为国际通用赤贫标准。而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接近 1 天 2 美元，这就是“1 美元 1 天”和“1 天 2 美元”贫困线的由来^①。

^① 王萍萍.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的比较[J].调研世界, 2007, (01):5.

之后又作了两次调整，1994年，世界银行按1993年的购买力平价重新测算，10个最贫困国家的平均贫困线约为每天1.08美元，而发达国家的贫困线没有变化，因而更加深入人心。2008年8月26日，世界银行按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和75个国家的贫困数据对这两条贫困线进行了修正，结果是75个国家的贫困线中位数是60.81美元/月，相当于每天2美元，其中15个最不发达国家贫困线的平均数为每天1.25美元，如扣除后者，其余60个国家（含转型国家）的贫困线中位数相当于每天2.5美元。据此，世界银行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贫困线分别提高到“1天1.25美元”和“1天2.5美元”，按此标准2012年2月重新测算了各国的贫困状况如表2-6^①。

表 2-6 全球贫困状况

地区	1.25 美元/天					
	贫困人口比例 (%)			贫困人口 (百万)		
	1981 年	1990 年	2008 年	1981 年	1990 年	2008 年
东亚和太平洋	77.2	56.2	14.3	1096.5	926.4	284.4
其中：中国	84.0	60.2	13.1	835.1	683.2	173.0
东欧和中欧	1.9	1.9	0.5	8.2	8.9	2.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1.9	12.2	6.5	43.3	53.4	36.8
中东和北非	9.6	5.8	2.7	16.5	13.0	8.6
南亚	61.1	53.8	36.0	568.4	617.3	570.9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51.5	56.5	47.5	204.9	289.7	386.0
总计	52.2	43.1	22.4	1937.8	1908.7	1288.9
总计（除中国）	40.5	37.2	25.2	1102.7	1225.5	1115.9

表中显示全球最新贫困人口为12.9亿，占总人口的22.4%。当前南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仍是贫困人口光顾的重点区域。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反贫困绩效为世界所瞩目，从1981年的8.35亿下降到2008年的1.73亿，如果扣除中国的减贫人口，27年间世界贫困人口不但不减反而略有增加。

^① 王小林. 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34.

“1天1.35美元”贫困线。亚洲开发银行（ADB）2008年提出了一项衡量亚太地区贫困程度的新方法。他们使用基于贫困人口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比价的购买力平价方法，专门搜集了贫困人口的购物地点、购物内容、购物数量，以及所购商品的质量数据。研究发现16个国家在2005年共有10.42亿人口生活在每人每天1.35美元的标准以下，而当使用了更健全的贫困购买力平价时，评估结果则下降到8.43亿人。该研究确定了适用于亚太地区的贫困线为每人每天1.35美元。

6. 数学模型法

用数学模型确定贫困线的方法是一种新的方法，比较有影响的有两种方法：“线性支出系统”（LSE）和收入与营养摄入量分析模型。前一种使用的较多，这里我们侧重来关注后者。它的独特之处在于：（1）用相对数形式来测定营养摄入量，即用实际摄入量除以最低需要量，从而避免了在食品质量、价格等方面选择的困难。（2）采用成人当量单位，就是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口数量转换成标准成人单位计量，从而克服家庭人口规模和成员结构的影响。（3）用回归分析建立收入与营养状况的关系，避免了非食品支出确定中的常见困难。

它的理论假设是人们的工作能力和状况同营养的摄入数量和结构密切相关，而工作能力和状况又与收入有联系，因此收入同营养的摄入数量和结构也有联系；如果能恰当地确定营养必需量，就可以确定必需的最低收入，从而也就可以确定相应的贫困线。这样就可以得到收入与营养摄入量的回归模型：

$$\ln\left(\frac{X_{jk}}{m_{jk}}\right) = \alpha + \beta_0 \ln\left(\frac{\bar{Y}_{ojk}}{Y_{ojk}^*}\right) + \sum_{i=1}^n \beta_i \ln\left(\frac{Y_{ijk}}{Y_{ijk}^*}\right) + \mu_{jk} \quad (8)$$

其中， X_{jk} 表示第k职业的第j家庭的总消费支出； m_{jk} 表示第k职业第j家庭的成人当量数。 \bar{Y}_{ojk}/Y_{ojk}^* 表示第k职业第j家庭的热量摄入量与最低需要量的比率。

Y_{ijk}/Y_{ijk}^* 表示第k职业第j家庭对第i类营养要素的摄入量与最低需要量的比率。这里 $i=1, 2, \dots, 7$ ，分别代表蛋白质、维生素A、钙、铁、维生素B₁、维生素B₂等。 μ_{jk} 为误差项。回归方程中的参数 α 、 β_0 、 β_i 可以运用OLS或加权OLS方法求得，这样所要确定的贫困线值就是 $e^{\hat{\alpha}}$ 。这是因为：

$$e^{\alpha} = \left[\frac{x}{m} \left(\frac{\bar{y}_0}{y_0^*} \right) = \left(\frac{y_1}{y_1^*} \right) = \left(\frac{y_2}{y_2^*} \right) = \dots = \left(\frac{y_7}{y_7^*} \right) \right] = 1 \quad (9)$$

其他方法：诸如食品份额法、超必需品剔除法、人息替代法、编制贫困指数法、消费效用函数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法和洛伦兹曲线在原理上和以上方法没有什么两样，就不再赘述。

表 2-7 绝对贫困线的方法比较

方法	基本假设	争论
基本需求成本法	人的生存必须拥有一定的生活资源，这些资源从市场中获得必须支付一定费用。	(1) 谁来决定应该装入“菜篮子”中的项目和数量；(2) 限制了受助者的自由选择权；(3) 计算出的贫困线往往偏低。
食品能量摄入法	食品能量的摄入和消费支出水平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人体能量摄入的多少是由其消费食物种类和数量所决定的，而消费食物的种类和数量则是由收入决定的，所以在一定时期内人体能量摄入量由其收入决定。	(1) 人体的营养需求多种多样，仅用热量来衡量有片面性；(2) 即使是达到了热量的基本标准，也不能保证每种营养都达到了维持人体生存的最低标准；(3) 违背了一致性原则。
马丁法	当一个家庭的总支出等于食品贫困线时，该家庭为了获得基本的非食物需求而愿意放弃的食品需求部分，就是基本的非食物需求。	(1) 两条贫困线往往会使人莫衷一是；(2) 操作上较为复杂；(3) 非食物线的计算仍存在很大争议。
恩格尔系数法	由于食物消费达到一定水平后会相对稳定，不会随收入或消费的增加而提高。	(1) “绝对主义”明显，得出的贫困标准往往偏低；(2) 忽略了构成基本生活其他因素，如衣、住、行、医等。

国际贫困线	在根据各国生活费用差别进行调整后，每天 1 美元是在发展中国家维持温饱生活的平均最低消费。	(1) 在概念和方法论上一直受到攻击，无法准确地把握发展中国家的最低生活水平； (2) 无法作为国家的贫困线，只能用于统计和检测；(3) 因各国的消费习惯不同而产生扭曲。
数学模型法	人们的工作能力和状况与营养的摄入量密切相关，而工作能力和状况又与收入有关，因此收入状况与营养摄入量和结构有密切关系。	(1) 最低营养的量还是有些武断；(2) 单纯靠营养的基本需求量来确定的贫困线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

来源：自己编制。

综上所述，绝对贫困线方法的出发点是必须满足人对吃、穿、住等基本生活的需要。朗特里首先使用这种方法进行调查。但在这方面最著名的是奥珊斯基。实际上，我们尽管强调了这种方法的“客观性”，但在衡量基本需要时，首先必须采取若干主观行动。可以说，该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专家进行人与人之间生活水平的对比，以便确定需要内容^①。加之该方法没有考虑到穷人的社会需求和如何确定必需品的种类和数量仍然存在争议，所以，探讨“相对性”和“主观性”就成为了一种可能的选择。

2.6.2 相对贫困线

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人的行为总会受到社会的多方面影响，所以与维持基本生存的能量标准相比，社会在决定人类个体行为方面具有更加重要的影响。上世纪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绝对贫困线过于“苛刻”的做法受到了多方面批评，英国经济学家汤森 (Peter Townsend) 是这一时期的最有代表性的斗士，他与阿玛蒂亚·森 80 年代关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辩论把这一时期的争论推向了

^① 西奥·戈德哈特，维克托·哈尔贝·施塔特，阿里·卡普坦，伯纳德·范普拉格. 贫困线的概念和标准[M]//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外贫困研究文献译丛第一册. 北京：改革出版社，1993：337.

高潮。他对绝对贫困线提出了最为严厉的批评：“最低需求理论‘令人担忧’，不仅仅是因为它忽视或低估了某些社会需求，而且是因为这种忽视或低估可能影响到政策建议。”他提倡的观点是：“人类的需求从根本上看是社会性的，所以要想分析和阐述生活水平和贫困就必须以社会为基础。”^①。汤森（Townsend）摒弃了绝对贫困概念重新提出了一个相对贫困概念。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个人、家庭、群体由于资源匮乏而不能获得各种饮食，不能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没有社会公认的居住设施，或者上述项目得不到广泛赞同，那么他们就处于贫困之中。在汤森看来他们所使用的资源远远低于一般个人或者家庭支配的资源量，以至于他们无法享有正常的生活方式，没有社会所认可的生活习惯，不能参加正常的社会活动^②。这样他把贫困看成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相对剥夺的一般形式，从而开创了相对贫困线的研究(Townsend, 1954、1962、1970a)。因此，计算相对贫困线的关键在于确定一个社会公认的生活方式。

相对贫困线所依据的理论假设是：如果某一家户的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相比低很多，那么该家户就不可能充分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确定相对贫困线通常的做法，就是将某一国或地区的平均收入或中位收入乘以一个特定比例，即纯粹的相对方法(Pure relative method)^③：

$$Y_i^* = [S_i(1/N) \sum_{i=1}^N Y_i / S_i] x \% \quad (10)$$

其中 Y_i^* 代表第 i 个家庭的贫困线， Y_i 代表第 i 个家庭的实际收入， S_i 代表第 i 个家庭的等值算子（反映一个家庭在人口、结构、地域等方面的特征）， $x\%$ 代表贫困线与社会平均收入之间的比例。

具体方法除我们熟悉的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之外主要有：

1. 食物比例法

大多数的研究者通常把这种方法作为绝对贫困线的方法，1965年它因由美国的奥珊斯基提出并用于美国贫困线的制定而扬名，习惯称奥珊斯基(Orshansky)贫困线。但在世界知名的研究贫困专家伯纳德·范普拉格，简·S·斯皮特和赫伊

^① 谭诗斌.现代贫困学导论[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143.

^② 池振合，杨宜勇.贫困线研究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7): 59.

^③ 李博.贫困线测定问题研究综述[J].当代经济，2008，(02)(上):41.

伯·范德斯塔特看来，它是一种专门制定相对贫困线的方法，并为之取名为“食物比例法”，把它与莱登贫困线作了比较。其作法如下：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研究，按照年龄、性别等个人特征制订了一个“经济的”饮食计划。无力负担“经济”饮食的人属于穷人。据此标准可以计算出各类家庭的饮食开支。美国家庭大约平均将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饮食。根据这一情况，贫困线一般定为经济饮食费用的三倍。以后尽管略有修改，但这一方法依然是美国社会安全署制定贫困指数基本定义的方法。加拿大曾使用过这个方法，按此方法制订的贫困线为食物比率贫困线^①。关于食物消费占三分之一的由来，是奥珊斯基 (Orshansky) 在研究美国典型家庭的消费结构时，发现在呈“S”型的恩格尔曲线上拐点正好处在 0.30 的位置上，从而，她认为拐点上的家庭就是贫困家庭，这样贫困线公式为：

$$\text{贫困线}(Z) = \text{适量的食物消费} \times 3 \quad (11)$$

不过正如其他人指出的，这个方法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由专家相当武断地规定经济饮食。避免这一缺陷的办法是以观察到的恩格尔函数作为概念基础，为此，普拉格等人 (Praag et al, 1982^②) 对此进行了改进，并引入家庭规模因素，这样贫困线就变成：

$$\ln Z = \frac{(\alpha + \beta_0 \ln f_s - \ln \varphi)}{1 - \beta_1} \quad (12)$$

则 Z 为：

$$Z = e^{\frac{(\alpha + \beta_0 \ln f_s - \ln \varphi)}{1 - \beta_1}} \quad (13)$$

式中，Z 为贫困线； f_s 代表家庭规模； φ 代表处于贫困线上居民食物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 α 、 β_0 和 β_1 为待定参数。

2. 收入比例法

收入比例法有两种方法：平均收入比例法和收入等份比例法。第一种方法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平均水平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线。它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在调查其会员国的社会救助标准时偶然发现的，后经贝克曼 (W. Beckerman) 教授加以系统化。该组织认为，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

^① ^② Bernard M.S. Van Praag, Jan S. Spit, and Huib van de Stadt.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ood Ratio Poverty Line and the Leyden Poverty Line [J].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1982,(03):691-692.

上反映了一定生产力水平下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所要求的平均消费价格。社会救助是以满足最低生活消费为目的的，这种最低消费水平的确定可以以一定时期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为依据，向下进行一定比例的调整。一般情况下，最低社会标准相当于社会平均收入的 50%~60%。这就是欧盟贫困线的萌芽，从 2000 年起欧盟国家普遍采用人均收入低于收入中位数 50%作为贫困线，OECD 31 个国家不再制定基于绝对贫困的官方贫困线（World Bank,2005）^①。

为了更加完整地展示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状态，在贫困比较研究中，学者们喜欢同时选定多个不同的百分比作为贫困线。如 Hageaas（1995）等提出的“欧洲三标准”：他在分析上世纪 80 年代欧洲各国的贫困状况时，就使用了三个标准作为衡量该地区的的贫困线，即平均收入和收入中位数的 40%、50%和 60%。Christina Behrendt（2002）提出贫困线的四个层次：他把民众收入中位数的 30% 视为“极端贫困线”、40% 视为“严重贫困线”、50% 视为“温和贫困线”、60% 视为“近乎贫困线”，对生活在不同贫困状态下的多个国家的民众进行研究^②。

另一种是收入等份比例法。首先这一方法是把全体居民按收入从低到高排序后，按收入分成 5 个或 10 个等份，并确定其中某一比例的最低收入群体为贫困群体，而他们当中的最高收入即为贫困线。一般是把占全体居民总数 5%或 10%的最低收入群体作为贫困群体。

表 2-8 相对贫困线的方法比较

方法	核心思想	优势	争论
食物比例法。	用一个指定的生活必需品开支占收入的比例或达到这一指定比例时的平均收入水平作为区分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分界线。	简单的概念基础。	（1）武断地规定经济饮食；（2）为何恩格尔系数只能是三分之一，缺乏科学依据。
收入比例法	它是把贫困看作一个不公	（1）计算极为简单；	（1）收入平均数法缺

^①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课题组.世界各国贫困标准研究[R].2010, (01)1.

^② 顾 昕.贫困度量的国际探索与中国贫困线的确定.天津社会科学, 2011, (01): 61.

	平的问题而产生的作法。 这里贫困线被定义为平均收入水平即中等收入水平的一部分。	(2) 便于国家(地区)间的比较。	乏理论解释和科学根据; (2) 收入等份的逻辑本末倒置; (3) 具有随意性。
莱登法	如果收入低于某个水平, 例如按照 0—1 标准在 0.4 或 0.5, 这个人就属于贫穷。	(1) 有明确的理论基础; (2) 家庭人口弹性系数低; (3) 简明。	(1) 一般偏高; (2) 地区之间差异大。
生活形态法	只要人们拥有必须的资源, 那么人们都希望能够以社会所普遍认同的生活形态生活。过这种生活所必须的资源数量就是贫困线。	(1) 沟通和融合了主观和客观; (2) 使贫困的定义和度量趋于多元化。	(1) 理论上抽象, 方法上太复杂; (2) 临界点的确定 (3) 剥夺指标的选择和加总。

资料来源: 自己编制

其他具有相似原理的商品相对不足法、收入替代法(Income Proxy Measure)、指标遗缺法(Deprivation Indicators)、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和恩格尔系数就不一一介绍。

尽管相对贫困线的方法避开了对于最小生活成本的纠结, 它从平等的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理解贫困, 认为贫困是一个纯粹相对的现象并考虑到社会评价的因素。但是, 批评者称这种方法在普遍意义上的一个缺点在于, 如果全社会的收入同比例的增加或减少时, 则贫困人口会保持不变 (Flick 和 Praag 1991; Ravallion, 1998)^①。同时, 这种方法不能提供我们穷人的真实生活状况。另外相对贫困线接近于不平等的描述, 因而应用于贫困线的计算时也受到了质疑(Sen, 1985)。所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成员国开始采用贫

^① 曲大维. 主观贫困线研究述评[J]. 当代经济, 2011, (09)下:166.

困风险(at Risk of Poverty)、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剥夺指标(Deprivation Index)等概念来测量贫困线^①

2.6.3 主观贫困线

贫困既是一种客观状态，同时也是一种主观感受。不同的生活形态背后体现的是不同地区的贫困居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就生活状况而言，贫困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其具有与其它非贫困居民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行为。同时，由于经济社会地位相似，决定了贫困居民群体具有相似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行为。一般而言，这种生活形态特征是可以被其它普通居民所辨别的。不同于上述的绝对贫困线与相对贫困线方法，主观贫困线的理论假设正是基于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对于贫困的理解，它假定个人是他们自己经济状况的最好的评判者，而不是远离他们生活情境的专家或第三者。主观贫困线方法通过设计问题来调查个人对于自己经济状况的评价，并在人们对于问题回答的结果的基础上通过计量模型推导出贫困线^②。

打开这扇门的是荷兰的几位经济学家西奥·戈德哈特、维克托·哈尔贝施塔特、阿里·卡普坦、伯纳德·范普拉格，他们提出了一个定义贫困线的新的方法——主观法。他们在总结以往贫困线方法的基础上探讨了主观贫困线的经典方法莱登贫困线(Leyden Poverty Line, LPL)^③。1977年和1980年戈德哈特和范普拉格等人也对这个方法作过介绍，其实“莱登贫困线”这个定义来自于1968年范普拉格介绍的个人收入福利函数，戈德哈特等称这条贫困线为“政治性贫困线”。他们认为个人是他们自己生活状况的最好鉴定人；与食物开支占收入的比例相比，对收入评价问题的个人主观答复，更能够表示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④。其理论假设是如果个人的收入低于某个水平，例如按照0—1标准在0.4或0.5，这个人就属于贫穷。如果一个家庭认为它的收入“勉强够”也属于贫穷；这就是0.5水平的大致含义。其几何解释见图2-3。

^① 杨立雄.贫困线计算方法及调整机制比较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0, (05): 52.

^② 曲大维.主观贫困线研究述评[J].当代经济, 2011, (09)下: 166.

^③ Theo Goedhar,Victor Halberstadt,Arie Kapteyn,and Bernard Van Praa.The Poverty Line: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76(12): 503-520.

^④ Bernard M.S. Van Praag,Jan S.Spit and Huib van de Stadt.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ood Ratio Poverty Line and the Leyden Poverty Line [J].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1982(03):6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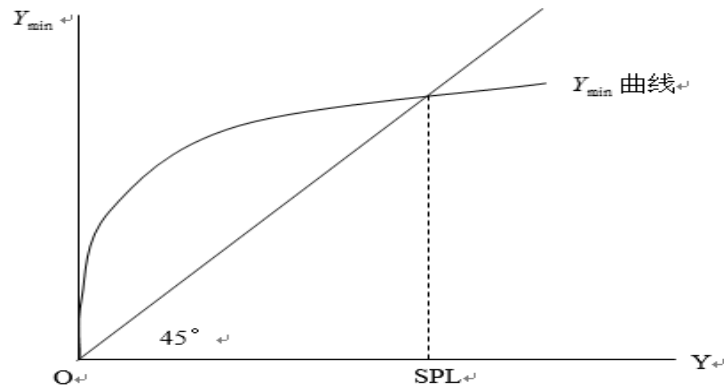


图 2-3 主观贫困线的几何解释

资料来源：张建华. 贫困测度与政策评估——基于中国转型时期城镇贫困问题的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59.

横轴 Y 表示农民人均纯收入， Y_{min} 表示对 MIQ 的回答值，交叉点就是主观贫困线的值， Y_{min} 曲线可以通过以下的回归方程求得：

$$\ln Y_{min} = \beta_0 + \beta_1 \ln Y + \mu \quad (14)$$

式中 β_0 、 β_1 为待定系数， μ 为随机误差。

在他两看来，个人收入福利函数是收入基本效用函数的实用形式，这一函数描述了个人如何评价不同收入水平；效用函数可以通过收入评价估计得出^①。这样贫困线的表达式为：

$$\ln Z = \ln Y(\alpha, f_s) = \frac{(\beta_0 + \beta_1 \ln f_s + \bar{\sigma} u_\alpha)}{1 - \beta_2} \quad (15)$$

则 Z 为：

$$Z = e^{\frac{\beta_0 + \beta_1 \ln f_s + \bar{\sigma} \cdot u_\alpha}{1 - \beta_2}} \quad (16)$$

式中， a 表示选择的生活水平； f_s 表示家庭规模； $\bar{\sigma}$ 为样本平均数； u_α 为收入回答值。 α 、 β_0 、 β_1 、 β_2 为待定系数，可以通过个人收入福利函数回归而得。

另外还有两种方法是：社会政策中心贫困线（Centre for Social Policy Poverty Line, CSP）和一般主观贫困线（Subjective Poverty line, SPL）。调查问题的设计不同

^① Bernard M.S. Van Praag, Jan S. Spit, and Huib van de Stadt.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ood Ratio Poverty Line and the Leyden Poverty Line [J].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1982, (03):692-693.

使得 Leyden 贫困线与这两种方法具有明显的差异。LPL 方法主要针对收入评价设计问题 (Income Evaluation Question, IEQ), 如“你认为自己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在什么水平时是‘非常糟糕的’或‘糟糕的’、‘不足的’、‘足够的’、‘好的’和‘很好的’”; Goedhart 等 (1977); Kapteyn, Van de Geer 和 Van de Stad (1985) 使用的 SPL 方法只针对一个最低收入问题 (Minimum Income Question MIQ) 设计, 如“你能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家庭收入是多少?”; Deleeck 等 (1977, 1984) 使用的 CSP 方法, 主要针对态度调查问题设计, 如“你的实际收入维持生活的难度如何: ‘极为艰难’、‘很困难’、‘有一些困难’、‘还算容易’、‘容易’和‘很容易’”^①。通过人们对问题的回答值, 就可推算出主观贫困。

虽然主观贫困线主要产生并应用于欧美发达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 但令人鼓舞的是这种方法已经在中国落地。首次用主观贫困线方法对中国的研究是 Gustafsson 和李实等 (2004), 其结果与中国官方的城市贫困线非常接近, 发现中国城市贫困状况与家庭的教育水平、年龄段、职业状况等因素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关联。Bishop, Luo 和 Pan (2006) 利用 SPL 贫困线方法对中国主要地区 (沿海、中部、东北和西北) 1988 年到 1995 年的贫困状况进行了一个综合性的研究, 发现从 1988 年到 1995 年各地区的贫困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Gustafsson 和岳希明 (2006) 利用 2003 年中国 22 个省份的农村调查数据, 通过询问农民谷物的最小需求和现金的最小需求两个问题, 得出一条 SPL 贫困线与国家统计局的农村低收入线 (高于农村贫困线) 非常接近; 农民对于维持生活最低收入的估计受所在县城的平均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陈立中和张建华 (200) 利用武汉等 7 个城市的家庭和个人调查数据, 得出的 SPL 贫困线, 结果表明除地区变量外, 家庭规模、家庭成员年龄、失业和健康状况等因素也能显著影响主观贫困线。但总体来说, 主观贫困线方法在中国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 主要研究空间集中于城市, 农村还十分稀缺, 其的适用性自身的方法优化与整合, 以及主观指标所描述的贫困人群的需要和偏好特征等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讲, 主观贫困线是绝对贫困概念和相对贫困概念的一个混合体 (Hagenaars 与 Van Praag, 1985)。

^① 曲大维. 主观贫困线研究述评[J]. 当代经济, 2011, (09)下:166-167.

2.6.4 剥夺贫困线

它是从相对剥夺概念发展出来的一种测量贫困的研究方法，由英国的汤森（Townsend）在 60 年代首创。也称生活形态法或剥夺指数法。它的基本假设是，只要人们拥有必须的资源，那么，人们都希望能够以社会所普遍认同的生活形态生活。过这种生活所必须的资源数量就是贫困线。换句话说，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种公认的基本生活形态，不能以此形态生活的人意味着遭受了剥夺，实际上就是贫困者。使用这种方法的关键是确定什么样的生活形态是一个社会所公认的基本生活形态。

Townsend 假设存在一个临界点，当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资源降到这一点以下，该个人或家庭将不再具备继续参与社会活动的的能力，即“被社会所抛弃”，通过这一剥夺指数的临界点可以得到对应的临界收入，将临界收入定义为贫困线。那么，如何确定剥夺指标就成为关键。一般情况下，只有被大多数群体成员认为必需品的物品才能作为剥夺指标（Deprivation Index），高登等人（Gordon et al）为此提出了一个选择原则：剥夺指标应具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可加性，如果被调查者中 50%以上的人认为一种物品是生活必需品，那么这种物品才能作为剥夺指标之一。设定剥夺指标之后，就可以利用指标计算群体成员某一个方面的剥夺程度^①。汤森（Townsend）为实施他的理论，选用了 12 个指标（每个指标代表一项被公认为是必须的物品和活动）来构建一个总剥夺指数，每个指标记 1 分，剥夺指数是将不具有指标的分数相加而得，剥夺指数越高，说明被剥夺的程度越大。Mack 和 Lansley 在后来的研究中对 Townsend 的研究进行了改进和完善^②。德赛和沙阿（Desai and Shah）提出剥夺程度的表达式^③：

$$\delta_{ij} = \delta(\theta_{ij}, \theta_i) \quad (17)$$

式中， θ_{ij} 表示群体中个体 j 所拥有的第 i 类必需品； θ_i 是 θ_{ij} 的众数，表示社会所认可的第 i 类必需品的拥有量。加总中的权重由下一公式确定：

$$D_j = \sum \lambda_i \delta_{ij} \quad (18)$$

^① ③ 池振合，杨宜勇.贫困线研究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7):60.

^② 李博. 贫困线问题研究综述[J].测定当代经济，2008，(02)上：41.

式中， λ_i 是在第*i*类必需品中非剥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就是第*i*类物品拥有量超过中位数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当然，人们对如何获得一个公认的临界点来将穷人和非穷人分开，以及如何选择和加总剥夺指标等还存在争议。但该方法却为我们理解和研究贫困的多维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2.6.5 共识型贫困线

为了避免绝对贫困度量的“精英主义”倾向和相对贫困的标准的人为性和随意性。研究者们一直在思考究竟有没有一种较为科学、客观的方法来度量贫困呢？那就得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对于何为生活必需品，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和群体的民众会有大体相同的看法。把这一想法开创性地变成现实的是英国学者乔安娜·迈克和斯图亚特·兰斯利（Joanna Mack & Stewart lansley）。他们在1983年对英国1174户家庭进行的社会调查中，要求被调查者首先列出他们所认为的生活必需品，然后再根据这些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情况来定义贫困。后来，这一做法被称为相对贫困、匮乏或剥夺的“共识型或民主型度量”。1990年，一批学者把这一方法进一步精致化，用于对题为“英国面包线”的1831户英国家庭调查。后来，这一方法被推广到在丹麦、瑞典、爱尔兰、比利时、荷兰、芬兰、德国以及跨欧盟范围开展过类似的调查。归结起来其基本的操作步骤是：（1）根据常识开列一组维持物质和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的清单，通过随机抽样进行家庭调查，要求被调查家庭回答清单中的项目是否为必需品。（2）把多数家庭（一般选定为50%以上）认定为必需品的项目挑选出来。（3）根据当地的价格，计算以平均水平消费这些必需品所需要的开支，以此作为贫困线^①。实践中，英国进行的两次“面包线调查”（1983年和1990年）证实了这一假设的成立。

该方法融合了基于消费和收入的贫困度量方法，还充分考虑到穷人对生活水平的评价，在欧洲受到较多国家的欢迎，它其实是相对贫困线的一种延伸和拓展。

^① 顾昕.贫困度量的国际探索与中国贫困线的确定[J].天津社会科学, 2011, (01):62.

2.6.6 混合贫困线

鉴于上述情况，为了发挥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的各自优点，同时又克服单独使用时的弊端。Foster 在贫困研究中提出了混合贫困线 (hybird poverty line)，它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以社会生活必需品消费支出中位数一定比例的倍数作为混合贫困线；另一种则是以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的加权几何平均数作为贫困线^①。前一种的计算公式为：

$$Z = \frac{1}{\alpha} \beta y_{mid} \quad (19)$$

式中， y_{mid} 表示食物、衣着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消费支出； β 表示 y_{mid} 的一定比例，它如同绝对贫困线中收入分布集中趋势的比例； α 表示的是社会成员生活必需品占全部消费品的比例。后一种的计算公式为：

$$Z = z_r^\rho z_a^{(1-\rho)} \quad (0 < \rho < 1) \quad (20)$$

式中， z_a 表示绝对贫困线； z_r 代表相对贫困线； ρ 是混合贫困线对相对贫困线的弹性，它说明如果相对贫困线增长 1%，则混合贫困线增长 ρ %。可以看出，当 $\rho = 0$ 时，混合贫困线就变成绝对贫困线；当 $\rho = 1$ 时，混合贫困线就转化为相对贫困线。由于 ρ 代表贫困线的收入弹性，也代表了在经济增长中贫困人口的分享程度，因此，政策制定者可以将贫困线的收入弹性 ρ 作为要控制的决策变量。

表 2-9 六种主要贫困线方法的比较

方法	基本假设	争论
绝对贫困线	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下，应该存在某种最低水平的基本需要，包括物质性和社会性的需要，而且这种基本需要应该是常态的。	(1) 对于基本需求尤其是非食品需求的界定上很难有一个理想的标准；(2) 没有考虑到穷人的社会需求。
相对贫困线	如果某一家户的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相比低很多，那么该家户就	(1) 如何解决收入同比例的增加或减少；(2) 不能提供穷

^① 池振合，杨宜勇. 贫困线研究综述[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7): 61.

	不可能充分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	人的真实生活状况；(3) 接近于不平等的描述。
主观贫困线	个人是他们自己经济状况的最好的评判者，而不是远离他们生活情境的专家或第三者。	(1) 会过高估计自己的必需收入值；(2) 地域空间的贫困人群的需要和偏好特征影响较大。
剥夺贫困线	只要人们拥有必须的资源，那么，人们都希望能够以社会所普遍认同的生活形态生活。	(1) 理论上抽象，方法上太复杂；(2) 临界点的确定；(3) 剥夺指标的选择和加总。
共识型贫困线	对于何为生活必需品，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和群体的民众会有大体相同的看法。	(1) 50%的认可度缺乏科学依据；(2) 难以表达相对匮乏或剥夺程度的程度。
混合贫困线		(1) 形式上有待完善；(2) ρ 值的选择问题。

来源：自己编制。

以上六种贫困线制定的方法，研究的共同点是从什么视角，采用什么技术来识别贫困，得出一个度量贫困的尺度——贫困线。但不管用什么样制定的技术和方法来制定贫困线，都客观存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内容，即贫困线的基本构成要素是一致的，这是确定贫困线制定方法的前提，但在六种方法的研究中都没有被提及。这就如同我们要制造一件产品一样，首先得弄清楚这件产品的基本结构，才能考虑使用什么技术和选用什么原材料来制造它。所以，贫困线的研究不能只考虑技术问题，而不问结构和内容问题。

2.7 数理和公理分析

将数量经济学的方法引入贫困分析中是西方研究贫困的一大特色，这一特点也毫不保留地体现在贫困线的研究中，并有力地提高了贫困线设置的合理性。但我们依然看不到对贫困线维度的数理和公理解释。

2.7.1 贫困线的数理解释

这一工作是由荷兰的四位经济学家开创的，西奥·戈德哈特、维克托·哈尔贝施塔特、阿里·卡普坦、伯纳德·范普拉格共同构建了一个回归方程，计算不同规模家庭的贫困线（ y_{\min}^* ）的值：

$$\ln(Y_{\min}^*) = \alpha_0 + \alpha_1 \ln f_s + \alpha_2 \ln(Y_{\min}^*) \quad (1)$$

其简化式为：

$$\ln(Y_{\min}^*) = \frac{\alpha_0 + \alpha_1 \ln f_s}{1 - \alpha_2} \quad (2)$$

这里 Y_{\min}^* 为贫困线， f_s 代表家庭人数， α_0 、 α_1 和 α_2 是回归方程的待定系数

（Theo Goedhar, Victor Halberstadt, Arie Kapteyn, and Bernard van Praa, 1976）^①。

之后伯纳德·范普拉格、西奥·戈德哈特、阿里·卡普坦从主观标准出发，在荷兰用人们对基本收入问题：“请告诉我们，像你这样的家庭所需的绝对基本货币收入是多少？换句话说，收入低于多少你就无法维持生活？”的回答值（ Y_{\min}^* ），定义出一条国家贫困线：

$$\ln Y_{\min}^* = \alpha_0 + \alpha_1 \ln f_s + \alpha_2 \ln y + \mu \quad (3)$$

其中 f_s 代表家庭人数， y 代表家庭净收入， μ 代表误差项（Bernard Van

Praag, Theo Goedhart, and Arie Kapteyn, 1980）^②。

Greer 和 Thorbecke（1986）就曾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计算了食物热量贫困线，他们建立的热量成本方程式为：

$$\ln(x) = a + bC + \mu \quad (4)$$

^① Theo Goedhar, Victor Halberstadt, Arie Kapteyn, and Bernard van Praa. The Poverty Line: Concept and Measurement[J].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76, (12): 509-512.

^② Bernard Van Praag, Theo Goedhart, and Arie Kapteyn. The Poverty Line——A Pilot Survey in Europe[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0, 62 (03): 463.

其中 x 为个人实际在食物消费上的支出； C 为个人从食物消费中获得的热量

(卡)； μ 为随机误差项^①。计算出模型中的参数 a 、 b 的值，便可得出相应的贫困线：

$$Y = \exp(a + bR) \quad (5)$$

式中 R 为推荐的热量值。Satya Paul 提出了定义贫困线一种模型，即以所有热量和营养消费的最低支出水平作为贫困线，对这些要求根据每一个住户的年龄、性别和职业特征进行调整。有学者评价称这种方法回避了所有传统方法的主观性的武断和概念的嵌套，此模型曾用于印度一个省的贫困线的简易界定和计算 (Satya Paul, 1989)^②。

2.7.2 贫困线度量公理

贫困线公理来源于贫困度量公理。因传统贫困度量都是在某种先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由此常常误导舆论与决策。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许多学者提出贫困度量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经得起考验，应确立了一些基本的评价公理。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是贫困度量公理的开创者，他于 1976 年提出界定总量贫困测度的 3 条公理，此后被称为贫困指数的公理化方法：焦点公理、单调性公理、弱传递性公理。同时他以此为基础构造了一个新的贫困指数——森指数或称为 Sen 指数。受森的启发，卡克瓦尼 (Kakwain) 提出的满足转移敏感性公理的贫困指数，托恩 (Thon) 给出的满足强转移条件的贫困指数，夏洛克斯 (Shorrocks) 和森 (Sen) 得到的满足充分连续性的 SST 指数 (或称为 S^* 度量)，福斯特、格里尔和索尔贝克 (Foster, Greer and Thorbecke) 构造的满足可分解性的 FGT 指数 (或称为 P_α 度量)^③，已经在贫困度量的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

由森的倡议和随后的其他学者的努力，人们现已确立了一套基本的评价公理，这些公理多达十几项，他们构成贫困评价与度量的公理化方法的坚实基础。

^① 张建华. 贫困测度与政策评估——基于中国转型时期城镇贫困问题的研究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47.

^② Satya Paul. A Model of Constructing the Poverty Line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9, (30): 132-133.

^③ Foster J, Greer J, and Thorbecke E. A Class of Decomposable Poverty Measures [J]. Econometrica, 1984, 52 (03) : 761-766 .

虽然大多数学者都接受森的公理，但很少有贫困度量指标能同时与森的三个公理和其他公理保持一致。Kundu 和 Smith 证明，同时满足森的三个条件的贫困指数是不存在的，原因在于，第一，发生贫困成员到更富有成员的收入转移时，贫困指数不减；第二，贫困人口增加时，贫困指数增加；第三，非贫困人口增加时，贫困指数减小。于是不存在满足太多价值判断的贫困指数。他们提出，贫困测算中最好使用多种指数，如果多个指数反映相同的贫困程度排序，我们就有更充足的理由相信测算结果的准确性^①。

贫困线的数理和公理研究旨在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贫困线如何量化的问题；二是贫困线的度量如何科学化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成果使贫困线的研究和实践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但令人遗憾的是贫困线由哪些维度构成，如何量化这些维度，可以用哪些公理来评价贫困线维度选择的合理性等问题仍然被排除在研究之外。

总而言之，从以上对贫困和贫困线度量的基础理论的述评，我们可以看出理论、方法和公理是西方贫困线研究的三个成就面，从而建立了一个度量依据→度量方法→检验工具的严密体系。尽管在分析贫困线问题上已经取得了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显著进步，比如，对于鉴别哪些是穷人、穷人具有什么样的特质以及如何在不同的加总水平上度量贫困等问题已有一套非常成形的、规范的、现代化的分析工具，但仍存在一系列概念和度量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清和解决

(Thorbecke, 2008)^②。尤其是有关贫困线多维度量的问题。正如上所述，目前对维度的研究被滞留于影响贫困的因素上，即只关心贫困由哪些维度构成，还未向其他方面拓展，特别是还未将贫困维度的研究成果拓展到贫困线度量领域。比如说，这些维度也是影响贫困线的维度吗，贫困线到底应该由哪些维度构成？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至少目前还未见相关文献。我认为影响贫困的维度和构成贫困线的维度是一个虽有联系但完全不同的范畴，就如同建一栋别墅需要哪些原材料和预算这栋别墅的最低造价是不一样的。

^① 王祖祥，范传强，何耀，张奎，王红霞. 农村贫困与极化问题研究[J] ——以湖北省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2009, (06): 79-80.

^② Thorbecke, 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Conceptual and Measurement Issues [C]//The Many Dimensions of Poverty.London : Palgrave-Macmillan, 2008: 3-19.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注重理论分析与实地调查的融合，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田野调查法及计量分析三种方法，对中国农村贫困线的构成维度加以系统研究。

3.1.1 文献分析法

技术路径利用 UTS 图书馆的 International Studies 和其他数据库，主要是 Web of Science (ISI)、EBSCO、Elsevier、ProQuest、SpringerLink、Wiley、World Bank eLibrary、IMF e-library、OECD iLibrary 和 JSTOR 数据库以及云南财经大学图书馆的 CNKI 数据库。其任务是收集本研究相关的第二手资料：文字资料主要着眼于国内外贫困线度量的理论和方法已有研究成果以及中国贫困线的研究进展；数据资料着眼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农村统计年鉴、教育统计年鉴、贫困监测报告和 592 个国家扶贫重点县的调查资料及云南数据。通过对国内外贫困线度量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的比较，试图建立中国现实贫困线的维度体系，为本研究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指导。具体资料来源和任务见表 3-1。

表 3-1 各数据库的主要检索任务

来源	数据库	检索任务
UTS 图书馆 International Studies 和其他库	Web of Science (ISI)、EBSCO、Elsevier、ProQuest、SpringerLink、Wiley、JSTOR	西方贫困度和贫困线的理论与方法及定量数据，维度理论
	World Bank eLibrary、IMF e-library、OECD iLibrary	反贫困政策、国际贫困线制定方法、全球贫困状态和评估
云南财经大学 图书馆	CNKI 和相关年鉴	中国农村贫困、反贫困政策和制度、贫困线的制定及各维度分析指标的数据
其他	如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统计局等网站	补充研究的动态数据

3.1.2 田野调查法

它在本研究中的任务是补充贫困线维度确定的社会评价和贫困人群的主观感受。以往贫困线都是外生的，由政府职能部门测定并发布，其实最了解贫困群体需求的是他们自己。所以，本研究欲通过田野调查的数据资料，来验证贫困线维度和各维度支撑指标的合理性。拟以中国云南的国家扶贫重点县现有数据为基础，以贫困县、乡、村的地名和贫困户名册为样本框，使用随机起点分层等距抽样的方法选取样本，抽样的顺序是先抽贫困县→贫困县抽贫困乡→贫困乡抽贫困村→贫困村抽贫困户。

具体操作方法是，首先在云南 73 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中按照人均 GDP 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高低情况进行排序，将贫困县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兼顾空间分布在每个档次中随机选择一个县作为样本县，再在样本县中抽取 2 个贫困乡（样本乡），在每个样本乡中抽取 2 个贫困村（样本村），最后在每个样本村中，以住户名册为依据随机起点等距抽取 5 户贫困户和 3 户非贫困户作为最终入户调查单位，以采集贫困县、乡、村的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的个人详细个案资料。这样最终被抽中的县是保山市的昌平县、昆明市的禄劝县和寻甸县，为了保护被调查者的隐私，乡、村名和接受调查户的姓名都不已公布，在数据处理时用编码代替。

为了得到可信度更高的资料，拟做 2 次调查。第一次摸底调查，重在摸清贫困人口对贫困线度量的认识和检验调查方案设计的可行性。2011 年 1 月我们一行 8 人专程到滇西保山市的昌平县和施甸县及德宏州的潞西县进行摸底调查，这三个县均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调查方式是先到各州（市）、县扶贫办了解农村贫困的面上情况，讨论贫困线的适应状况，最后随机入户访谈，了解扶贫政策和对度量贫困指标的看法。这次摸底调查对精选指标、完善问卷设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次再进行实地调查。按照前面抽样选出的县、乡、村和贫困家庭逐一入户调查，开展贫困户的个案调查和贫困人口的个人访谈，掌握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为了核实调查资料，实际上本研究进行了两次实地调查（2012 年 7 月和 2013 年 7 月），共计三次调查。

问卷及问卷调查。为了更好地了解扶贫行动相关者，对新的贫困线制定维度和指标体系不同的主观感受，将调查对象设计为农村贫困户、非贫困户和扶贫管理者三个群体。为此我专门设计两套调查问卷，一套用于非贫困者和扶贫管理部门，以反映与贫困户一起居住的非贫困户和反贫困组织和实施者的意愿；另一套用于反映贫困户的心声。调查问卷名为《中国农村贫困线的适应性调查》，第一套问卷简称问卷 A，设计了 25 个问题，涉及扶贫瞄准机制、影响贫困线的因素和指标、对现实贫困线的评价、扶贫项目的选择和贫困监测等方面的内容。贫困户使用的问卷简称问卷 B，共设计了 20 个问题，内容涉及致贫原因、贫困线标准评价、扶贫政策项目的选择与调整、打工、贫困线维度和指标选择等。共发出贫困户调查问卷 60 份、非贫困户调查问卷 36 份和扶贫管理者调查问卷 30 份，均已全部收回，经检验有效问卷为贫困户 56 份、非贫困户 35 份和扶贫管理者 30 份，有效率分别为 93%、97%和 100%，可以用于分析。样本结构和分布见表 3-2。

表 3-2 田野调查样本结构和分布

县(个)	乡(个)	村(个)	贫困户	非贫困户	管理者(人)
3	6	12	60	36	30

资料来源：自己编制

3.1.3 计量分析法

主要任务是检验维度和选择变量（指标）的合理性和实证分析。通过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法和 Shapley 方法，建立模型，实证和模拟本研究提出的中国农村贫困线维度的状况，从而提出修正方案和政策建议。

3.2 技术线路

本研究采用的技术线路如图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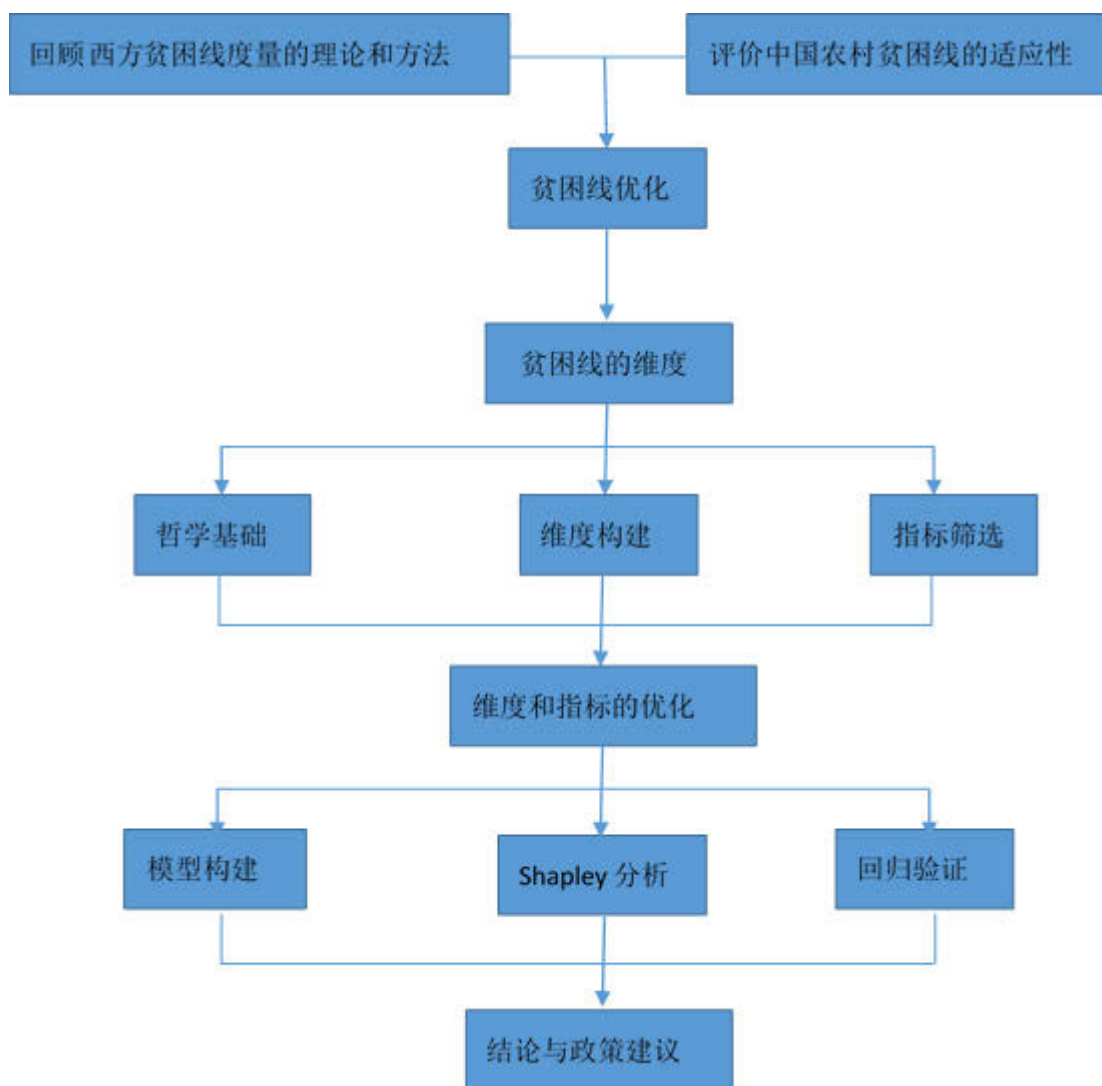


图 3-1 农村贫困线的构成维度研究的技术路线

4 中国农村贫困线：适应性评价

4.1 农村贫困线的产生与发展

4.1.1. 产生过程：多种方法打造了一条线

一、第一条农村贫困线的确定过程^①

中国第一个官方的农村线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它是由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扶贫办合作制定的。以后每年根据物价指数和贫困测量方法的发展而进行适当的调整，但根本基础没有改变。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贫困线其实有两个：一个称为农村贫困标准，另一个称为农村低收入标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农村贫困标准是极端贫困线，低收入标准则是一条较高的贫困线。第一个标准是 1986 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 6.7 万户农村居民进行收支调查和 1984 年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以收入和粮食生产量为参照，并最终选择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标识贫困线的指标。农村贫困线的计算步骤分为四步^②：

1. 根据营养专家的意见选择最低热量摄入量。必需的营养标准是确定食物贫困线的基础，最低热量摄入量是指维持人的正常生活所必需的热量摄入量的下限。1979 年世界银行三位经济学家在印度对贫困问题进行研究后提出了贫困的国际营养标准为每人每天摄入热量为 2250 大卡，低于这个标准，人们从事最低限度活动的功能就会受到损害^③。根据营养学会专家们的测算，我国居民中维持正常生活的热量日摄入量应为 2400 大卡，其最低限度应为 2000 大卡，考虑到农村居民中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实际情况，专家建议选 2100 大卡作为最低热量摄入量比较合适。

2. 选择合理的基本食品消费项目和数量。根据 1984 年全国农村住户调查资料，去掉食品消费中烟、酒、糖果和糕点等有害性和享受性消费项目，保留 12 类必需的食品消费项目，再按每人每天摄入热量 2100 大卡计算，其基本食品消

^① 本部分将主要引用直接参与中国官方贫困线的制定者王萍萍（2006）、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0）和自己（2006）文章的观点进行阐述。

^② 王荣党. 农村贫困线的测度与优化[J]. 华东经济管理, 2006, (03):45.

^③ 中国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 2000[J].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0.

费项目和数量（每人每年）为：粮食 220 公斤、蔬菜 100 公斤、植物油 2.45 公斤、动物油 1.36 公斤、猪肉 87 公斤、牛羊肉 0.54 公斤、牛羊奶 0.75 公斤，家禽 0.74 公斤、蛋类 13 公斤、鱼虾 0.96 公斤、食糖 1 公斤、水果 3 公斤。

3. 结合调查得来的相应价格水平，计算最低食品费用支出。凡是出售的产品按出售价格计算，凡是购买的产品按买价计算，对于农民自产自用的产品，则按国家牌价计算。依次计算出来的 12 种基本食品消费的混合平均价格（每公斤）为：粮食 0.3 元、蔬菜 0.21 元、植物油 1.9 元、动物油 1.4 元、猪油 1.85 元、牛羊肉 2.47 元、牛羊奶 0.4 元、家禽 2.84 元、蛋类 2.06 元、鱼虾 1.14 元、食糖 0.94 元、水果 0.55。

最低食品费用支出，是各项食品消费量和相应混合平均价格计算的最低食品消费额之和。据计算，1984 年农民人均最低食品消费金额为 119.73 元。

4. 用恩格尔系数法计算贫困线。即用最低食品费用支出除以基本食品支出的比重，所得商即是贫困线。根据对 1984 年全国农村居民中的消费结构以及恩格尔系数在我国农村的适用性分析，基本食品支出占总的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定为 60% 比较合适。这样 1984 年农村居民中的食物贫困线 119.73 元除以 60%，为 199.6 元。以后我们使用的农村贫困线 200 元就源于此。

1984 年农村居民中贫困线确定后，再根据农村物价指数的变化，就计算出 1985 年以后各年的贫困线，即 1985 年为 206 元，1986 年为 213 元，1987 年为 227 元，1988 年为 236 元，1989 年为 259 元，1990 年为 268 元。到 1995 年这一标准为 530 元。

这种确定农村贫困线的方法，优点是集中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中最重要的部分——食物消费，同时以合理的比例考虑了衣着、住房、交通、燃料、用品以及医疗、教育、娱乐、服务等消费，而且比较简单，容易操作，其评估结果与其他比较复杂的方法估计的结果很接近。

1986 年中国政府决定实施大规模的扶贫计划，划定贫困县，需要科学地制定贫困线，以确定贫困规模和扶贫目标。其中贫困线的划定就是以 1984 年农村人口绝对贫困标准为依据，按物价指数换算出的（人均年收入 213 元）。因此，学术界经常把 1986 年作为中国第一条农村贫困线制定的时间。

二、农村低收入标准的由来

中国统计局为了更好地监测刚实现基本温饱的贫困人口的动向，并进行贫困的国际比较，从1998年开始测算低收入标准和低收入人口比重，并在2000年起低收入标准的名义向社会公布。其方法是，采用经物价指数调整的1997年食物贫困线，再利用在贫困状况下食物消费份额占总生活消费的60%的假设，计算出1998年农村的低收入标准为880元。该标准的测定使用了世界粮农组织采用的一个通用的假设，即，如果恩格尔系数(食物消费份额)在60%以上时，生活水平一般为贫困。王萍萍认为这个低收入标准与当年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消费水平比较接近。其理由是按1993年购买力平价换算，1天1美元标准在1998年相当于每年885元人民币，这与低收入标准非常接近。因而，她认为就标准本身而言，中国统计局的低收入标准与世界银行的1天1美元的标准是基本一致的^①(见表4-1)。

表4-1 2000—2005年中国贫困标准比较

项目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农村贫困标准	625	630	627	637	668	683
农村低收入标准	865	872	869	882	924	944
世界银行1\$/天	876	882	873	884	918	935

*用世界银行1993购买力平价换算后，再用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更新。

4.1.2. 变迁历程：“一二一”

中国的农村贫困线虽然产生的历史并不长，但调整的频率并不算太低。首先从贫困线的数量上看，走过了一条“一二一”之路：即由制定之初1986年的一条线（常称绝对贫困线），到2000年两条线（贫困标准和收入标准），再到2008年的一条线（两线合一），从此中国低收入人口纳入了贫困人口的统计范围，也成了官方的扶贫对象。其次从调整的时间点看有“两个高峰期”，即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后期。具体来讲中国的农村贫困线是在1985年、1990年、1994年、

^① 王萍萍，方湖柳，李兴平. 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准的比较[J]. 中国农村经济，2006，(12) 65-66.

1997年由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根据全国农村住户调查分户资料测定^①。其它年份则使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更新。其实2007年、2008年2009年和2011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又作过调整，只不过后四次的调整主要是提高标准，在制定的方法和原则上并没有变化。

最有突破性的调整要算是1998年的调整，它的亮点是全面引入了世界银行推荐的确定贫困线的基本方法——马丁法。使非食物贫困线的计算有了更科学的理论依据，并传承马丁法的做法计算出高低两条贫困线，具体地计算步骤如下：

(1) 按照每人每日2100大卡确定最低营养需求。(2) 利用中国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计算食物贫困线。根据30%最穷人口的实际消费价格和消费结构计算出能获得最低营养需求的食物支出，作为食物贫困线。(3) 利用计量方法找到低非食物贫困线和高非食物贫困线。(4) 计算高低两条贫困线：食物贫困线+低非食物贫困线=低贫困线。达到低贫困线的农户，只能得到基本食物消费和一些农户愿意牺牲基本食物消费来换取的最必需的非食物消费。在1997年测定的低贫困线中，农户食物消费支出份额高达85%，这表明，低贫困线确实是一条极端贫困线。达到高贫困线的农户可以获得基本食物消费以及与基本食物消费同等重要的非食物消费(Ravallion, 1993)，这样，食物贫困线+高非食物贫困线=高贫困线。(5) 确定官方农村贫困标准。由于在20世纪后期，中国农村的贫困面很大，而国家扶贫资源有限，因而，根据当时的情况，确定用低贫困线作为农村贫困标准，用来衡量农村贫困状况^②。

那么马丁法是如何操作呢？“马丁法”的精髓是：在已知食物贫困线的基础上，利用回归模型等计量方法，巧妙地把一些刚好有能力达到营养需要住户的有代表性的最低非食品支出计算出来。我们知道无论如何穷人都有很多种基本食品和非食品支出的组合，也有很多种基本食品和非食品的替换方式，即使那些总消费支出低于按传统饮食方式满足营养需求所需要的支出的贫困住户，也肯定会在非食物商品上有一些花费。问题是这些典型的贫困户会允许多大水平的非食品支出来替代基本的食品支出？虽然不能从众多的贫困户中人为地选择，但可以这样考虑：如

^① 此为王萍萍(2006)的观点，中国统计局对外公布的时间点均比此晚一年的时间，可能是开始此项工作的时间与最终发布时间的差别。本文使用后者的时间。

^② 王萍萍，方湖柳，李兴平.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准的比较[J].中国农村经济，2006，(12) 65.

果能求出一些消费总支出（或人均纯收入）恰好等于食物贫困线的住户的非食品支出的话。那就可以知道贫困户的最低非食品支出。因为一个靠牺牲基本食物需求用以获取少量的非食物商品的住户，肯定是不得已的，其获得的非食物商品是维持生存和正常的活动必不可少的，也是最少量的。把由此求出的最低的非食品支出作为非食物贫困线，加上已知的食物贫困线，就是我们要知道的判断贫困户的最低贫困线，这是马丁先生的第一思想，也是“马丁法”的主体思路。

以 1998 年中国农村贫困线的调整为例，说明马丁法计算非食物贫困线的原理和步骤。首先，建立食品支出的需求函数 $F(x)$ 。为了计算方便，根据马丁的实践经验，设定的函数形式为：

$$S_i = a + b \log(X_i/Z_F) + \mu \quad (1)$$

其中： S_i 是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 X_i 是各住户总消费支出或人均纯收入； Z_F 是食物贫困线； a 表示总消费支出刚好等于食物贫困线时，其食品支出比重。 b 是 \log 函数的系数； μ 为残差。

实际上人们的消费选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生产结构、家庭结构、消费习惯等因素会对总消费支出、特别是食品支出产生广泛影响，收入水平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已。特别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多民族合居、各地居民的生活结构千差万别的国家，在使用这个经典公式时，更应综合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为此，中国统计局在模型中增加了反映地理环境、是否少数民族、是否老少边区地区、家族规模结构以及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各地生产、生活结构的省区变量。各变量的参照系是江西省非老、少、边穷的丘陵地区家庭规模为 4.5 口人以上的农村居户。

其次，用 1998 年全部分户资料进行回归，求得参数 a 、 b 的值。最后，推算最低非食物贫困线 $N_F=108$ 元。加上同前面一样的方法计算的食物贫困线是 527 元。这样 1998 年农村绝对贫困线 $Z=Z_F+N_F=527+108=635$ 元，这就是马丁说的“低的贫困线”^①。同理，只要将（1）式中 a 的取值调整为那些达到食物贫困线的一般住户的食物支出比例，就可以得到“高的贫困线”。

在几次大的调整中体现出这样一些特征：

^① 中国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00[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8.

1. 方法由多样走向统一。1990 年以前中国制定贫困线是在绝对贫困理论主导下的基本需求成本法、食品能量摄入量、恩格尔系数法和食物份额法等多种方法的复合体。1990 年中国统计局农调总队确定贫困线的基本方法就是食物份额法。1995 年以后逐步引入马丁法。1998 年全面采用了马丁法。2007、2008、2009、2011 年的调整只是提高了贫困线的量值，但在使用的方法和原理上并没有背离以往。

2. 结构一直不变。中国的农村贫困线是一个模块结构，虽然作过多次调整但无论那次都保持着由两部分组成的固定结构：一部分是满足最低营养标准(2100 大卡 / 人日)的基本食品需求，即食物贫困线；另一部分是最低限度的衣着、住房、交通、医疗及其它社会服务的非食品消费需求，即非食物贫困线。

3. 非食物贫困线的确定成为难点和重点。1995 年以前，主要使用两种方法：要么根据所谓“合理的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合理比重，来确定非食品消费的金额，要么根据非食品消费支出比重来计算非食物贫困线。从 1995 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实际上采纳了世界银行的建议，根据食品消费支出函数回归模型来客观计算低收入人群的非食物消费支出。在实际计算时，同时考虑了不同地区人们的消费习惯、家庭结构、生产结构等因素也对居民的消费支出、特别是食品支出产生的影响。

4. 大幅的调整发生在近年。从 1986 年第一条贫困线产生到 2007 年的 21 年间，中国农村贫困线的提高额不足 600 元(572 元见表 4-2)，平均每年提高不到 20 元(18.45 元)，从而导致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率不断降低，从 1985 年的 1/2 持续下降为 2007 年的 1/5。较低的贫困标准越来越无法有效应对这些新挑战。为此，2008 年底国务院扶贫办上调了贫困线，把绝对贫困标准与低收入标准合二为一，统一为人均纯收入 1196 元，取消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区别对待的政策。2011 年中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再次提高贫困线，将农民人均纯收入 2300 元(2010 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短短 5 年间，中国农村贫困线从 785 元提高到 2300 元，增加了 1.92 倍，平均每年增长 30.83%。

世界银行专家获悉中国政府大幅度提高了国家贫困线，给予十分积极的评价。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研究局专门负责全球贫困测量的高级统计学家陈少华博士评论说：“中国政府刚刚提高了国家贫困线，新的贫困线按照 2010 年价格为 2300 元

/年，新的贫困线比去年的贫困线提高了 92%，按照 2005 年购买力平价美元折算，相当于 1.8 美元/天。中国新的贫困线接近于中低收入国家贫困线的中位线。按照中国新的贫困线，估计在 2008 年人均纯收入低于 1.8 美元/天的贫困人口比例在 12—15%之间。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将更加努力服务于贫困人口，穷人将会更多地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他激动地表示：“这是我在世界银行工作 20 多年来最令人兴奋的消息！”^①

当然这几次大的调整也有差异，见表 4-2。

表 4-2 中国农村贫困线调整差异的比较

调整时间点	差异			共同点
	方法	调整重点	度量指标	
1990 年	食物份额法。	选择非食品消费项目，并计算出其金额。	农民人均纯收入	(1) 理论依据都用绝对贫困论； (2) 总的方法属于绝对贫困线； (3) 关注点：人们的基本生存问题，实质上是温饱标准； (4) 结构：食物贫困线+非食物贫困线 (5) 指标：使用人均纯收入作为核心指标。
1995 年	马丁法计算非食物贫困线。	用食品消费支出函数回归模型来计算低收入人群的非食物消费支出。	农民人均纯收入	
1998 年	全面的马丁法	贫困户的筛选；非食物贫困线的计算；确定高低两条贫困线。	开始使用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双指标衡量一个贫困户	
2007、2008、2009、2011 年	马丁法	将两条线合二为一，提高贫困线的标准。	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双指标	

^①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世界银行专家高度评价我国提高扶贫标准.[EB/OL]. (2011-12-07) <http://www.iprcc.org.cn/front/article/article.action?id=2738>.

资料来源：自己编制。

通过这几次的调整，在不测算贫困线和低收入线的年份，再利用农村 CPI 进行缩减，就得相应年份的贫困线。进而就可匡算当年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具体结果见表 4-3。

表 4-3 中国农村历年贫困线

年份	贫困标准 (元/人)	贫困人口 (万人)	贫困发生 率 (%)	年份	贫困标准 (元/人)	贫困人口 (万人)	贫困发生 率 (%)
1978	100	25000	30.7	1997	640	4962	5.4
1984	200	12800	15.1	1998	635	4210	4.6
1985	206	12500	14.8	1999	625	3412	3.7
1986	213	13100	15.5	2000	625	3209	3.5
1987	227	12200	14.3	2001	630	2927	3.2
1988	236	9600	11.1	2002	627	2820	3.0
1989	259	10200	11.6	2003	637	2900	3.1
1990	300	8500	9.4	2004	668	2610	2.8
1991	304	9400	10.4	2005	683	2365	2.5
1992	317	8000	8.8	2006	693	2148	2.3
1993	350	7500	8.3	2007	785	1479	1.6
1994	440	7000	7.7	2008	1196	4007	4.2
1995	530	6540	7.1	2009	1196	3597	3.8
1996	580	5800	6.3	2010	1274	2688	2.8

* 2008 年新贫困标准将原低收入人口纳入，因此，2008 年的贫困人口数据与历史数据不可比。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00-2012 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7-2011 年中国农村贫困检测报告；中国发展报告 2007.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出版社；王国良. 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93。

4.2 适应性评价

4.2.1. 适应面

一、为中国的反贫困工作找到了基准坐标

反贫困的前提是首先知道谁是穷人，他们在哪里？1986年中国制定的第一条贫困线，第一次使中国有了识别穷人的方法，虽然这个标准偏低，但至少可以把最穷的人找出来，大体知道最穷的人有多少，他们都分布在什么地方，从而使扶贫的政策制定和绩效评价有了基本的依据。贫困线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一定时期反贫困政策设计、资源和资金聚集及评价其绩效的指南针。当时中国采用的贫困线标准虽然较低，但它在为政府集中扶贫资源，持续、大规模地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温饱，实施不发达地区的协调发展和开展特困人口的救济、救灾等工作方面提供了目标依据。事实证明，在该标准指导下实施一系列反贫困政策，使中国农村得不到温饱的极端贫困人口从1986年制定之初的15.5%降到到2007年的1.6%。这样的成果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认同^①。

二、它是一条以生存为本的温饱标准

贫困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吃不饱饭和没钱花。邓小平先生曾在80年代将中国的问题经典地总结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换句话说就是要先解决好吃饭问题，才能再来谈发展问题。所以，如何尽快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是在制定农村贫困标准时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因此，中国农村的贫困线一直过多地强调满足贫困人口基本食品需求为第一目标，而较少考虑非食品消费需求。在基本消费需求中，食品消费需求占85%左右，这是一种典型的以生存为本的温饱标准。实践证明，这一标准符合中国的国情，能够保证实现基本解决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计划目标^②。也符合中国政府一直倡导的有了生存权，才有发展权的理念。

三、使用了国际上制定贫困线的主流方法——马丁法

^① 王萍萍.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的比较[J].调研世界, 2007, (01): 8.

^②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 2000[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0:10.

如前所述，马丁法是世界银行的著名反贫困研究专家马丁·瑞沃林提出的一种制定贫困线的新方法。他的观点是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食物需求；另一部分是衣着、住房、医疗、教育等非食物需求，因此，识别贫困人口的贫困线也由两部分组成：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他的突出贡献在于用食物消费函数的回归模型解决非食物贫困线，根除制定中的随意性，创造了高低两条非食物贫困线，这样贫困线也就变成了高低两条，以便于反贫困主体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中国自 1995 年以来逐步引入该方法，无论怎么调整，它的结构一直固化成两个模块：即一块是集中了人们基本生活需求中最重要的部分——食物贫困线，同时以合理的比例考虑了衣着、住房、交通、燃料、用品以及医疗、教育、娱乐、服务等方面消费的非食物贫困线，最后将两者相加就是当年的贫困线。这种比较简单容易操作，制定部门通过评估，发现它与使用比较复杂的其它方法估计的结果较为接近，所以它已成为中国制定现行农村贫困线的主导方法。

四、性质与国际贫困线基本一致

一天 1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它是最贫穷的 12 国家的贫困线为基础制定的，以解决基本生存为目标。2007 年（人均 693 元/年）以前中国的农村的贫困线虽然略低于一天 1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但它也是维持农村贫困人口基本生存的最低费用。由于：（1）中国农村居民对蛋白质摄入大都来自价格比较低的植物性蛋白食物为主，这一点不同于西方国家以动物性蛋白肉类为主；（2）中国农村居民的必需的日用品，比如衣服、鞋袜、住房等价格相对便宜；（3）中国农民由于拥有土地这一生产要素，很多食物可以从成本比较低的土地上取得。而且农村贫困居民在交通娱乐等项目上的花费几乎为零。所以，中国现行的农村的绝对贫困标准虽然略低于世界绝对贫困标准，但它是能够维持农村贫困人口的最低费用。它和一天 1 美元的内涵基本是一致的，都是按照能否满足生存的基本生活需求划分的。

五、与中国的反贫困资源集聚和财力增长相匹配

贫困线可以为扶贫资源的投向提供参考。中国实施的是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反贫困方式也是渐进式。由最早给钱给粮的救济式反贫困逐步提升到以培育和建设

贫困人口生存和发展能力为重点的开发式反贫困。这从中国农村贫困线的发展历程也可见一斑。本人(2006)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贫困线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启动、攻坚和世纪线，葛深渭(2009)又将其扩展为五个阶段：救济线、启动线、攻坚线、世纪线和统筹线。每一阶段的贫困线制定的依据都是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同时也创造机会让贫困人口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见表 4-4）。扶贫资金的投入也基本如此，标准的设置和资金投入与当时的国家财力为优

表 4-4 中国农村贫困线发展阶段对比

阶段	时间	制定依据	反贫困方式
生活救济线	1978- 1981	社会紧急救济计划，如社会救济、自然灾害救济、优扶等。	单纯的输血式 扶贫
启动线	1981- 1994	1981 年农业部首次划定贫困县的标准：用人均集体分配收入 40 元和 50 元来划分 1977-1979 年的穷县和穷队。1986 年划定国定贫困县的标准是：1981 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150 元以下的县（老革命根据地的县和少数民族县则为 200 元），或者是 1984-1986 年 3 年平均人均纯收入低于 300 元的牧区旗（县）或低于 200 元的半牧区旗（县）。	开发式扶贫
攻坚线	1994- 2000	调整的标准是“四进七出”，即 1992 年全县农业人口人均纯收入低于 400 元的列入国家贫困县，让 1992 年全县农业人口人均纯收入超过 700 元的县退出贫困县行列。	开发式扶贫
世纪线	2000- 2008	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贫困线基本延续了“八七”扶贫攻坚阶段的标准，但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开发式扶贫
统筹线	2008 至今	2008 年 12 月 27 日，中国宣布上调扶贫标	开发式扶贫

		准，将农村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合并为一条线，即 2007 年人均收入 1067 元。	
--	--	--	--

资料来源：根据王荣党. 农村贫困线的测度与优化[J]. 华东经济管理, 2006, (03) 和葛深渭. 贫困标准变迁与扶贫政策研究综述: 回顾与展望[J]. 中国集体经济, 2009, (21) 整理。

先约束条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财力的增加，其投入的力度是不断增强的^①（见图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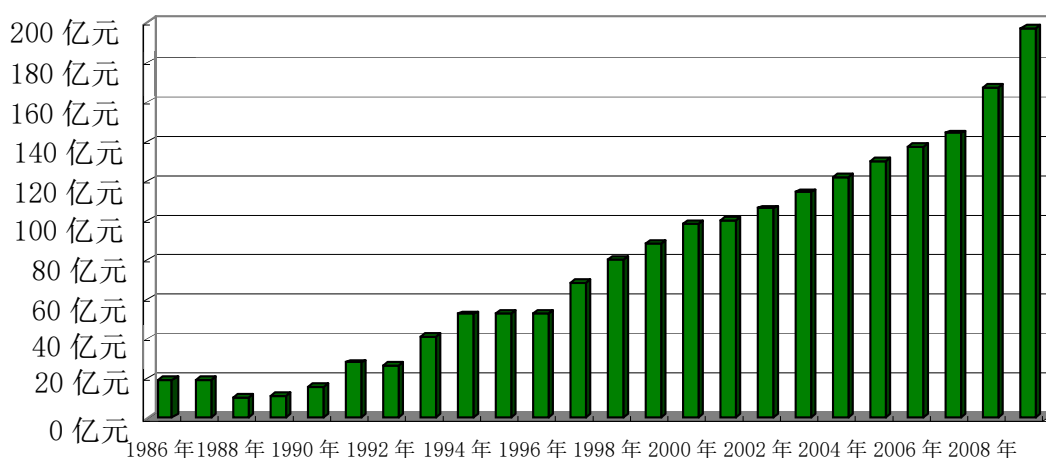


图 4-1 中国财政扶贫资金增长情况 (1986-2009)

六、使中国成为世界反贫困的排头兵

这条线使中国贫困人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 1978 年的 2.5 亿锐减到 2007 年的 1479 万人，贫困发生率也相应地由 30.7% 下降到 1.6%，即使是按两线合一后的最新的贫困线计算，2011 年的贫困人口是 1.22 亿人，贫困发生率为 12.7%。如果将其放入世界反贫困的大家庭中来品鉴的话，再也不是自然发展所能做到的。世界银行 2013 年 4 月 18 日发布了用 2005 年购买力平价 (PPP) 和 1.25 美元/天（即每人每月消费 38 美元）的新国际贫困线计算的新贫困人口，并将贫困数据更新到 2010 年。这组最新的数据显示，2010 年世界贫困人口 12.15 亿人，贫困发生率为 20.63%，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几乎占据了全球穷人的半壁江山，其次南亚、

^① 中国国际扶贫研究中心. 中国扶贫开发政策与实践[DB/OL]. (2009-7-9)

<http://www.iprcc.org.cn/publish/page/;jsessionid=6E69EB21D7F21482A96F1FBCA6F8B97>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也是贫困人口的高发区（表 4-5）。

表 4-5 2010 年世界贫困人口（用 2005 年 PPP 和 1.25 美元/天贫困线统计）

地区	人头指数 H (%)	贫困人口指数 PG (%)	贫困人口平方指数 SPG (%)	贫困人口 (百万)	总人口(百万)
东亚和太平洋	12.48	2.82	0.93	250.90	2010.44
东欧和中欧	0.66	0.21	0.13	3.15	477.0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5.53	2.89	2.12	32.29	583.89
中东和北非	2.41	0.55	0.23	7.98	331.26
南亚	31.03	7.09	2.36	506.77	1633.15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48.47	20.95	11.85	413.73	853.57
总计	20.63	6.30	2.92	1214.98	5889.37

资料来源：[http://www.world bank.org/povcalnet/](http://www.worldbank.org/povcalnet/) Replicate the World Bank's regional aggregation.2013-11-26.

在国别数据里中国更新到 2009 年，该年中国贫困人口 1.571 亿人，贫困发生率为 11.80%，比世界的平均贫困发生率低 8.83 个百分点。如果时间推至 1981 年，中国的减贫效应就更为明显，贫困人口则从 8.35 亿人下降到 2009 年的 1.571 亿人，使 6.78 亿人摆脱了贫困，相应的贫困发生率由 84% 下降到 11.8%（见表 4-6）。

表 4-6 世界分地区贫困人口比例（2005 年 PPP 和 1.25 美元/天）

	贫困人口比例 (%)					
	1981 年	1990 年	1999 年	2005 年	2008 年	2010 年
东亚和太平洋	77.2	56.2	35.47	17.11	14.3	12.48
其中：中国	84.0	60.2	35.63	16.25	13.1	
东欧和中欧	1.9	1.9	3.82	1.33	0.5	0.6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1.9	12.2	11.86	8.66	6.5	5.35

中东和北非	9.6	5.8	5.01	3.45	2.7	2.41
南亚	61.1	53.8	45.10	39.43	36.0	31.03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51.5	56.5	58.01	52.31	47.5	48.47
总计	52.2	43.1	34.05	25.09	22.4	20.63

*说明：最后一栏缺中国的数据，是因为中国的数据仅更新到 2009 年。

资料来源：根据 <http://www.worldbank.org/povcalnet> 的资料整理。

在这段时间内，全部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 19 亿人减少到了 12 亿，这个数字几乎和中国的减贫人口相近，从表 3-7 也可看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是贫困人口减少最快的地区，这少不了中国因素。与此相反的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贫困人口却在保持增长，而南亚地区视乎是“我自岿然不动”，当然这三个地区依然没有改变是世界贫困人口重点区域的事实。为此世界银行在评价中国的扶贫议程时，赞叹道“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扶贫努力，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数量不会有所减少”。当然这并不是说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地方的贫困人口一点没减少，而是说它们减少得太慢太少。

表 4-7 世界分地区贫困人口情况（2005 年 PPP 和 1.25 美元/天）

	贫困人口（百万）					
	1981 年	1990 年	1999 年	2005 年	2008 年	2010 年
东亚和太平洋	1096.5	926.4	653.65	332.08	284.4	250.90
其中：中国	835.1	683.2	446.35	211.85	173.0	
东欧和中欧	8.2	8.9	17.97	6.26	2.2	3.1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43.3	53.4	60.10	47.60	36.8	32.29
中东和北非	16.5	13.0	13.64	10.47	8.6	7.98
南亚	568.4	617.3	619.32	598.26	570.9	506.77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204.9	289.7	376.75	394.78	386.0	413.73
总计	1937.8	1908.7	1741.50	1389.20	1288.9	1214.98

资料来源：根据 <http://www.worldbank.org/povcalnet> 的资料整理。

总之，中国现行的贫困标准是根据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所确定的，尽管与国际贫困标准有较大的差距，但仍是过去可行但现在不合理的。

4.2.2. 不适应性面

一、标准偏低

对中国农村贫困线最大的抱怨声就是标准偏低，而且这个偏低的事实似乎是无可争议的。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证实：

1. 来自国际社会的证据。世界银行在 2009 年 4 月 8 日在对中国扶贫历程做出专题评价时就深刻地指出：“按照国际标准计算得出的中国消费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仍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最新的 2005 年直接问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仍然有 2.54 亿人口每天的花费少于 1.25 美元（按 2005 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这里的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与中国官方估计的农村 1500 万贫困人口看似不一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官方贫困线标准（2007 年为人均每年 785 元，或者说，按照 2005 年国际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平均每天 57 美分）偏低造成的。中国的贫困线标准在 75 个国家的抽样调查中是最低的。无论是与国际标准相比，还是与国内的平均收入和人们的期望相比，官方贫困线都是比较低的。而且，一些最新的研究也显示，即使按照贫困线应该达到的客观标准（最低生存所需支出以及满足衣食等基本生存需要）来衡量，中国官方的贫困线水平可能也太低。”^①

2. 国内外学者的证据。这方面的成果比较多，国外的如 Ravallion & Chen (2004, 2008, 2009)；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 Terry McKinley 教授 (2011) 指出：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27 个亚洲国家的国家贫困线占人均 GDP 约为 28%，印度国家贫困线是人均 GDP 的 20%，越南、巴基斯坦等是 25%，中国是最低的，只占到人均 GDP 的 8%。中国如果提高贫困标准，中老年农村人口，以

^① 世界银行. 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历程的演进[R].2009:概要 v.

及女性将会成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当中的大部分，而且农村有更多的人群成为贫困人群^①。国内学者就更多了^②。

3. 中国官方的证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扶贫办应该说最具有代表性，前者两次指出偏低的事实，中国国家统计局（2000）在其年度检测报告中就指出：与国际贫困标准相比，我国农村贫困标准是偏低的。世界银行根据 33 个发展中国家贫困状况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人均 1 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而中国现行的贫困标准只相当于人均 0.7 美元左右^③。十年之后的 2010 又再次提到：中国扶贫标准过低的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外各界的质疑。2008 年中国政府将农村扶贫标准提高到低收入标准，上调了 34%。这一举措受到了全社会的肯定。但是，新扶贫标准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仍是偏低的。2009 年农村新扶贫标准不到当年全国人均 GDP 的 5%，不到当年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的 1/4。^④就连中国扶贫管理部门都承认：“从世界范围来看，有 70 多个国家制定了贫困线，其中有 11 个国家的标准低于每天 1 美元生活费的标准，中国是其中之一。”2007 年 12 月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在“扶贫开发形势与政策研讨会”上的表达^⑤。国家统计局直接参与贫困线制定和从事扶贫监测的官员王萍萍（2007）也撰文指出：在目前有贫困标准的 60 多个国家中，中国的农村贫困标准是最低的^⑥。

偏低有三个显著表现：首先是它在中国人均 GDP 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中所占的比例比较低；其次是贫困线中食物所占的比例比较高，排斥了穷人的食物需求；三是与周边国家和国家贫困线相比偏低。

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是由两个硬伤造成的：一个是“食物比例过高”，二是贫困户纳入标准过严。

先来看第一个硬伤，王萍萍（2007）认为：中国现行农村贫困标准以汇率换算约为每天 0.25 美元，以 1993 年购买力平价换算约每天 0.7 美元。这个标准接

①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新发展阶段中的减贫挑战与对策[R]. 研究报告, 2011, (02): 8.

② 盛来运（2000）；林毅夫（2002）；刘玉森（2003）；李芝兰（2005）；萧灼基（2005）；骆祚炎（2006）；王荣党（2006）；姚金海（2007）；郑建平，刘兴武（2007）；张宏升，赵玉（2008）；王增文（2009）；陈明远（2009）；刘娟（2010）；冯瑛，陈建东，朱悦衡（2010）；张全红（2010）；朱四倍（2010）；张全红，张建华（2010）；顾昕（2011）等。

③ 中国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00. [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10.

④ 中国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10[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前页.

⑤ 李锡明. 新扶贫标准和国际贫困线[J]. 学理论, 2009, (24):123.

⑥ 王萍萍.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的比较.调研世界[J], 2007, (01): 8.

近但略低于世界银行 1990 年采用的赤贫标准。在她看来偏低的证据有两个，第一个证据就是在现行农村贫困线的食物消费支出即恩格尔系数达到 85%，第二个证据前面已经提到^①。

生存贫困的核心问题是穷人不能满足在当时社会生产或生活方式下维持生命正常活动所必须的基本生存需求。在中国基本生存需求包括通常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满足最低营养标准(2100 大卡)的基本食品需求；另一部分是最低限度的衣着、住房、交通、医疗及其他社会服务的非食品消费需求。前者是食物贫困线，后者是非食物贫困线，两者之和就是贫困标准。

在基本消费需求中，食品消费需求占 85%左右，这是一种典型的以生存为本的温饱标准。这样高的恩格尔系数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非食物的需求被挤压在 15%的空间里，维持生命的本意就是自然的了。这与国际粮农组织恩格尔系数标准（ $\eta \leq 60\%$ ）为“赤贫”的标准，超过了 25 个百分点，这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这就是中国贫困线偏低的结症所在。同时在这么高的食物需求中，并没有合理考虑蛋白质及其它营养要素的需求，只提供每人每天 2100 大卡的热量和每人每天 50 克左右的蛋白质，而维持人体的健康生存每人每天最低需要摄入 60 克左右的蛋白质。如果长期处于低蛋白质摄入量水平，贫困人口的健康就无法保证，特别是儿童的生长发育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这样的食物贫困线只能提供维持生存的“果腹”食品，而无法提供维持健康生存的基本食品。

第二个硬伤是发生在贫困户的选择上。中国对贫困家庭的识别有一套严格的纳入标准，严格到近乎于“苛刻”，所以贫困人口被“双重过滤”。1998 年的纳入标准是两个：(1)收入低于贫困线，同时消费低于 1.5 倍贫困线；或 (2)消费低于贫困线，而收入小于 1.5 倍贫困线。经过这样的“双重过滤”后，入选的只有三类家庭：第一类是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均低于贫困标准，这类人毫无疑问是贫困人口，属于应该扶持的对象；第二类是收入低于贫困标准，消费高于贫困标准但低于某一较高标准，这是消费水平较低，而且收入很低的一类人，即使从消费的角度看不算贫困人口，但由于收入很低，消费水平可能会很快降低进入贫困行列，所以，政府应该对他们进行扶持；第三类是消费低于贫困标准，收入高

^① 王萍萍.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的比较.调研世界[J], 2007, (01): 8.

于贫困标准但低于某一较高标准，这是收入水平较低，而且消费很低的一类人，这些人虽然偶然一年的收入略高于贫困标准，但消费水平很低，而且没有储蓄可以使消费达到贫困标准之上，因而政府应对他们进行持续的扶持^①。中国有句俗语是“矮子当中挑将军”，但农村贫困家庭的选择变成了“矮子当中挑矮子”，其实是一种“挤出标准”。

所以，这样一条线，即使是按照 2008 年的两线合一，采用传统的低收入标准作为农村贫困线（人均 1196 元）也才接近国际贫困线的每天 1 美元的标准，而一天 1 美元的标准是根据世界上最穷的 12 个国家的贫困线制定的，实际上是“赤贫”的标准，即使 2008 年的 1.25 美元的新国际贫困线，也是 15 个最不发达国家贫困线的平均数。那还有理由说在这之前的 20 余年里中国的贫困线不低吗？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事实，已于 2008 年开始提高农村贫困线的绝对标准。

二、全国“一条线”

如前所述，中国农村贫困线的发展轨迹走的是“一二一”之路，没有地区差异，区域上无东、中、西贫困线，行政上无省、地贫困线之分，就更无（市）、县贫困线之说了，全国执行“一条线”。其实淡化了贫困线是识别社会生活最底层尺度的作用。因为生活水平在任何国度都有地区差异，即使是拿同样的收入在不同的地区实际享受的福利水平也是不一样的，就是通常所说的工资的“含金量”不一样。全国“一条线”往往会低估了发达地区的贫困发生率，高估了落后地区的贫困发生率。Xiuqing,W.,L.Juan and Y.Shujie,etc（2008）曾计算了中国的湖北和内蒙古两个省区的贫困线，结果发现较发达的湖北贫困线高于国家贫困线，而内蒙古的贫困线则远低于国家贫困线^②。

我们知道，由于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和民族等方面的差别，不同的区域会对“最小需求”产生影响，从而对贫困线产生影响。区域对贫困线的显著影响莫过于城市和农村的划分了。首先是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不同地区的需求和福利水平不同。其次是社会、地理、民族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不

^① 王萍萍.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的比较[J].调研世界, 2007, (01): 7.

^② 叶初升、罗连发、邹欣.贫困线调整与贫困发生率比较问题研究评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1, (05): 18.

同地区的“最小需求”有所不同。如不同的气候条件，热带、寒带、阴湿、干燥，对生存所需的热量标准是不同的；而不同社会长期因袭逐渐形成的饮食偏好、食物结构，构成了同等热量、蛋白质所需消费的食品品种、数量不同；同样，不同的民族的风俗、习惯、传统和宗教，也都需要在必需品消费中增加不同份额风俗消费、宗教消费和传统文化消费等。因此，在制定贫困线标准时，必须要照顾到该标准所覆盖的地区中，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不同单位的福利水准，并辅之以相应的贫困线，以便于对比。

其实只要我们总结一下国内外成功的反贫困经验就可以看出，最为有效的贫困线在于融合地域特色而设计，这一点在那些民族文化氛围浓厚的地域体现尤其突出。俄罗斯（2002）这方面最突出，他们根据国家的气候、饮食习惯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多个因素将国家贫困线分成不同的几个区域，再根据不同的区域来制定不同的贫困线。即使是世界银行也是这样认为：具有国际可比性的贫困线对于总结全球贫困的总体情况是非常有益的。原则上说，这些贫困线可以测试出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大致相同的一篮子商品的能力。不过这样一条通用的贫困线一般不适用于对一国国内的贫困状况进行分析。因此，为了反映一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需确定适用于特定国家的贫困线。同样，如果商品价格、市场销售管道和服务不同，那么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如城市和农村）的贫困线也需进行调整。目前国际上较为通行的做法是，根据一国特定的贫困线确定反映该国贫困状况的指针^①。所以，世界银行在其每年的旗舰系列报告《世界发展报告》中，大多数年份都采用了多条贫困线，如1990报告的贫困线和赤贫线，1994年以后各年度报告的各国政府贫困线以及1美元、2美元1天的贫困线；马丁还制定过5条不同的贫困线供世界银行选择，既反映了不同层次贫困状况，又体现了国际可比性。

我国南北地理特征十分明显、东西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分明，各区域之间饮食习惯和生活水平差异较大，农村的生产力条件千差万别。因此，因尽快打破农村贫困线“一条线走天下”的现状，朝区域化和地方化的方向发展，逐步制定大区域和省际贫困线。

^① 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编写组.世界发展报告 2000-2001 与贫困作斗争[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2001：22.

三、增幅太慢

1986年，中国第一条贫困线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13元，2008年贫困线提高到1196元，22年增长4.62倍，平均每年增长8.16%，而在此期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约42倍，平均每年增长16.97%，增长速度是贫困线的2.08倍。它与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制定之初约为1:2（213/424元），扩大到2007年1:5（785/3587元）。如果从贫困线自身的发展看，无论是从绝对数还是从相对数看贫困线的每年的增幅都不大，甚至有3年（1998、1999和2002年）出现了负增长，而从1997年到2006年的9年间绝对数仅增加53元。有趣的是在1994年“八七”攻坚计划、1997年贫困线调整、2007和2008年再次调整之年，贫困线出现大步提升，形成两个阶梯。这也说明中国农村贫困线受政府行为和重大政策的影响较大（见表4-8）。

表4-8 中国农村历年贫困线增幅比较

年份	贫困标准 (元/人)	逐期增量 (元/人)	环比增速 (%)	年份	贫困标准 (元/人)	逐期增量 (元/人)	环比增速 (%)
1986	213			1999	625	-10	-1.73
1987	227	14	6.57	1998	635	-5	-0.79
1988	236	9	3.96	1999	625	-10	-1.73
1989	259	23	9.75	2000	625	0	0
1990	300	41	15.83	2001	630	5	0.80
1991	304	4	1.33	2002	627	-3	-0.48
1992	317	13	4.28	2003	637	10	1.59
1993	350	33	10.41	2004	668	31	4.87
1994	440	123	38.80	2005	683	15	2.25
1995	530	90	20.45	2006	693	10	1.46
1996	580	50	9.43	2007	785	92	13.27
1997	640	110	20.75	2008	1196	411	52.36

* 2008 年以后新贫困标准将原低收入人口纳入，因此，2008 年的贫困人口数据与历史数据不可比。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2000-2012 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7-2011 年中国农村贫困检测报告；中国发展报告 2012.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有的学者认为，如果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多年来中国现行的农村贫困线未有实质性的变化。图 4-2 显示了从 1985 年到 2007 年我国农村贫困线几乎是一条平滑的直线。表面看来，农村贫困线有较大幅度地提高，但实际并未提高甚至还有所降低，这一点可以从观察实际农村绝对贫困标准的变动趋势得到证实。事实上，1985 年的农村贫困线为 206 元，从 1986 年到 2007 年二十一年的时间里，实际农村贫困线除 2007 年达到 214 元外，其余所有年份均低于 206 元，其中 1989 年甚至低到 164 元。2000 年以后虽然按照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微调，但并没有实质性地提高^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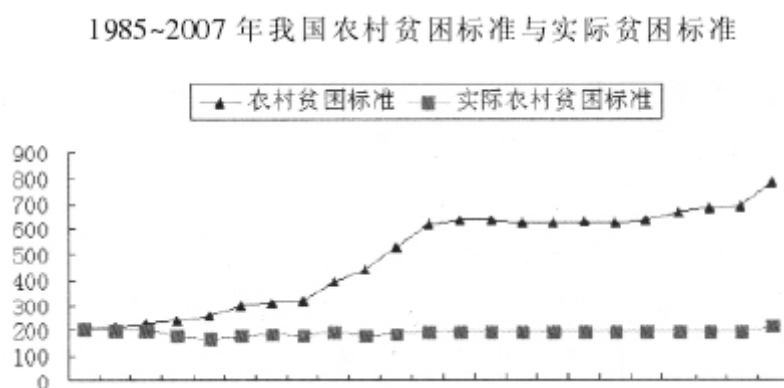


图 4-2 扣除物价影响的贫困线

*三角线是中国公布的历年农村贫困线，矩形线是依据 1985 年的农村居民消费不变价格调整后的贫困标准。

资料来源：张宏升，赵 玉.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的重新检视[J].理论探索，2008，(03): 99.

四、亲物价不亲收入

中国贫困线的调整机制一直是跟随居民消费指数（CPI）也称亲物价倾向。这种调整机制的本意是保持贫困线的绝对购买力不变。但是事实如果食品价格的

^① 张宏升，赵 玉.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的重新检视[J].理论探索，2008，(3): 99.

增长高于消费价格指数增长，这种调整机制导致贫困线绝对购买力下降；同时，随着收入的快速增长，贫困线相对购买力急剧下降。那还如何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有学者实证研究发现：1978—2008年，从表面上看，农村贫困线的购买力在上升，可以说农村贫困线基本可以“跑赢”价格，甚至还有所提高（见图4-3）。实际上，若按收购价计算，1978年的贫困线可以购买453公斤粮食，1983年可以购买834公斤，但是1995年只能购买255公斤，到2008年只可以购买464公斤粮食。而这期间中国主要三种粮食（稻谷、小麦、玉米）收购价上涨7.49倍，部分年份粮食价格的高涨造成贫困家庭的生活更加艰难。从大类看，1984年维持基本生活的12类食品所需要花费为288.7元，但到2009年3月，维持同样的生活水平，则需要花费2249.5元，上涨7.8倍。但是同期农村贫困线只上涨了3.2倍。这表明，与消费价格指数挂钩的农村贫困线的实际购买力在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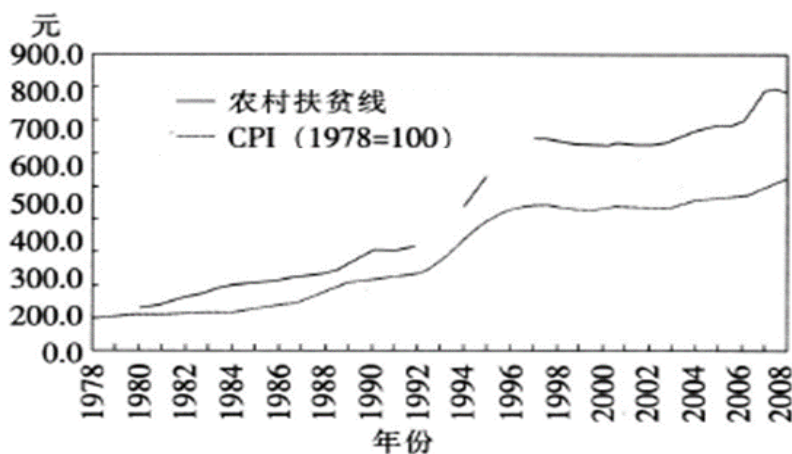


图4-3 中国农村贫困线与CPI的变化比较

*说明：1979年、1993年、1996年农村扶贫线资料缺失。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8年各卷；《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78—2008年各卷。

贫困线与CPI挂钩，虽然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保持贫困线的绝对价值，但其相对价值却会因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发展而下降。如下图所示1978年农村贫困线占人均收入的比例是75%，1986年是50.24%，而到2008年下降到17%^①。

^① 杨立雄.物价波动、收入增长和地区差距[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9, (11): 1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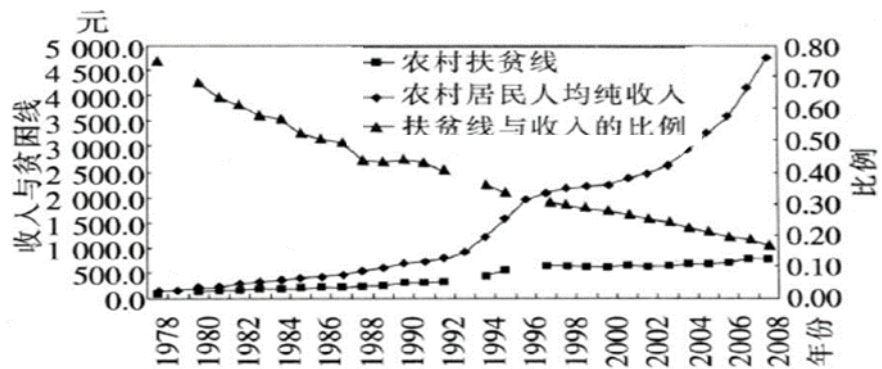


图 4-5 贫困线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

资料来源：杨立雄.物价波动、收入增长和地区差距.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J]，2009，(11)：15.

五、与国际和周边国家的差距太大

如果将 2008 年（合并之前）中国农村贫困线与国际贫困线对应的贫困发生率描绘在一张图中，我们就会发现，前者是近乎于没有坡度的直线，若将采用一天 1 美元（1.08 \$）的国际贫困线，坡度马上提升；若再采用一天 1.25 美元的最新国际贫困线，就更为陡峭。这充分地说明中国的贫困线是极度偏低的。当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无论采用那一条贫困线中国的减贫效果都是十分显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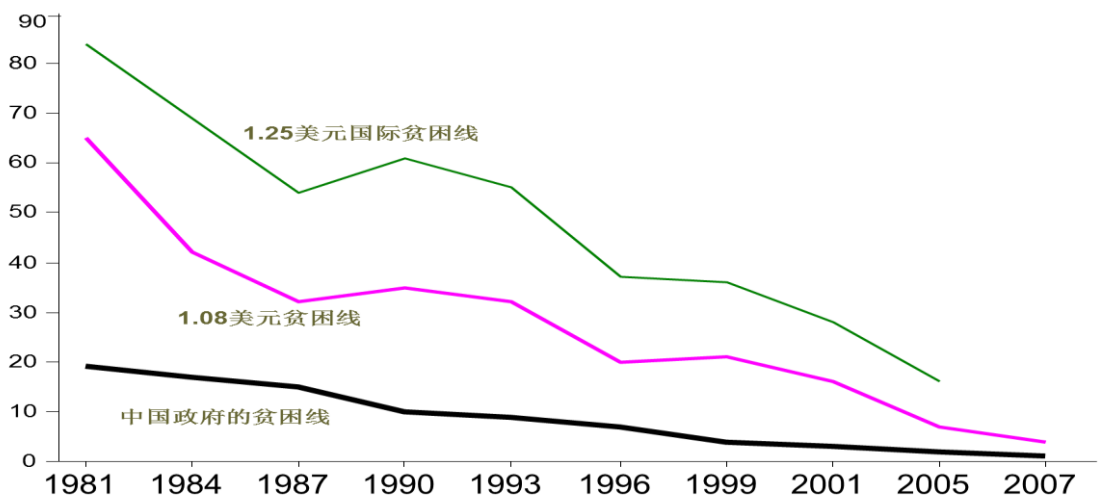


图 4-5 中国农村贫困线与国际贫困线的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国际扶贫研究中心. 中国扶贫开发政策与实践[DB/OL].(2009-7-9)[2013-11-16]<http://www.iprcc.org.cn/publish/page/?jsessionid=6E69EB21D7F21482A96F1FBCA6F8B973>.

从理论上讲，在假定各国的贫困标准一样的条件下，取得低贫困发生率的条件应该是高人均 GDP 和低基尼系数，即相对较高的收入和较公平的收入分配是取得极低贫困发生率的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贫困标准偏低。反过来，在大致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贫困发生率高是判定贫困线高低的正指标。

从世界银行发布的贫困发生率来看。在有贫困线的 86 个国家里，官方公布的贫困发生率高于世界银行测算的有 33 个，在 45 个中等发展国家中，低于世界银行测算有 11 个国家，中国在这 11 个国家之列。中国官方公布的贫困发生率为 2.8%，世界银行估计的为 15.9%，相差 13.1 个百分点^①。

如果将中国部分省市农村贫困线与亚洲部分国家（马来西亚、泰国、蒙古、马尔代夫、柬埔寨、菲律宾、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不丹、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泊尔、老挝）的贫困线做比较，中国甘肃农村平均最低生活保障线排在倒数第一位（甘肃的人均 GDP（PPP）也处于倒数第一位）；而中国上海的农村贫困线与人均 GDP 超过 6 000 美元（PPP）的泰国处于同一水平，仅只低于马来西亚^②。这充分说明中国农村贫困线的国际差距是明显的。

六、没有考虑贫困线的构成维度

中国贫困线的制定者和研究者都把精力集中在贫困线制定的技术上，却很少去关注贫困线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换句话说，就是要在确定一条贫困线时哪些东西是任何贫困线的必备构件，或者说哪些设计内容应该纳入贫困线的维度。只有这些构件和维度是稳定和被认可的，那贫困线的比较、监测和数据收集才有基础，那剩下的就是各个国家或地区根据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选择和确定纳入维度的多数和各个维度比例的高低了。从而在此基础上也才能谈论贫困线的高低和调整的机制问题。所以，中国农村贫困线一直走不出偏低和受到种种质疑的泥塘的原因很大源于此。

^①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课题组.世界各国贫困标准研究[R].2010, (01): 2.

^② 杨立雄.物价波动、收入增长和地区差距[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9, (11): 17.

4.3 危害与影响

贫困线是区分穷人与非穷人的分界线，如果制定的贫困线草率和不合理，将会产生一系列负效应，具体来讲主要会带来下面这些危害和影响。

4.3.1 漏检贫困人口

贫困线牵动着贫困人口的“神经”，只要贫困线稍有变动贫困人口立马发生显著变化。以中国的贫困人口为例，由于贫困线的制定方法不同，其估算的贫困规模和贫困发生率大相径庭：两大国际机构的数据都不一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05 年中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认为，2004 年中国贫困人口的估计数超过 1 亿人，远高于同年国家统计局估计的 2610 万人；世界银行采用购买力评价数据和 1 天 1 美元的贫困标准，按收入计算中国贫困人口为 1.35 亿人，按消费计算则为 2.04 亿人。而中国仅 1995 年就有 6 种关于农村贫困程度的数据，其中国家统计局估计的贫困人口发生率为 7.1%，其它估计数从 8% 到 28.8%不等^①。这就给扶“谁”，扶多少等判定中国的贫困状态带来了困难。

另外，具体一条贫困线的高低，就像一个水库的闸门，它在时刻管控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人口的总量，提高则流进水渠的水多，压低则流进水渠的水少。

表 4-9 2000—2007 年调整贫困线后的比较

年份	贫困标准 (元/人)		贫困人口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贫困变动		
	原	新	原	新	原	新	标准	人口	发生率
2000	625	865	3209	9422	3.5	10.2	+240	+6213	+6.7
2001	630	872	2927	9030	3.2	9.8	+242	+6103	+6.6
2002	627	869	2820	8645	3.0	9.2	+242	+5825	+6.2
2003	637	882	2900	8517	3.1	9.1	+245	+5617	+6.0

^① 张全红.对中国农村贫困线和贫困人口的再测算[J].农村经济, 2010, (02): 51.

2004	668	924	2610	7587	2.8	8.1	+256	+4977	+5.3
2005	683	944	2365	6432	2.5	6.8	+261	+4067	+4.3
2006	693	958	2148	5698	2.3	6.0	+265	+3550	+3.7
2007	785	1067	1479	4320	1.6	4.6	+282	+2841	+3.0
2008	1196	1196		4007		4.2		+0	

*原：指《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08》公布的数据。

*新：指两线合一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10》公布的数据。

资料来源：据以上两个资料和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从表 4-9 可以看出，2008 年底，中国政府宣布将贫困线从人均年收入 785 元提高到 1067 元，并将中国原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合二为一，贫困人口立即增加 2841 万人，达到 4320 万人，增加了 1.92 倍。2010 年中国统计局采用同样的方法，执行一条贫困标准，并将数据更新到 2000 年，其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立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 2000 年贫困人口较当年实际扶贫人口增加 1.94 倍，贫困发生率增加 1.91 倍，重新回到了上世纪“八七攻坚计划”之前的水平。这一增加不是说明中国的穷人增多了，而是说明中国实际的贫困人口更多地受到了关注，更多的实际贫困人口得以纳入政府的扶贫视野中。

4.3.2 扭曲扶贫绩效的评价

贫困线既是识别贫困人口的工具也是评价反贫困绩效的依据。标准过低和增速过慢的贫困线不仅极易滋生脱贫人口越多、贫困人口越少、扶贫工作成绩就越大的急功近利的错位评价标准，盲目乐观扶贫工作的成绩。同时也让相当一部分本应享受政府和社会关爱帮助的穷人被排除在帮扶对象之外，人为地阻碍这部分人的生活改善，让很多实际的贫困人口享受不到国家扶持，加快了贫困人口的发育，累积更多的潜在贫困人口。难免出现数字减贫的常见现象，“形势好、意见大”的局面。另外，提高了反贫困的脆弱性。过低的贫困线使得脱贫容易返贫也容易，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就会出现“脱贫→返贫→脱贫”的死循环，最终使短期贫困表层化，长期贫困隐形化。影响了反贫困质量的提升，反贫困工作陷入了一个无边无际的烂泥塘，并挫伤反贫困工作的积极性。

4.3.3 贫困线异化为贫困县

贫困线本来是用来度量家庭或个人是否陷入生活困难的尺度，其依据的指标是人均收入（或消费），自然其帮扶和救助的单位就应该是家庭或个人。但十分有趣的是在中国对贫困线的认知度不如贫困县，贫困线在政策的推行过程中被转换成了贫困县，贫困线我们更多地见于官方的统计年鉴和扶贫管理部门，而贫困县则被媒介和公众所知晓，甚至争戴贫困县的帽子。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也得到证实，多数乡镇一级的老百姓问他们知不知道国家的贫困线是多少，多数的人均以摇头表示，甚至已经被扶了多年的贫困户也是如此。可见现实的中国农村贫困线的统计和检测功能强于帮扶和救助的功能。这还可以从中国自实施扶贫战略以来的瞄准机制中得到更完整的解释。

中国实施的是开发式扶贫战略，以区域为瞄准机制，四次大的扶贫战略作出均是以区域为对象的，行政县的特征十分明显。贫困县本不是什么光荣的称号，但近些年来有的县把挤进国家（或省级）扶贫重点县作为施政目标或列入地方的发展规划，得到这顶帽子时甚至敲锣打鼓地庆贺。一旦戴上这顶帽子上级主管部门要再把它摘掉也就困难了，从 1981 年划定第一批国定贫困县开始至今有增无减（1981 年农业部首次确定了划定贫困县的标准：用人均集体分配收入 40 元和 50 元来划分 1977-1979 年的穷县和穷队。）。之后的确定和调整扶贫开发单位均以县级为扶持的基本单位。1986 年确定 331 个国家级贫困县；1994 年，为了组织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国家级贫困县增加到 592 个；2001 年，配合《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的出台，取消了沿海发达地区的所有国家级贫困县，增加了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县数量，但总数仍为 592 个，同时将国家级贫困县改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西藏作为集中连片贫困区域全部享受重点县待遇；2011 年按照“集中连片、突出重点、全国统筹、区划完整”的原则，制定《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精神，将 14 个连片特困地区确定为未来十年的扶贫攻坚的主战场，片区县的数量增至 680 个。

其实，这背后要的是国家或省给的一大堆资金和优惠政策。虽然这样的瞄准机制在大面积贫困的情况下曾使中国的贫困人口快速锐减，但它确实改变了贫困线制定的初衷，使贫困线制定的目标群体和最终的援助的群体发生错位，结果导

致严重的覆盖不完全和漏出问题，也使反贫困资源的投向发生了转变。随着中国贫困人口向分散化和相对化方向发展，瞄准对象由贫困县向贫困村、贫困家庭和个人转变，这一问题的弊端将更加明显。

表 4-10 中国扶贫瞄准区域比较

序号	时间	名称	瞄准单位	与县的关联
1	1986年	国定贫困县。	中国政府第一次确定了国定贫困县标准：以县为单位。	331 个行政县
2	1994年	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民间称国家级贫困县）	1994年，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对国家扶持的贫困县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一共确定了 592 个国定贫困县。从集中连片的角度看，这些贫困县主要分布在 18 个贫困地区。	592 个均是以行政管辖“县”的地域作出的。18 个贫困地区是集中连片“县”的扩大。
3	2001年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制定并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在称谓上有所改变，把“国定贫困县”改称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数量还是 592 个。	进一步强化“县”作为瞄准单位。
4	2011年	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制定《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确定了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和西藏、四省藏族聚居区、新疆南疆三地 14 个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为中国未来十年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共涵盖的 680 个县。这些片区是更大范围的贫困“县”的整合。

			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	--	--	-----------	--

资料来源：自己编制

4.3.4 干扰扶贫政策的制定

好的政策来源于实践，贫困线是度量穷人的尺子，这把尺子不准确，那测量出的穷人数量和贫困的程度就有问题，那以此为依据制定的反贫困政策就可能出现大问题。这就如同战争中的情报一样，情报出了问题还可能打胜仗吗？它会影响到一系列反贫困政策的出台环节，诸如扶贫方案的设计、扶贫战略的选择、扶贫规划的制定、扶贫资源的集聚和投向、瞄准机制的建立、项目的编制和扶贫信息的检测等等发生偏差，最终导致反贫困政策的整体失误，影响了反贫困进程的推进。

4.3.5 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

贫困人口是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同样是社会前进和改革发展的动力。贫困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有资源、地理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如果这部分群体长期得不到关注，见不到国家和政府给予的“阳光”，放任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与全国的发展差距继续扩大，那他们就有可能成为社会稳定的风险因素，严重影响到社会和谐。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反贫困是社会的稳定器之一，贫困人口的数量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面子，但贫困人口能否得到救助，动摇的却会是一个国家的根基。贫困线的高低和科学与否是具体体现重视人的发展的观察点，制定与国力相匹配的贫困线和反贫困政策，可以缓解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带来的不平等，抑制贫富分化的加剧，促进社会的公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彰显政府的职责，也是现实推行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之一。

4.3.6 误导国际声音

贫困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并始终是各国政府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关注的对象。贫困线越低，贫困发生率就越低，但贫困发生率不是越低越好。大部分国家的扶贫规模都在总人口的 10% 以

上，发达国家的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在 9%—18% 之间、美国 12% 以上、俄罗斯 13% 左右、韩国 14% 左右、日本 15% 左右；从发展中国家看如印度在 20% 以上、巴西 16% 以上、越南 15% 以上^①。2010 年我国公布的贫困人口为 2688 万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 2.8 %。如果按这样的比例跟国际比较，那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不是比当今头号经济强国美国还低吗？中国贫困问题可以说已经趋于消失。这也是导致一些国际组织不愿意把中国再看成发展中国家，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从而让中国背负一些与国家经济实力不匹配的国际义务和责任的重要根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提高贫困线是改善和维护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国家形象的需要，不必在贫困人口规模上讳疾忌医。

4.4 哪里出发？

这么说来农村贫困线到了必须大步调整的时候了，那么如何调整呢？前面说过，贫困线的调整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内容的问题，也就是说关注的不是方法的层面（这方面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成果），而是要关注它的基本结构，即贫困线一般应由哪些要素和内容构成，即贫困线的维度问题。那我们从哪里出发来遴选这些维度呢？下面这些基本点是构成这个框架的结点。

4.4.1 视角：公平与效率

制定贫困线不能看成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本质上是如何处理发展方式的问题，并一直成为发展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关注的持久主题。所以我们应该从更高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如何发展一直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长期思考并艰难探索的问题，以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来看，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从这个视角看贫困线的制定就变成了一场公平与效率的抉择问题。

^① 刘奇. 创新思维：重构中国扶贫战略[J]. 中国发展观察, 2010, (10): 35.

4.4.2 理论基础：一主多依（辅）理论体系

贫困线的制定这在百多年的发展中产生了许多成熟的理论，在各自理论的支持下又形成独特的方法，这些方法都各有优缺点，靠一种方法独揽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借助多维论的思想，可以整合这些理论为制定适应性更强的贫困线提供理论支撑。具体的思路是：建立一主多依（辅）理论体系。要从体系上去构建，而不是观点上去采纳，让各个具体的方法在贫困线制定的各个环节和过程中发挥其优势。具体以绝对论（贫困线）为主，相对论（贫困线）验证相对比例的合理性、主观论（贫困线）和共识论（贫困线）通过倾听穷人的声音，获取穷人的需求意愿，多维论确定纳入贫困线的维度。

4.4.3 可比性：四个可比

中国农村贫困线由于每次调整装入食物篮子的内容、非食物贫困线的比例和具体制定方法的不同带来可比性较差的问题。今后贫困线的制定应着力解决四个可比的问题：即地区可比、城乡可比、历史可比、国际可比。地区可比按照世界银行专家的观点，指的是生活在不同地区但生活水平相同的两个人均应列入贫困阶层范畴^①。城乡差别是中国经济最严重的地理特征。现行农村贫困标准仅仅是我国各地城市贫困标准的四分之一左右，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异为 3.3 倍。这有违于一般贫困线的区域差异应该小于平均收入区域差异的常规，这不利于正确把握城乡实际贫困状况^②。因此，应通过建立城乡可比的贫困线的制度，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历史可比就是要从贫困线的内涵、制定的基本方法、选用的指标、纳入的维度和计算的口径等方面达到可比。国际可比就是可以和国际上通用的贫困标准进行直接比较。现实是人们常提的问题是 1 天 1 美元到底等于 1 天多少人民币？按世行的原来的估算，略低于中国的低收入标准。但是为什么世行公布的贫困发生率会大大高于国家统计局测算的低收入标准下的人口比重呢？与国际贫困标准比较，我国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偏低，导致了较多的争议。贫困是一种全球性的现

^① 马蔚云. 俄罗斯贫困线: 基本概念与测定方法[J].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8, (05): 30.

^② 王萍萍. 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的比较[J]. 调研世界, 2007 (01): 8.

象，千年发展目标是人类在 20 世纪末反贫困的共同追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的加快，对贫困标准的确定和反贫困的行为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贫困线的国际比较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强烈。

4.4.4 成本与效益：三性

制定农村贫困线不仅是为了得出一个数量标准，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和确定出一套科学方法，通过这套方法就可以测算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的农村贫困线。它的制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很多因素、牵涉不少人力物力，所以必须考虑成本与效益的问题，使它成为既是民生工程，也是节约工程。如何做到呢，“三性”是一个检测标准：即数据的可获性、方法的简便性和发布的时效性。数据的可获性就是制定贫困线所需数据的收集、整理上要有简单便捷的通道；方法的简便性就是在计算方法上要尽量通俗易懂，以便于操作者掌握和运用，乃至市县一级的工作人员都会使用；时效性就是不能让贫困线成为总结性数据，今年来算去年账，而要成为计划指标、预警和检测指标，每年定时公布，从而为提高贫困线的可比性打下基础。

4.4.5 内生式：尊重和倾听穷人的声音

以往的贫困线制定都是政府行为，都是由外向内的，忽视了穷人的声音，穷人是最了解自己的需求的，也是最理解国家的困难的。应像世界银行倡导的参与式扶贫方式一样，扩展其功能，让穷人在制定他们的援助标准时就有机会参与，尊重和倾听穷人的声音。在这方面主观贫困线法可以发挥其优势。

4.4.6 调整的机制体制：制度化和公开化

中国近几年不断提高农村贫困线，但国内为什么批评声还是不断呢？我认为主要它的制度制定方法、过程和调整的依据没有公开化和制度化带来的。贫困线不是一个数字大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出台的依据、制定的方法、纳入的内容和调整的机制要被社会认可，特别是被贫困人群所接纳才是关键。即贫困线不是数字的大小，即标准高度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设计问题，它至少包括遵循什

么依据制定，包括什么内容（维度），采用什么方法制定，按什么程序调整（修订）、发布、监测和反馈等方面内容的选择和确定，并最终制度化和标准化及公开化。近年来，特别是调整机制的问题受到很高的关注，应建立持续、稳定的调准机制，这样中国的反贫困才可能真正踏上可持续之路，成为贫困国家多方面学习和借鉴的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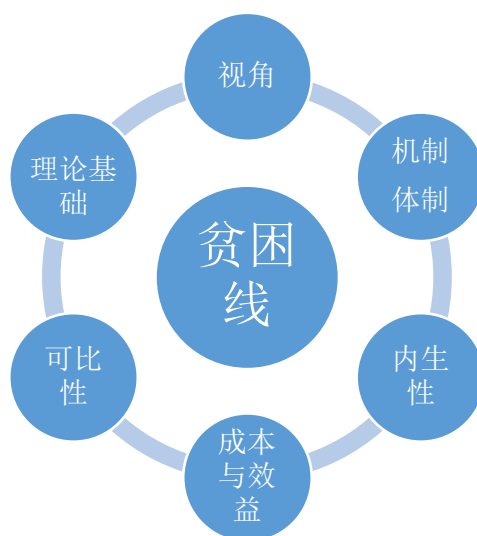


图 4-6 贫困线优化的线路图

5 优化贫困线的哲学基础：效率与公平的再度抉择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百年以来一直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奥肯认为“平等与效率的抉择是最大的社会经济抉择。它在社会政策的各个方面困扰着我们。我们无法在保留市场效率这块蛋糕的同时又平等地分享它。”^①反贫困是政府以公平为导向的最大政策选项，确定贫困线是所有反贫困的基础工作。贫困线是政府为社会设立的最后一道“安全网”，科学合理的贫困线可缓解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带来的不平等，抑制贫富分化加剧，促进社会公正。所以，贫困线的确定关乎公平与效率的抉择：确立客观的贫困标准，是对公平的抉择；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对效率的抉择。而抉择公平的实现，则有赖于贫困标准与经济关系的和谐关系。

5.1 效率与公平的社会诉求

公平和效率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两个基本原则。西方人谈到公平往往与两个词有关，且时常通用：一个是“Justice”即为正义、正当、公平、公正、公道、合理；另一个是“Equality”，即为平等、均等、同等、均衡、公平、公证、合理等意思。在中国公平和平等有着明显的区分，人们常用《辞海》的解释来理解平等，即“平等是人们在社会上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而从一般意义上看，公平是指人们对某种社会现象（关系）的一种道德评价，即它是否应当如此，是否正当合理^②。从广义上讲它是指调节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财富分配关系的一种规范，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在经济交往过程中，贯彻平等竞争、等价交换、机会均等、收入分配平等；二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三是指价值观上倡导一种人格的独立平等和个人价值的平等。简言之公平就是经济公平、政治公平和伦理公平。

从这个角度看公平反映了对主体间交往关系的度量，它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有属性，公平是对某种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和评价的基本尺度。公平属于上层建筑

^① [美]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M].王奔洲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 2.

^② 夏文斌.公平、效率与当代社会发展[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0.

的内容，它是一种制度规范和价值形态，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其实平等和公平是相互联系的，穆勒对此曾作过经典的描述：“平等观念往往在公道概念及它的实施都算一个成分，并且在许多人眼中，平等是公道的精义。”^①可以说，公平的核心前提是平等，没有平等就不存在公平，公平内在地包含着平等，但不等于平等。从维度上看，公平是一个三维甚至多维的概念，它主要表现为一种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而平等却是一个二维概念，它是自身与他人比较的结果。

对效率的研究多见于经济学领域。效率在萨缪尔森看来是指尽可能有效地利用该经济体的资源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和愿望^②。常用生产可能性边界来衡量。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有些不太好理解，中国学者夏文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通俗性的解释，效率通常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生产效率，即单位时间里投入产出之比；二是指经济效率也称配置效率，即现有生产资源与它们所提供的人类满足之间的对比程度。构成效率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物品或劳务的质量与数量；二是这种物品或劳务的所具有的效应；三是生产者在交易中所获得的效益。这三个条件缺少了一个都不构成现实的效率^③。所以一句话，效率是生产效率、生产效应和生产效益的合称。

效率与公平构成了人类历史前进的永恒命题。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革命、每一次历史性的冲突和矛盾都是对效率与公平的一次艰难抉择。公平和正义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有多少仁人志士对此进行过艰苦的求索与研究，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最为引人注目，对平等的研究伏尔泰、卢梭的许多观点时至今日还为人们所赞赏。伏尔泰提出：“一切种类的一切生物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④而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按照卢梭的观点是在社会里。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开篇就将人类不平等分为两种：“一种，我把它叫做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基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不同而产生的；另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起源于一种协议，由于人们的同

^① 夏文斌.公平、效率与当代社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8.

^② [美] 萨缪尔森，若德豪斯.萨缪尔森谈效率、公平与混合经济[M].萧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60.

^③ 夏文斌.公平、效率与当代社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4、230.

^④ 刘义安.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美国、瑞典模式的比较与借鉴[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20.

意而设立的，或者至少是它的存在为大家所认识。”^① 追究这两种不平等的起源，他认为是私有制的出现和人类财富占有上的差别造成的：“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了它的力量并成长起来；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②

他把人类不平等的进展归结为三个阶段：“我们会发现法律和私有财产权的设定是不平等的第一阶段；官职的设置是第二阶段；而第三阶段，也是最末一个阶段，是合法的权利变成专制的权力。”^③在他看来，不平等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财产权的确立和由此而造成的“富人和穷人的不平等”，然后是不平等的第二阶段，这时由于“权力机关的设置”，这就产生了“强者和弱者的不平等”，最后是不平等的第三阶段，由于合法权力变成专制权力，从而产生了“主人和奴隶的不平等”，这是不平等的顶点。并对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也作了概括：“由于通常人们主要是根据财物、爵位或等级、权势和个人功绩等方面的差异来相互评价，我可以指明，在这四种不平等中，个人的身份是其他各种不平等的根源，财富则是最后一个。而各种不平等最后都必然会归结到财富上去。因为财富是最直接有益于幸福，又最易于转移，所以人们很容易用它来购买其余一切。”^④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对不平等的起源和表现最深刻的和系统的阐述。

公平往往与另一词息息相关，那就是正义。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存在公平和正义问题，无论国家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都绕不过这个堪，用约翰·罗尔斯的话来说，这叫做“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⑤。他对此作了深刻的阐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接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⑥，在他看来，正义坚守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每个人都平等自

^① [法]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70.

^② [法]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149.

^③ [法]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141.

^④ [法]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143.

^⑤ 刘义安.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 ——美国、瑞典模式的比较与借鉴.[M]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43.

^⑥ 刘义安.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 ——美国、瑞典模式的比较与借鉴[M].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3.

由；另一个是在事实上不平等的条件下社会政策要“合乎最少受益者的最大利益”，从而使所以社会成员都能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

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及多样性，人类的任何活动都必须讲效率，特别是成为经济活动的核心问题，当然也成为经济学家讨论的热门主题。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主要关注生产效率和社会效率，在他看来，社会分工是导致生产效率提高的首要决定因素，自由竞争是提高市场效率的基本因素；马歇尔的均衡效率和帕累托最优效率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观；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国家干预提高宏观经济效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由伦敦学派、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构成，但以“市场化、专业化和私有化”为代表的“三化”主张成为了他们共同的效率观。这样如果从价值判断上来看，效率侧重于一种经济学判断，而平等侧重于一种伦理、价值判断。

如何来看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呢？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在效率与公平与两个砝码之间寻找平衡点。从哲学意义上讲，效率与公平是一对辩证统一的关系：

第一、效率是公平的基础。

这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形成公平的物质基础来自于效率。可供人类消费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的需求是无限的，只有效率才能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料来满足人类的需要。试想一个产品严重匮乏的社会，是不可能推进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的。换句话说，没有效率的提高，没有生产率的高度发达，任何社会的公平都将失去根基。所以，公平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和价值判断，一个首要的前提就是提高经济效率。

其次，效率的发展也推进公平的发展。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每一次社会进步极大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都在新的基础上促进了公平的进步。以资本主义为例，以竞争为特点的市场经济，利润最大化成了一切企业追逐的目标，效率也成了获得超额利润的最重要的手段，与此同时也形成等价交换、机会均等和平等竞争等公平观念。

最后效率和公平是相通的。经济效率的最根本的要求就是机会均等，这是在市场中所形成的效率原则，同时也是公平原则。机会均等就是一种起点和条

件的平等，即每个人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重要成员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对这一特征有过充分的描述：“市场上各方必须应该自由地按照他们能找到交易伙伴的价格进行买卖，任何人必须应该自由地生产、出售和买进任何可能生产和出售的东西。进入各种贸易的通道也必须在平等的条件下向所有人开发，法律必须不能容忍任何个人或集团通过公开或隐秘的力量限制这些通道。”^①

第二、公平反作用于效率。

这从两个层面体现出来：首先公平构成了效率提高的基本保证。效率的提高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必须依赖一个公平的规范约束。这种对公平的约束，既来自于市场竞争过程中也来自于市场竞争之后。作为公平原则的收入分配原则其唯一的尺度就是效率，但有了效率并不必然带来公平。如果在收入分配中仅仅考虑效率原则，就必然会拉大贫富差距，触发社会矛盾，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从这个角度说，没有社会的公平就没有经济的高效率。其次，公平原则是经济效率发生、发展的精神支柱。我们知道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没有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就不可能形成高速发展的生产力，所以，注重劳动者的公平需求是构成精神激励的重要资源。

现实中公平与效率时常发生矛盾，乃至被称为经济学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奥肯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处理思路，他认为，如果平等和效率双方发生冲突时，就必须寻找它们之间的调和，“这时，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然而，作为更多地获得另一方的必要手段（或者是获得某些其他有价值的社会成果的可能性），无论哪一方的牺牲都必须是公正的。尤其是那些允许经济不平等的社会决策，必须是公正的，是促进经济效率的。”^②

^① 刘义安.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美国、瑞典模式的比较与借鉴[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47.

^② [美]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M].王奔洲，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106.

5.2 反贫困有市场机会吗？

在中国实施的是政府为主导的反贫困战略，所以人们常有两种误解：一种是反贫困追求的是公平取向，可以不考虑效率问题；二是反贫困是一种政府行为，推行的是公共政策，与市场机制无关。毫无疑问反贫困解决的是公平问题，但不等于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不顾及效率；同样，在中国政府是最重要的反贫困主体，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包办一切，排除市场机制。事实恰恰相反，政府为主导的反贫困行动如果脱离了市场机制，就失去了效率，达不到反贫困的公平目标。那么，市场能为反贫困带来什么呢？

首先市场经济可以为反贫困乃至社会公平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贫困通常都被视为收入低下、经济短缺的现象，所以，经济是反贫困的基础，哪一种经济运行方式能够带来效率，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那它就更可能为反贫困提供物质保障。一个效率底下的社会，相应的只能是低水平的公平状态，即使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消灭了阶级剥削和压迫，公平也并没有自行到来，仍然需要建立在高效率基础上的生产力作为物质保证。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自由竞争使提高效率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如此，中国经济转型后，重新走上市场经济之路也是如此。中国在短短的 30 余年，使一个经济快要处于崩溃边缘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使 2.5 亿人摆脱了贫困，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的两项奇迹。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创造的丰富的扶贫资源，要实现此成绩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市场经济有利于参与式扶贫的推进。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平等精神会使社会成员既形成一种自觉参与经济事务的强烈愿望和能力，又有一种对社会依赖感极强的期望。这样社会成员就会越来越重视社会问题，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进而为反贫困储备广泛的社会资源。西方流行的社会扶贫和世界银行推行的参与式扶贫的社会背景就源于此。

最后，市场经济会夯实公平理念的社会基础。我们知道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场经济是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只用等价交换来评判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不承认任何经济特权，真正体现了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马克思对此总结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流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

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①这样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会使公平的基本理念在民间被普遍认可和广泛接受，同时让人们培育出一种理解、同情和援助竞争失败者的社会心态，从而使反贫困具有深厚和广泛的社会基础。

市场虽然可以为反贫困提供物质基础，但单靠市场纠正不了“市场失灵”带来的贫富悬殊、分配失衡、失业、贫困、歧视和老年人的抚养等问题。奥肯在《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中用简单的两句话恰当地概括了市场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就是他反复提到两个主题：“市场需要一定的位置，而且市场需要一定的约束。”接着他对市场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他说：“它限制了官僚主义的权利，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自由不受国家的侵略。只要保证有一个合理的竞争程度，它就会可靠地对消费者和生产者输出的信号负责。它允许权力分散的管理，并鼓励实验和发明。最重要的是，市场上的奖励是为工作的积极性和生产贡献提供了动力。”^②所以，他为市场欢呼。但这种欢呼是理性和谨慎的，他既区别于要废除市场资本主义的激进派思想家，又区别于总是要扩大自由竞争的自由主义者，他仅仅把市场作为一个权力分散和有效力的系统。他大声疾呼：“金钱尺度这个暴君限制了我的热情，一有机会，它会扫尽其他一切价值，并建立起一个自动售货式的社会。”并坚定地指出：“金钱不能购买权利和权力，这必须有详尽的制度和法律来保护，并对低收入的人实行补偿性援助。一旦保护了这些权利，经济剥夺便结束了。”^③这是对市场极为客观和全面的评价。

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现实中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即靠“看不见的手”是靠不住的。由于不完全竞争的破坏、生产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完全等原因，必须有一只“看得见的手”来纠正市场的缺陷。萨米尔森在谈到市场与公平的关系时也指出：“市场并不必然能够带来公平的收入分配。市场经济可能会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④。这主要原因在于收入取决于一系列与因素，诸如教育、继承权、努力程度、要素价格和运气等，同时物

^① 夏文斌.公平、效率与当代社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66.

^② [美]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M].王奔洲，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140.

^③ [美]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M].王奔洲，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141.

^④ [美] 萨米尔森，若德豪斯.萨米尔森谈效率、公平与混合经济[M].萧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10.

品追随的是货币选票而不是最大满足，往往富人的猫所喝的牛奶，也许正是穷人维持健康所必需的东西。所以萨米尔森也坦言，即使是最有效率的市场体系，也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公平。因此尖锐地指出：“无管制竞争所带来的收入分配，就像丛林中的动物依靠暴力来捕获食物的达尔文式分配一样，充满着随意性。”^① 从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反贫困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它需要市场经济，但不能依靠市场。

5.3 效率与公平的中国践行

公平与效率既是一个贯彻人类社会始终的永久命题，又是一个与特定历史环境和任务紧密相关的时代主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公平与效率的追求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这一历程的逻辑选择是首先“公平优先”然后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更加注重公平”，它反映出整个中国建国后短短 60 年的价值观和发展观的变迁。

第一阶段“公平优先”的选择。一个社会不公平，将永远不得安宁，所以公平是一个国家和社会追求的最终目标。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使中国人对公平的追求和理解有着深刻和普遍的民众基础，乃至把它作为历次农民起义的口号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对公平的追求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乃至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点，或者说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来看待。另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是追求公平的典范，马克思主义者自然把追求公平作为己任。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公平成了压倒一切的社会目标，这种公平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享受同等的政治权利。

中国实施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平均主义成了这个时代所有一切社会特征的集中体现，视乎公平=平均，平均成了公平的代名词。尽管强调按劳分配原则，但在实践中“大锅饭”式的平均分配主导了所有劳动成果的分配。“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成了这种分配制度最明显的社会特征，1958 年~1976 年是这一思想最盛行的时期，它以三个特征风行一时：一是平均工资制。在全国实现八级工资制工资等级之间的差距极小，且这期间全国性的工资调整仅

^① [美] 萨米尔森，若德豪斯. 萨米尔森谈效率、公平与混合经济[M]. 萧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37.

有 2 次。二是半供给制。三是取消奖金和计件工资。这一时期客观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确立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的全新的社会制度，但由于把平均主义视为社会主义公平的本质特征，注重公平过了头，效率被搁置一边，长期忽视市场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乃至到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快要处于崩溃的边缘，于是不得不寻找另一种选择。

第二阶段“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选择。1978 年中国放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推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对中国的发展构想是：“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其实这是放松了对公平的追求，把效率摆在了优先的位置，从此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迎来了春天。而真正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中国确立走市场经济道路之后的事。1993 年中国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而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此决定中对收入分配正式提出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随后它几乎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它包括两层含义：首先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效率是第一位的，它要优先于公平；二是在注重效率的同时，要兼顾公平，当两者出现矛盾甚至对立的时候，应当保证前者而不是后者，甚至为了前者可以牺牲后者。这一选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有效地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建设，促进了生产力的大步发展，由此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到 2005 年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 GDP 排名情况，中国以 2.229 万亿美元的 GDP 总量，超过意大利和法国，并略微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同时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也显示了另外一个迹象，反映收入公平程度的基尼系数在这一时期显著提高：中国从 1978 年的基尼系数 0.16（当时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到 2000 年突破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 0.4，之后还在持续上升，2003 达到 0.458，2004 年 0.465，2005 年 0.47，2006 年已经达到 0.496^②。这个数据虽然尚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374。

^② 刘义安.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美国、瑞典模式的比较与借鉴[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49.

未达到 0.6 的国际公认的危险状态，但均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效率与公平的再度思考。

尽管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由于市场和非市场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于是追求公平的呼声再次变得越来越强烈。如何平衡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不夸张地说是中国未来前进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对效率要求太高，先富起来的人会更富甚至巨富，这样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拉大，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抑或造成社会动乱，最终颠覆了公平；如果对公平的要求太高，就会损失效率，造成经济倒退，甚至再次陷入整体贫困。

这段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每一个国家的发展前途如何其实是看它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同样也离不开这个平衡点的选择。

第三阶段“更加注重公平”的选择。过去我们总是认为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包括公平在内的其他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头 20 多年里，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政策选项是经济目标优先于社会目标，经济发展几乎成了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代名词，经济政策也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基本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一选择开始对中国社会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诸如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失衡，反映在城乡差别扩大、区域不平衡加剧、阶层差距拉大、行业差别扩展；环境污染严重；社会不公加剧等等。为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得失：效率是公平的基础，但效率并不创造公平，也并不必然带来公平。在这样的背景下，2005 年中国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中共十七大报告更加明确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至此公平观重新回归中国的政策中心。

从 1993 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 2005 年的“更加注重公平”，这毫无疑问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对效率与公平关系认识的一次升华，也将预示着继续推进的改革开放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将做出重大调整。这不是简单的走回头路，这种转变更多的是来自对中国现实情况的把握

和对现实中积累和发展着的社会矛盾的认识。“更加注重公平”体现出来的是实践对真理的再一次检验，它反映了从“硬”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并没有结束公平与效率的“被”交锋状态。那么效率与公平该如何抉择呢？未来之路是追求“公平与效率的并重”战略。换句话说，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其实只要我们再次回顾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对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关系的一种高度概括，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即社会主义有两个基本目标：一个是发展生产力，另一个是共同富裕，两个缺一不可，其实这本身就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两大目标：公平与效率。前者“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追求的是效率目标；后者“消灭剥削，消灭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追求的是公平目标。所以，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看，社会主义的本质包括两层含义：首先社会主义的发展既要追求效率，也要追求公平。其次，效率与公平应该相互依存、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效率与公平的必然归宿，邓小平对此有过一些经典的论断：“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②他曾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级分化。”^③在他看来，贫困不是社会主义，两级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建立在两个前提基础上的：一个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首先必须消灭贫困，其途径就是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在全社会讲究效率；另一个是要实现共同富裕，不能仅仅依靠福利制度，必须从根本上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这就是为了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所以中国的共同富裕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过程分化为前提的。这两个前提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也就是说，实现共同富裕的，就是中国整体追求效率与公平并重的过程。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3.

5.4 效率与公平的反贫困选择

在萨缪尔森提出的政府的四个主要职能中，前两个是“提高经济效率”和“减少经济不平等”，另外两个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经济”和“执行国际经济政策”^①。可以看出效率和公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府是何等的重要，可以不夸张地说就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在政府首当其冲的“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就要腾出手来“减少经济不平等”。所以，效率与公平从来就是一个政府行动的合适的经济目标。

反贫困本质上追求的是公平取向，但它并不排斥效率选项。如前所述，反贫困需要强大和持续的物质基础，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广泛参与，如果社会生产效率低下，那么反贫困可能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口号上。中国的反贫困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就是注重效率的结果。所以，在反贫困进程中公平和效率能够统一于一身的。贫困线是政府为社会设立的最后一道“安全网”。科学合理的贫困线可缓解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带来的不平等，抑制贫富分化加剧，促进社会公正。从微观操作层面上讲，贫困线的选择就最好地反映了效率与公平的抉择：如果过分注重效率，将贫困线定的太低，政府的扶贫投入资金过少，会使贫困人口失去发展乃至生存的机会，有失公平；如果过分注重公平，将贫困线定的过高，政府的扶贫投入过多，会使国家的负担加重，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最终背上扶贫和社会保障的沉重包袱，损失了效率。

那么如何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抉择呢？从理论上讲公平与效率的抉择有两类模式三种路径：第一种模式是优先论，要么“效率优先”，要么“公平优先”；第二种模式是兼顾（并重）论，即“效率与公平兼顾”。支持走“效率优先”之路者认为效率本事就意味着公平，凡有效率的东西必定也是公平的，效率决定着公平。因而一种体制一旦失去效率，一个社会就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那公平就无从谈起。在他们看来的物质基础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社会的支撑构架。只有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一个国家和社会才具备相应的社会经济资源，才能为社会的公正和反贫困的充分实现提供必要的方式和途径。喜欢走

^①（美）萨缪尔森，若德豪斯. 萨缪尔森谈效率、公平与混合经济[M]. 萧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133.

“公平优先”之路者认为公平决定效率，收入分配的不公会降低人们提高效率的积极性。因为公平和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目标，无论社会的发展，还是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这个基座，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均把公平作为普遍的价值追求。秉承“效率与公平兼顾”之路者认为公平与效率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两个政策目标，二者必须兼顾，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换取最大的公平，或者以最小的不公平去换取最大的效率。

从第三节分析可以看出，前两条路我们都走过。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效率优先”的30年，它使整个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也为反贫困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资源，同时取得两个世界奇迹：经济发展的奇迹和反贫困的奇迹，但如果继续过分强调效率优先，那整个中国的贫富差距将会越来越大，现有的反贫困成绩也将被淹没，新贫困现象将更为严重。如果处于贫困状态人口在数量上不断增加，社会就可能处于财富分配的动荡中，效率也就无从谈起了。

与此相对应的是建国以后的30年是奉行“公平优先”的30年，以追求全社会的公平为发展取向，人们在物质财富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从横向上与其他国家相比，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缓慢，错过了很多发展机遇，最终使整个国家陷入整体贫困状态，贫困依然没有被消除。如果继续过分强调“公平优先”，整个经济可能出现崩溃，从而才有了改革开放的30年。所以前两条路中国用自己的惨痛教训和曲折发展经历证明都是不可取的，即反贫困既不能实行“效率优先”也不能实行“公平优先”，那唯一正确的路只能是第三条路：“效率与公平兼顾”了。话虽如此，那么理论和现实的依据在哪里呢？下面我们来尝试作个分析。

首先从理论上讲，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制度，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调节这对矛盾，如何在既推进效率同时又在维护公平方面寻找到一个支撑点和平衡点。奥肯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努力，他的漏桶实验分析为收入分配和财政转移支付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但是直到最终奥肯还是没能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能为大家普遍遵循的均衡点。他只是在他最有影响的著作《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一书的结尾处建议到：

“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真正从数量分析上完成

这项工作的是现代混合经济的代言人萨缪尔森，他用“收入可能性曲线”进一步完善了奥肯的理论。

他的分析方法是这样：首先将人分成两个阵营——穷人和富人，并用 X 轴表示富人的实际收入，用 Y 轴表示穷人的实际收入，形成图 4-1。图中的 A 点表明在没有征税、也没有转移支付的再分配之前的收入情况，即国民产出最大化的点，E 点是穷人和富人收入完全均等的点。但遗憾的是，在自由放任的 A 点上，穷人的实际收入大大低于富人的收入，社会不会放任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于是人们将致力于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以增进公平达到 E 点。如果社会再分配能在避免效率损失的条件下进行，增进公平的路径将从 A 点移向 E 点，这样国民收入不会降低，AE 线的倾斜度是 -45° ，体现了从富人那里转移出的每一元钱正好使穷人的实际收入增加了一元。但事实上，大多数的再分配计划都对效率有影响。如果一个国家或社会过分地向富人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那么就会降低他们储蓄、投资和工作的热情，并最终导致国民总产出的减少。同样，如果社会为穷人提供的社会保障收入的下限高到一定的程度，穷人便失去了找工作的动力，或者干脆靠政府的保障过日子。再加上转移过程中管理成本的上升，这样再分配这个桶上出现了一个大漏洞。这一切使得代表实际收入边界的 AE 线向内弯曲变成曲线 ABZ。这是因为税收和转移支付扭曲和损失了效率，最终既伤害了穷人也伤害了富人。所以一个国家或社会必须决定要牺牲多少效率来换取更多的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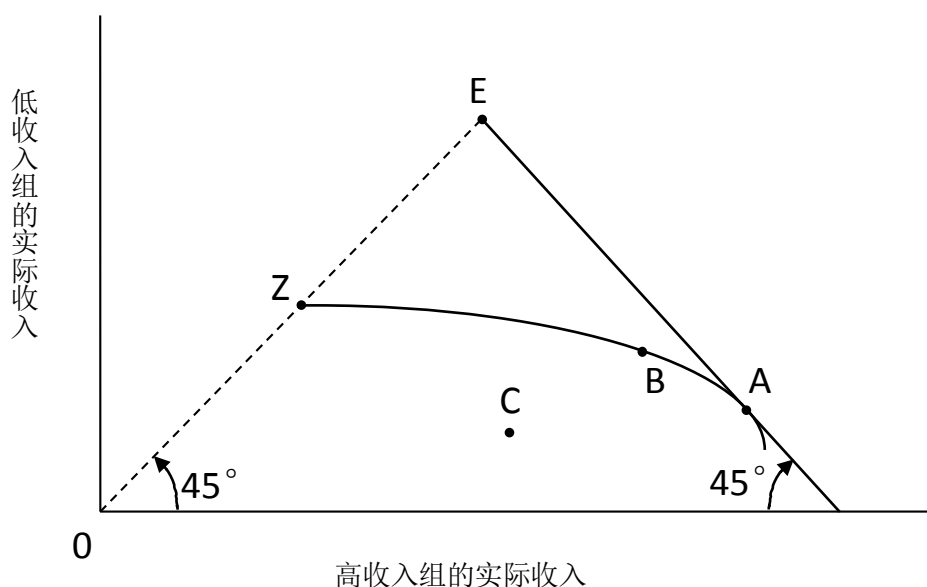


图 5-1 收入再分配会损失经济效率

A 点标志最有效的结果：国民产出最大化。如果社会能够在避免效率损失的前提下进行再分配，则经济将移向 E 点。因为再分配计划要引起扭曲和效率损失，再分配的路径可能是曲线 ABZ。社会必须决定要牺牲多少效率来换得较大的公平。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希望避免将经济从 B 点引向 C 点的非效率的再分配计划。

资料来源：（美）萨缪尔森，若德豪斯. 萨缪尔森谈效率、公平与混合经济. 萧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71.

再从实践上看，公平与效率是人类历史前进的永恒命题，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人类社会矢志不移地在这两者之间抉择，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公平和正义作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一直是维护人类社会群体的最重要的纽带。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总是以群体的形态来推动，社会、国家和组织是其主体形式。为此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无时无刻都不能停止社会生产和物质消费，因此，它必须讲究效率。以此同时，任何社会生产都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生产关系的框架内进行，因此它也必须讲公平。由此可见，公平与效率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也不是一种孰先孰后的关系。在某些条件下公平与效率之间虽然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但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只是一种暂时和表面的现象，它们之间的关系绝对不可能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也不是“零和博弈”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

从现实来看，这也不是天方夜谭，至今为止有两个国家的成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极为有力的佐证。其中美国通常被认为是特别关注效率的典范，而瑞典被认为是特别关注公平。有的学者通过比较和分析这两个国家的发展路径和经验后得出的结论是：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美国和瑞典之所以成功，不是他们只关注了其中之一，而是一直都兼顾了公平与效率^①。

^① 刘义安. 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美国、瑞典模式的比较与借鉴[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203.

具体来说，美国虽然被当作自由市场成功的典范，但纵观美国社会的发展历史，美国的发展并不支持自由主义的观点，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相比今天美国的收入差距相对要小得多，这个收入差距的缩小并不是其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然现象，而是强大的社会政策自觉调整的结果。追溯美国历史，从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到罗斯福新政，再到目前正在酝酿的医疗改革，社会公正始终是美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是美国社会各种政策的基本取向。再看瑞典模式，虽然在社会发展中公平一直是优先考虑的目标，但绝不能说福利制度国家瑞典就不讲效率。这一模式的创立者社会民主党在 2001 年通过的新党章中宣称：“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社会民主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方统治社会和经济之要求的抗衡力量。”^①事实也是如此，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在其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在保证瑞典人民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时候，也保证了资本的增值。充分发挥了资本和劳动者两个因素积极的作用，较好地协调了劳资之间的冲突，从而实现了公平与效率有机的完美的统一。所以说，瑞典模式不是先公平后效率，而是把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的典范，确实打破了“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这个咒语，被认为是最成功的社会发展模式。

综上所述，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虽然起点、路径以及政策选择等各有不同，但都在谋求进步、谋求发展。发展什么？怎样发展？都离不开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平衡点，否则就会在发展道路上走偏。从政策层面来看，反贫困虽然是以追求公平为主要政策目标，但同样不能排斥效率这个政策目标，否则就会失去反贫困所需要的物质和社会资源。贫困线的选择生动地反映了公平与效率的抉择过程，事实上二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最佳的选择是“效率与公平兼顾”，其关键点在于我们到底愿意以多少效率为代价去换取更多的公平。在这个政策目标基础上，具体一个国家和社会如何确定其贫困线还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要考虑不同的构成维度，这将是下一章探讨的主题。

^① 刘义安.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美国、瑞典模式的比较与借鉴[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52.

6 贫困线构成维度的选择

6.1 贫困维度=贫困线维度吗？

关于维度探讨主要聚焦于贫困维度的研究上，其意图是为了挖掘贫困形成的原因，分析贫困的本质。贫困是一种复杂和多维的现象，特别是近年来多维贫困理论的提出和对其维度的研究，进一步扩展了人们对此的共识。那么贫困维度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贫困线的构成维度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从现有研究成果中得出。

在现有文献中哈根纳斯（Hagenaars, 1987）可能是第一个关注贫困维度的经济学家，他从收入和闲暇两个维度构建了一个多维贫困指数，随着森（Sen）将能力贫困方法引入贫困分析中，使贫困研究成为一个十分火热的领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将多维度贫困度量由理论转化为实践，1990年首创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是一项开创性的测量方法，该方法超越了收入维度而考虑健康和教育方面，并在每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不断完善，1997年的《人类发展报告》首次提出用寿命、读写能力和生活水平三个指标构造的人类贫困指数（HPI），2010年推出了引人注目的专门测度贫困多维度的指标——多维贫困指数（MPI），从而使人类贫困度量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Alkire（2002a）在 Sen 所提出的功能与能力的基础上给出了 139 个人类发展的维度；Clark（2002）给出了 15 种维度。目前学术界通常参考的是 Nussbaum（2003）所界定的 10 个基本维度，包括身体健康、正常寿命、情感、感知、想象及思考、玩耍、控制个人环境等方面，如 Hulme 和 McKay（2008）^①就是这样。其他学者如 Chakravarty 和 Tsui 在构建基于公理方法的多维度贫困测度方法做了一些尝试，提出 Ch-M 指数和 F-M 指数；Deutsch 和 Silber 用 Ch-M 和 F-M 多维度贫困指数测算了以色列 1995 年的多维贫困状况；Chakravarty 和 Silber

^① 叶初升，王红霞. 多维贫困及其度量研究的最新进展：问题与方法[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0，8（6）:6.

同样用公理的方法将 Watts 的单维度贫困指数扩展为多维度贫困指数，并以各国的资料测算了 1993 年和 2002 年世界多维贫困问题^①。

作为学术研究机构对多维贫困研究最活跃是牛津大学的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自 2007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多维贫困度量的研究，现在已在两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是贫困缺失维度的研究，二是多维度的计算方法。他们提出了五个贫困缺失维度，即就业、主体性和赋权、人类安全、体面出门能力、以及心理与主观幸福感，这些维度的改善对于提高健康、教育和收入等发展维度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而且它们本身就是人类福祉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Alkire 和 Foster(2007)发表了一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计数和多维贫困的测量》，提出了计算多维贫困指数（MPI）的“Alkire—Foster 方法”，这一方法已经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采纳并使用于 2010 年以来的《人类发展报告》中。

在中国多维贫困的研究也成为近年来一个较热的关注点，但研究的成果形式还较为单一，除胡安钢（2008）将中国的多维贫困现象分为收入贫困、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生态贫困四种类型之外，多数的学者主要是介绍和使用这种方法分析中国的贫困程度。如尚卫平、姚智谋（2005），张建华、陈立中（2006），王小林、Alkire（2009），李佳路（2011），叶初升、王红霞（2011）等等。

所以，多维贫困已经不是一个从政治或者哲学尺度上是否应该纳入操作规范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操作的问题（Wagle, 2008）^③。然而多维贫困度量关于维度的选择和每个维度权数的确定一直是一个障碍，特别是这些维度是否可以列入各国的贫困线制定中至今还是一个受到忽视的问题。从上可以看出，多维贫困及其分析方法的初衷在于拓展人们对贫困的认识，贫困不仅仅是用货币尺度度量的，还有非货币化的众多维度，如，教育、医疗、自由、安全、能力、权利和社会交往等，目的在于找到诱发和导致贫困的原因，以便更准确地瞄准贫困人口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分类救助措施。很明显，大多数贫困维度不可能都成为贫困线的构成维度，但它们可以为分析贫困线的构成维度提供参考基础，特别是多维贫困的

^① 张建华. 贫困测度与政策评估——基于中国转型时期城镇贫困问题的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05.

^② [英]萨比娜·阿尔基尔. 贫困的缺失维度[M]. 刘民权，韩华为，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iii.

^③ 叶初升，王红霞. 多维贫困及其度量研究的最新进展：问题与方法[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0，8（6）：5.

思想和分析方法值得借鉴。因为贫困线关注的生活水准，即什么样的生活是穷人应该享有的。而多维贫困关注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贫困。

6.2 可接受的标准

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贫困线的制定进行了许多有益的理论探讨。然而，在实践中如何科学、合理地测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线，同时便于各项公共政策的衔接，既具有广泛的合法性又能成为反贫困的指针，却一直是困扰理论界与政府部门的难题。

本章的研究思路是抛开大多数学者热心的方法的探讨，转而对贫困线的构造维度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哪些维度是构成贫困线的基本要素，不至于我们在制定不同的贫困线是把它遗漏，从而为可比的贫困线在内容口径上达成一致。

具体的技术线路是从现在学术界的理论研究和反贫困实践的经验数据中选择多个不同维度，从中找出相关维度的代表性变量，并在这些具体维度之下确定相关指标。为了确定贫困线的相关维度，常见的做法是先确定一些可以接受的标准，从概念上明确所需要考虑的各个维度，然后再通过数据处理来甄别究竟哪些维度是必须的，最优的维度个数是多少。从理论讲，一般有三种方法选择维度。大家熟悉的是专家认定法。就是用已有文献在该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确定不同的贫困线维度。除此之外还有基于权利法和参与式选择法。所谓基于权利法就是根据一些国际上被广泛接受的标准来确定的贫困线维度，如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两个反贫困研究和指导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与世界银行的标准、亚州开发银行（ADB）和欧盟的标准、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等。另外的参与式选择法就是贫困人口直接参与到与贫困有关的项目和计划之中，由贫困人口自己来确定与其自身相关的贫困线维度。

在确定了表征贫困线的相关维度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通过处理实证数据得到最优的维度个数。那最优维度数如何得出呢？方法有：因素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结构方程模式和多指标多因子模式。其基本要求是：这些维度既能充分捕捉所有相关信息，又能避免共线性及重复计算的问题。尤其是当有许多维度而

这所有维度之间又有所重叠时，如教育水平与收入、收入与健康水平，这一问题更是突出^①。

本章维度的处理思路是综合使用以上这三种方法：以该领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为理论依据，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世界银行使用的贫困维度作参考，把我进行的田野调查的结果作为选择的重点依据，最后用夏普里（Shapley）方法来检验和优化出贫困线选择的维度和最优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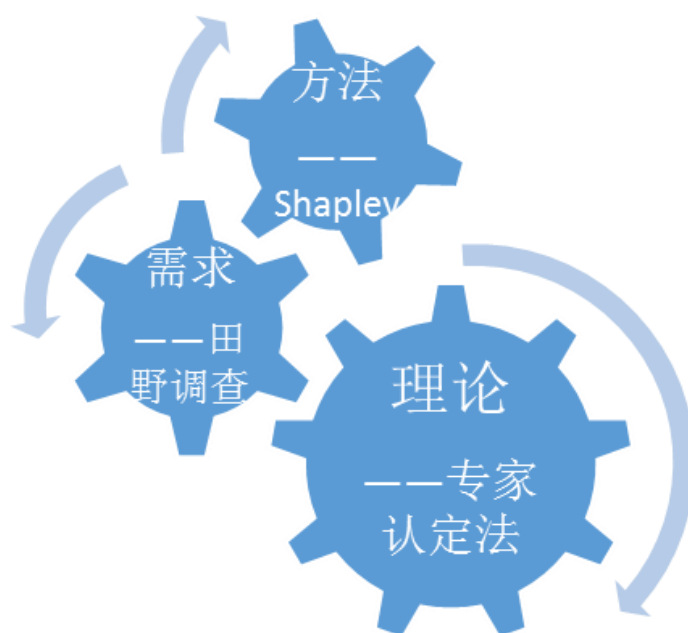


图 6-1 维度的来源

在这些技术路线都清楚之后，我们该转而讨论一下哪些是中国贫困线制定可接受的标准或叫纳入标准。即哪些是贫困线制定中不可忽略的因素，哪些因素左右着政策制定者对最终贫困线的高低选择，乃至不得不做出取舍。从相关理论和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来看，制定贫困线这几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社会认可的最低基本生活水平、地区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贫困人群的基本需求、国家的财政能力和反贫困战略目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国际贫困标准等

^① 叶初升，王红霞.多维贫困及其度研究的最新进展：问题与方法[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0，(11): 6.

6.2.1 社会认可的最低基本生活水平

这是制定贫困线的原点。贫困是一种比较劣势，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和社会性。这方面一些著名学者有些经典的阐述，斯坦·林恩（1985）指出贫困是通过人们如何生活表示的。在“如何生活”这个问题上，贫困有双重表象，即部分是个人的，部分是社会的。首先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生活在贫困中的人的问题。此外，这也是一个引起社会注意的问题，注意的结果是（在一个不是人人都贫穷的社会至少是）穷人被视为“与众不同”，他们多少受到其所在环境的影响。^①亚当·斯密早就说过：“至于生活必需品，我认识到不仅仅是对维持生存必不可少的日用品，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可能会对一个有荣誉感的人——即使他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提出要求，没有某种东西就是粗鄙的。例如，一件亚麻布衬衣严格说来并非生活必需品，在一个光荣的日子里，工人没有亚麻布衬衣就会羞于在公共场合露面。”^②

阿玛蒂亚·森也认为“贫困——更一般的来说也包括生活水准——‘在可行能力的空间中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但它在商品或特征的空间中却经常会具有一种相对的形式’。”^③什么是社会认可的最低基本生活水平，联合国提出的体面生活是一个具有普遍参照性的准则。从贫困的视角看，体面生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体面生存的需要、健康的需要、安全保障的需要、能力发展的需要和基本权利的需要。这些需要是每个人或者每个公民立足于社会，过上基本生活最起码的、普遍的、不可或缺或必须满足的需要。如果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对人的尊严造成伤害，处于匮乏的生活状态。所以，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都必须采取办法满足每个人过有尊严的体面生活的这些需要，而不至于他们被社会所遗忘。

^① 斯坦·林恩.走向贫困衡量尺度的第三阶段[M]//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外贫困研究文献译丛第一册.北京：改革出版社，1993：20.

^② 唐钧，王婴.我们往“菜篮子”里装什么[J].民政论坛，1995，(05):2.

^③ [印]阿玛蒂亚·森.生活水准[M].徐，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6.

6.2.2 地区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

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决定了这个地区的发展进程和水平，也表明了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更代表着下一轮经济起跑的起点。所以，发展的初始水平不一样，该地区的居民的生活水平也不一样。这样，我们在制定贫困线时必须考虑到这个历史和地域的差距，才能保证不同地域的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这就如同中国农村贫困线无论采取何种方法制定，近期是不可能和美国农村的贫困线一样，中国甘肃省的贫困线也不可能和上海市的拉平。同时，并尽量通过新的贫困线的制定来逐步缩小这种差距，以协调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另外，目前，中国各省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由地方政府制定，资金也主要来源于当地财政，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差很大。有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在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时，并非完全按照绝对贫困线计算方法（如市场菜篮子法和恩格尔系数法）来测定贫困线，而是根据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因而具有一定的地区相对性^①。因此，不得不把地方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纳入贫困线的制定视野。

6.2.3 贫困人群的基本需求

这是制定贫困线的关键，我们应改变以往制定贫困线过程中将贫困人群置于被救助的被动地位，缺乏参与制定自己最低生活标准的机会和话语权。英国的约瑟（Joseth）和萨姆逊（SumPtion）指出：“绝对的贫困标准意味着它是通过了解穷人的需要来确定的，而不是通过了解要使他们不贫困得花多少钱来确定。如果一个家庭已经揭不开锅，那么它就是贫困的”^②。其实，贫困人口最知道自己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自己最缺什么，最需要什么？只有倾听和尊重贫困人口的声音，让这种细微和低沉的声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贫困人群的整体需求，并被真切地纳入到贫困线的标准中，贫困线的适应性和贫困人群参与反贫困的动力才能得到保证。

^① 杨立雄.物价波动、收入增长和地区差距[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9, (11): 17.

^② 唐钧、王婴.我们往“菜篮子”里装什么[J].民政论坛, 1995, (05): 2.

6.2.4 国家的财政能力和反贫困战略目标

反贫困是对公平的投资，也是对贫困人群发展的投资。既然是投资就得要资源、资金、技术、人力等投入要素，国家的实力就成为考虑的变量，量入为出是一个基本原则。所以制定贫困线一定要考虑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承受能力和反贫困战略目标。如果扶贫标准定得过高，超出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则要么无法实现对贫困人口的全覆盖，达到反贫困确定的战略目标，要么为了确保扶贫目标实现而不得不牺牲国家的其他建设。如果扶贫标准定得过低，能够得到国家帮扶的人口比例就过小，就会把更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排除在国家发展进程之外，这实际上是储备了大量的贫困人口，也无法实现反贫困的战略目标，更加加剧了社会的不公。

6.2.5 物价水平

价格是变动最为频繁时间的函数，而且极易导致贫困线的实际购买力发生变化。若物价上涨，生活费用提高，则用货币表示的基本生活标准也就越高；反之，则降低。因此，世界各国为了不让贫困人群的实际生活水平降低。在制定初始贫困线之后，往往需要根据物价变动情况对其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调整。反映物价变动的指针通常用价格指数来表示，使用最多的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中国的农村贫困线从 1986 年制定第一条贫困线开始，就实行跟随物价的调准机制，应继续保持这种机制，才能让贫困人群分享发展的成果。

6.2.6 国际贫困标准

国际贫困线虽然至今为止没有哪一个国家把它作为自己国家的贫困线，但它无一例外地成了所有国家识别和判定贫困人口的参照点，也是联合国和其他多数国际组织统计和评价国别或地区贫困状况的重要指标。从世界趋势来看，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国家应该更加关注弱势群体或贫困群体，需要给他们更多的帮助，从而带动贫困线的提高。按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贫困标准，日均消费低于 1 美元属“绝对贫困”，世界银行确定的贫困标准则是每天生活费不足 1.25 美元，而我国目前的贫困标准，按购买力平价测算，相当于每天

0.89 美元，明显偏低^①。重视贫困群体、解决贫困问题是联合国千年目标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理当也应该将国际贫困线作为自身制定贫困线的最低参照。

由于社会认可的最低基本生活水平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前提的，生活水平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居民消费社会产品和劳务的程度，这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们普遍的消费水平分不开，所以可以放在经济发展维度和贫困人群的需求及物价水平维度中去探讨；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表明一定时期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总量及速度，就是经济发展维度的重要内容。这样以上归结的六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整合为五个重要维度或称五个主体构件（见图 6-2）。由此可以看出，制定国家或地区贫困线，是一项高度复杂、涉及面广的社会系统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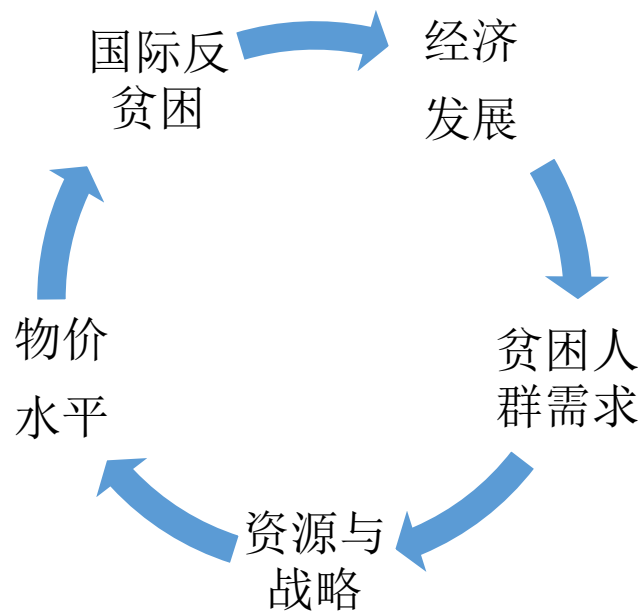


图 6-2 贫困线维度构架

资料来源：自己编制。

^① 吴国宝. 调整扶贫标准要考虑哪些因素[J]. 时事报告, 2011, (06): 45.

6.3 经济发展维度

6.3.1 维度的依据考量

Thomas Lines (2008) 在解释什么造成国家贫穷的原因时指出, “穷国与富国的差别在于他们生产什么, 这些东西的多样化的程度, 他们以什么样的价格销售, 并且经营和出口国外的是什么。穷国比富国的经济基础单一, 并且他的商品出口绝大部分依赖于初级产品——食品、农产品和矿物质。与此相反, 先进或发达国家却发展第二产业和门类众多的第三产业。这样他们就有大量的资本投资在未来有优势的经济领域。”^①产品和服务的总价值即为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所以, 常用 GDP 代表一国的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 并把促进经济增长视为减贫的重要手段。

贫困线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宏观经济稳定性能够促进益贫式增长已经得到普遍认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特征是: 一个国家的贫困线的高低, 与这个国家的人均 GDP 或平均生活水平密切相关, 且一般经济发达国家的贫困线要比发展中国家和穷国高得多。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或社会水平越高, 社会认同的可接受的最低体面生活水平中所包括的非物质产品和服务的份额就越多, 并在基本生活中占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课题组在分析 86 个有官方贫困线的国家的一般规律, 同样表明随着人均 GDP 的提高, 官方贫困标准在提高^②。

下表 6-1 所选择 2008 年 GDP 排位在世界 16 位之前的 7 个主要发达国家: 美国 (排 1 位)、加拿大 (9)、澳大利亚 (16)、日本 (2)、英国 (5)、法国 (6) 和德国 (4) 的贫困线也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从绝对数看, 日本的贫困线标准最高, 其次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法国和德国的水平较为接近, 美国和英国排后。其所占 GDP 的比重见表 6-2。

^① Thomas Lines. Making Poverty: a history. London ; New York : Zed Books ; New York : Distributed in the USA by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30.

^②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课题组. 世界各国贫困标准研究[EB/OL]. (2010-01-21)
<http://www.iprcc.org.cn/front/article/article.action?id=3877>.

表 6-1 2000—2004 年 7 个发达国家个人贫困线

国家 Country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美国	8 794 00	9 039 00	9 183 00	9 393 00	9 645 00
日本	18 680 29	16 349 89	15 568 94	16 796 81	18 250 45
德国	7 199 62	7 207 07	7 658 58	9 302 74	10 335 43
英国	8 140 88	8 222 67	9 109 69	10 423 67	12 256 74
法国	7 091 84	7 132 12	7 758 56	9 532 17	10 847 58
加拿大	13 480 78	13 825 53	12 097 33	14 526 05	14 907 73
澳大利亚	14 059 26	14 906 67	15 330 37	15 808 00	16 177 78

资料来源：田飞，张颖.我国供方贫困线的实证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2010，38(31):17842-17844.

从贫困线占人均 GDP 的比重看，情况发生了变化，从 2000~2004 间 7 个发达国家中比重最高的是澳大利亚，均在 50%以上；其次是加拿大和日本，均在 40%以上；美国、英国和法国同处一个档次，均在 30%以上；德国排末位，但也在 20%以上。从增长的趋势上看，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一直保持持续增长只有德国一个国家；英国和法国保持平稳发展，特别是法国几乎保持在 32%的均衡点上；美国有波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呈波动性下降，但仍享有发达国家的最高比例的殊荣。

表 6-2 7 个发达国家贫困线占人均 GDP 的比重 (%)

国家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美国	37.78	39.73	39.57	34.69	31.08
日本	54.36	46.57	43.24	44.88	46.03
德国	19.27	22.04	24.60	27.69	28.31
英国	33.21	33.82	34.39	34.37	34.32
法国	32.57	32.60	32.74	32.92	32.89
加拿大	58.42	60.25	49.36	49.10	44.95
澳大利亚	69.19	77.96	72.62	59.13	51.20

资料来源：根据田飞, 张颖. 我国供方贫困线的实证研究. 安徽农业科学, 2010, 38(31):17842-17844 一文整理。

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表 6-3.

表 6-3 中国农村贫困线占 GDP 的比重 (%)

时间	比重%	时间	比重%	时间	比重%
1984	28.8	1993	11.9	2002	6.7
1985	24.0	1994	10.9	2003	6.0
1986	22.1	1995	10.5	2004	5.4
1987	20.4	1996	10.2	2005	4.8
1988	17.3	1997	10.0	2006	4.0
1989	17.2	1998	9.3	2007	3.9
1990	18.2	1999	8.7	2008	5.0
1991	16.1	2000	8.0	2009	4.7
1992	13.7	2001	7.3	2010	7.7

资料来源：自己编制。

学者们一般认为，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减少贫困人口的基础。中国的扶贫回应了这一事实，1978-2007 年，中国人均 GDP 年均增长 8.1%，是全球 20 世纪以来人均 GDP 增长率最高、持续时间最长、惠及人口最多的时期，这相当于每 8.6 年人均 GDP 翻一番，相当于全球人均 GDP 增长率 1.5% 的 5.4 倍。其中，占总人口多数的农村人口的人均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率为 7.0%，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 7.1%，这相当于他们的人均收入每 9.7 年翻一番。这被看作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的重要原因^①。

而 1984 年—2007 年间更快，中国的人均 GDP 增加了 28.01 倍，年均增长 15.8%；同期中国农村贫困线仅增长 2.9 倍，年均增长 6.1%，怎么也跑不过人均 GDP 的增长速度。但农村贫困线占人均 GDP 的比重却从制定之初 28.8% 陡然下降到 2007 年的 3.9% 下降了 6.4 倍；如果从 1984—2010 年看，人均 GDP 增加了

^① 张全红. 中国农村扶贫资金投入与贫困减少的经验分析[J]. 经济评论 2010, (02): 42.

42.2 倍，年均增长 15.8%；同期中国农村贫困线仅增长 10.5 倍，年均增长 9.8%，还是跑不过人均 GDP 的增长。2008 年以后连续 3 年大幅提高贫困线的标准，才使贫困线占人均 GDP 的比重上升到 7.7%，即使如此也远远低于 7 个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德国 20%的比重，其他国家就更望尘莫及了。

经济发展和贫困的初始情况也是一个重要参数。有研究表明初始不平等程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初始不平等程度越大，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就越低，他们从经济增长中所的利益就越小 (Ravallion, 1997)。张全红和张建华 (2010) 做了验证：如果一个农村贫困人口的年收入是 180 美元，在 5%的年收入增长率下，脱贫时间是 23 年，当初始收入下降到 120 美元，降低了 33%，脱贫时间就会上升到 36 年，提高了 60%^①。

6.3.2 指标的选择

从上可以看出，国际上度量经济发展总量还是水平的常用指标是四个：GDP 总量、人均 GDP、人均收入和 GDP 增长率。

6.4 贫困人群需求维度

6.4.1 维度来源的考量

提到需求人们普遍联想到马斯诺的需求层次论，人有生理、安全、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这是人发展所遵循的路径，是作为一个人追求的发展目标。贫困人群是其所在国家和社会的底层阶级，很难按照这个目标前行，即使是金字塔底最底的目标，对他们来说都是很难触及的目标，如果用这个理论来分析穷人的需求，那可能将贫困人群的许多必不可少甚至是不可代替的需求被排除在外。那如何列举出贫困人群的基本需求呢？

首先，必须思考社会认可的最低基本生活水平如何标识，它是制定和调整扶贫标准的基础。无论采取何种度量贫困的方法，但就“什么是不可接受的生活水准”几乎都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必需品具有社会性。英国学者 Mack & Lansley 认

^① 张全红，张建华.中国农村贫困变动:1981-2005——基于不同贫困线标准和指数的对比分析[J].统计研究，2010，(02): 3。

为“物品只有在被社会认可为‘必需品’时才成为此”。在他们看来应该按照“社会认定的必需品的被动性缺乏”来定义贫困。他们在《贫穷的英国》中宣称缺乏其中的三项或三项以上的人就是贫困的,并在1983年为英国家庭开列了35项用品清单^①。

“最低基本生活水平”由“最低需求”或者说“人的基本需求”所决定,按照Sen的观点它是一种绝对内核,不会因民族、国家和地理等因素发生大的改变,它就如同不论什么肤色、民族和国度的人都需要阳光、水和食物一样。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及气候条件下组合不同而已。贫困人口的需求和消费也有一个共同的内核,Pan(2005a)提出了一个新的基本需求分析框架,能为我们打开这个共同的内核提供利器,他认为的满足基本需要的低碳发展概念包括四个层次:第一、基本需要的内容包括足够的食物、洁净的饮用水供应、用上电和其他现代能源、基础教育、医疗和基本卫生设施。满足基本需要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受到了国际制度保护,在面临自然约束和环境约束的情况下,必须把有限的资源优先用于保障每个人的基本需要。第二、基本需要的满足应该是有限的,这主要来自人的生物学属性决定的温饱住行的有限性和地球物理空间的有限性。第三、基本需要的界定存在个体和空间差异,随着技术、人口、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变化而变化。第四、人的欲望可以是无限的,奢侈和浪费必须加以有效遏制^②。

^① [美]克里斯托弗·贝里.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M].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14.

^② 潘家华,朱仙丽.人文发展的基本需要分析及其在国际气候制度设计中的应用——以中国能源与碳排放需要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06):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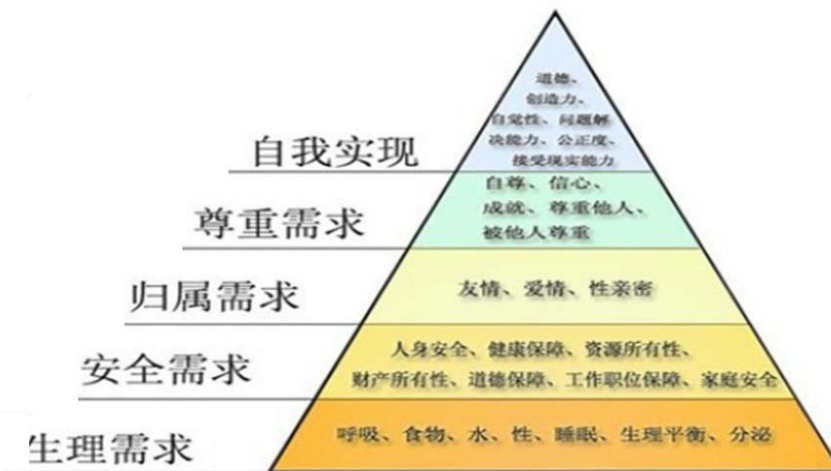


图 6-3 马斯诺的需求层次论 (Maslow' s Hierarchy of Needs)

基本需要是一个与奢侈、浪费性需要相对的概念，它是社会成员正常生活的基本条件，任何国家或地区满足其全部社会成员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是一项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重要政策目标，也是一项基本人权，写入了《世界人权宣言》中：“人人都有权利过上一种能够足以保证其本人和其家庭健康和安宁，包括食物、服装、住房、医疗服务和必要的社会服务……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些普遍人权原则要求各国政府即使在国力最困难的情况下，也必须优先确保人人都有足够的食物，所有的儿童都能接受教育，人人都能享受医疗保健、安全的供水和基本卫生条件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基本需要具有绝对的一面也有相对的一面，根据发展的阶段性和所面临的贫困状况，表现为两种水平的基本需要：一种是生存（subsistence）的基本需，另一种是体面生活（decent living）的基本需要。

将这些基本需求细化为可以操作和度量的目标，一直是大多数国际组织多年来的研究目标，联合国的开发计划署（UNDP）和世界银行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开发计划署（UNDP）从 1990 年用寿命、读写能力和生活水平三个维度构造出一个测度贫困的专业指标——人类贫困指数（HPI），2005 年又构造出了人文发展指数（HDI）来衡量各国在实现人文发展方面所取得的程度。人文发展指数包含三方面的内容：预期寿命、识字率和儿童入学率以及人均收入。并将各国发

展水平分成三类：高人文发展水平（HDI 大于等于 0.800）、中等人文发展水平和低人文发展水平。世界银行采用的贫困线标准是人均日消费 1 美元和人均日消费 2 美元。但是，人均日消费 1 美元或 2 美元，远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为了满足全世界最穷人的需求，2000 年 9 月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由 189 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千年宣言》中，设立了一系列以 2015 年为最后期限的目标指标。即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实现普及初等教育；促进男女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全球合作促进发展。这些目标和指标被置于全球议程的核心，统称为千年发展目标 (MDGs)^①。旨在将全球贫困水平在 2015 年之前降低一半（以 1990 年的水平为标准）的行动计划。这是一幅由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主要发展机构共同展现的蓝图。

一些经济学家对此的研究也有异曲同工之处。现代混合经济的代言人萨缪尔森在谈及哪些是一国政府减少经济不公平的具体领域时就指出：“大多数发达国家现在规定：儿童不应该因其父母的经济状况而忍受饥饿；穷人不应因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必要的医疗费用而死去；年轻人应该免费接受公共教育；老年人应有最低水平以上的收入安度余生。在美国，这些规定主要是通过转移支付计划去落实的，如食品券、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险。”^②

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这些基本需求项目的满足上表现为十分稀缺，有的项目带有普遍性特征，成为压倒性的需求，从而也成为致贫的重要因素。如教育和健康，它们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因素，被众多的文献所证明。有证据表明，难以应对健康冲击是使家庭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而且，有限的人力资本常常成为许多家庭无法利用经济增长所提供的机会来摆脱贫困的原因。很多实证的结果表明它们在中国的反贫困中的作用更为放大，有力的证据是樊胜根等 (2003) 利用中国分省的资料发现，政府在农村的公共投资中，每增加 1 万元农业科研、教育、道路、电话和电力投资能够脱贫的人数分别是 33、29、11、9 和 6 人，而政府贴息贷款的扶贫

^①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EB/OL]. [2013-03-11] <http://www.un.org/zh/millenniumgoals/bkgd.shtml>.

^② [美] 萨米尔森, 若德豪斯. 萨缪尔森谈效率、公平与混合经济[M]. 萧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133.

效果是上述各种政府投资当中最小的，每增加 1 万元扶贫贷款投资，只能脱贫 1 人^①。教育的脱贫效应分别是道路、电话和电力的 2.6、3.2 和 4.8 倍，仅次于农业研究。

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福祉水平的高低。罗楚亮（2010）根据 2007 年和 2008 年针对 9 个省(市)所做的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则陷入贫困的可能性相对会更低一些。两年都陷入贫困状态的可能性也随着户主受教育年限的上升而降低，贫困状态随着户主受教育年限而递减的趋势具有一致性（见表 6-4）。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对于家庭的贫困状况都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并且家庭不健康成员数量的增加将会增加陷入贫困状态的可能性。因为家庭中不健康成员数量会显著地增加贫困可能性，不健康成员的增加意味着家庭获取收入能力的下降^②。

表 6-4 户主教育程度与贫困状况 (%)

户主受教育年限	贫困标准= 1196 元/人年				贫困标准= 1799 元/人年			
	从未 贫困	仅 2007 年贫困	仅 2008 年贫困	两年 贫困	从未 贫困	仅 2007 年贫困	仅 2008 年贫困	两年 贫困
小于 3 年	93.80	2.78 [44.91]	2.32 [37.48]	1.09 [17.61]	86.51	4.60 [34.12]	5.74 [42.58]	3.14 [23.29]
3—6 年	94.46	2.66 [48.01]	2.53 [45.67]	0.35 [6.32]	86.26	5.66 [41.19]	4.98 [36.24]	3.10 [22.56]
6—9 年	95.83	2.05 [49.28]	1.70 [40.87]	0.41 [9.86]	88.66	5.18 [45.68]	3.90 [34.39]	2.26 [19.93]
9 年以上	96.67	1.33 [39.94]	1.86 [55.86]	0.14 [4.20]	91.96	3.61 [44.84]	2.44 [30.31]	2.00 [24.84]

资料来源:罗楚亮.农村贫困的动态变化[J].经济研究,2010,(5):130.

但遗憾的是近年来，这两项支出正在成为挤占其他需求的最大项目或压倒性的支出，也成为贫困脆弱性提高的首要原因。王小鲁的农户调查显示，教育和医疗支出占到了绝对贫困户纯收入的一半以上^③。动态来看，从 1988 年到 2003 年的 15 年间，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从 1.0% 上升至 8.3%，家庭卫生支出所占的比重从 1.6% 上升至 5.1%。对于收入最低的 10% 家庭来说，家庭顶算中教育和卫生所占比重的增加造成的负担尤其沉重^④。长期以往，由于贫困户收入的

① 张全红.中国农村扶贫资金投入与贫困减少的经验分析[J].经济评论,2010,(02):43.

② 罗楚亮.农村贫困的动态变化[J].经济研究,2010,(05):136.

③ 许建起.中国贫困线可能被低估[J].中国老区建设,2007,(11):8.

④ 詹姆斯·亚当斯,杜大伟,尼赫鲁,戴高,曹书.中国贫困状况评估(节选)[J].老区建设,2009,(11):12.

低下，在投入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会相对减少，从而陷入了循环贫困的怪圈。因此，在许多贫困地区，“不上学一世穷，上大学立即穷”的悖论和“吃不慌、穿不慌，一场大病全泡汤”的现象屡见不鲜。

乃至詹姆斯·亚当斯、杜大伟等在评价中国的贫困状况时得出结论：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人口生存状况的提高。他们说在中国，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如果一个家庭的成年劳动力曾经受过高中教育，这个家庭几乎不会陷入贫困。农村贫困人口 90%，以及城市弱势群体的 60% 所在的家庭几乎都没有实现这一教育目标。加大针对公民的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投入，是让剩余贫困人口脱贫的实质性关键。中国已基本实现了普遍的小学教育，但仍然需要注意降低高中教育的私人开销负担，尤其是对贫困家庭而言^①。

因此，教育和健康是无论从个人还是一个家庭都是一项长期投资，对个人和家庭的反贫困能力建设至关重要，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健康、教育等因素列入贫困线制定之中 (ADB, 1999)。但中国农村的贫困线制定过程一直未将其纳入。

好在中国政府提出的到 2020 年反贫困的总体目标是：稳步实现扶贫对象的不愁吃、不凑穿，保障其义务教育的、基本医疗和住房。这可算是中国政府对基本需求为贫困人口开出的清单，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综上所述，在现代社会里，无论是专家，或是公众、政府还是国际组织也不管会有多大的争论，但在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方面还是比较容易达成一致意见的。从中就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份最低基本生活水平（生存的基本需求）清单：食物、衣着、住房、健康、教育、医疗、社会保险。这些是贫困人群生存不可没有的。

6.4.2 指标的选择

国际上表示生活水平常用的 2 个指标是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常用的健康指标包括：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某些疾病的发病率；常用的营养指标包括身高、体重等；常用的教育指标包括：识字率、平均受教育年限；社会保险，常用指标：购买保险的数量、保险支出额。

^① 詹姆斯·亚当斯，杜大伟，尼赫鲁，戴高，曹书.中国贫困状况评估(节选)[J].老区建设，2009，（11）:12.

6.5 国家资源与战略维度

6.5.1 维度来源的考量

从前面贫困的定义和贫困线的划分可以看出，它们与与政府以及社会帮助穷人的能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贫困线作为一种社会救助政策，它的制定和组织实施者的主体是国家。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究竟是在何种水平上确定贫困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政治意愿和公共财政的承受能力。中国在反贫困中的国家意志和行为就更为明显。

中国的制度性质，决定了以政府为主导力量是解决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贫困问题的主要模式，用于扶贫的各种资源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长期以来，由政府组织系统充分发挥其组织与动员优势，对扶贫资源进行分配、管理和运作，主导和负责扶贫行动。具体表现为：首先，政府始终扮演着扶贫资金的来源的最主要角色。其次，以政府为核心主导运作扶贫类公共产品：中央政府负责和主导制定扶贫政策和制度；筹集和分配扶贫资源，进行贫困线的制定和扶贫地区的认定；地方政府具体负责扶贫资源的使用和管理，实施扶贫开发工作。再次，扶贫资源的决策、使用及控制的话语权在政府，政府影响和支配着财政扶贫资源的决策、管理和使用。实践证明，中国的扶贫政策与行动是富有成效的。所以，中国的农村贫困线的高低与国家掌控的扶贫资源和发展战略有高度的相关性。

中国政府对于贫困和贫困线的定义与政府的预算密切相关。自 1986 年实施以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并没有放松，所以，官方的制定的农村贫困线是非常严苛的，它仅仅能维持最低的生存需要，并 20 多年保持在一个低水平的状态，根据世界银行用 1985 年购买力平价的测算，大体在每人每天 0.6 美元左右，2008 年以后才做了大的调整，2011 年的 2300 元，按 2005 年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相当于 1.8 美元/天，接近发达国家的一天 2 美元标准，但这一步花了 25 年的时间。在地方有关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制定就更为突出了，它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方法测算的结果，而是一个政治决定的产物，具体来说是地方财政制约下的产物，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决定穷人的口袋子，以钱定标准。所以，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力是农村贫困线的最关键的约束条件。

制定和调整贫困线，需要把国家的财政承受能力和发展战略目标作为先决条件。如果贫困线定得过高，超出了国家的财政承受能力，虽然有可能快速接近反贫困目标，但会影响国家的其他建设；如果贫困线定得过低，就会把大量的贫困人口排除在国家的反贫困行动之外，同时也就制造了大量的潜在的贫困人口，增加了实现反贫困战略的风险和艰巨性，这对中国实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和谐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不利的。

财政收入收入是任何国家反贫困资金来源的主渠道，中国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这一路径依赖就更加明显了。从总量上看，中国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是可观的，平均每年的扶贫投入约为 230 亿元，而 2008 年实际投入额仅为 167 亿元；但遗憾的是从它占中央财政总收入、总支出的相对比重来看，最高的年份 2007 年也只不过 0.5%，实在是太低了（见表 6-5）。用 1%或 1.5%财政的支出保证中国人口 10%的生存是应该是非常值得的事情。

表 6-5 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与财政总收入、总支出的对比情况表（单位：亿元）

年份	中央财政扶贫资金		中央财政总收入			中央财政总支出		
	数额	增长率	数额	增长率	扶贫资金所占比率	数额	增长率	扶贫资金所占比率
2008	167.34%	16.1	33626	17.5%	0.49%	36334	22.8%	0.46%
2007	144%	166.81	28589.49	34.6%	0.50%	29557.49	25.8%	0.49%
2006	53.97%	11.69	21232.31	23%	0.255%	23482.26	15.9%	0.23%
2005	48.32%	5.32	17249.79	17.6%	0.28%	20249.41	13.4%	0.24%
2004	45.88%	15.95	15084.54	16.6%	0.30%	18274.39	13.3%	0.25%
2003	39.57%	10.65	12465	9.6%	0.32%	15663	8.3%	0.25%

资料来源：刘 娟. 贫困标准上调与扶贫开发思路调整[J]. 理论探索, 2010, (01) :90.

6.5.2 指标的选择

反映国家资源和财力的常用指标主要有：财政总收入、财政总支出、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支出。反映反贫困战略的常用指标主要有：扶贫资金投入、转移支付、贫困发生率和返贫率。

6.6 物价水平维度

6.6.1 维度来源的考量

贫困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评定它不一定总是用一些一成不变的标准和指标，因为生活标准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传统等多种因素。从而，每一个国家既制定自己的贫困线，又随着发展的进程和经济状况的变化不断的予以调整。

物价水平是人们生活中的敏感神经，它会使人们的名义工资和实际生活水平发生变化。从理论上讲，物价是时间的函数，过快的物价上涨不仅对宏观经济的均衡运行不利，而且对人民的生活水平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极易导致贫困线的实际购买力发生变化。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制定初始贫困线后，往往根据物价变动情况对其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调整，国际上常用的方法是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来加以调整。在较多的价格指数家族中，典型的物价指数主要有两种：物价总指数和特定物价指数。从部分国家的经验看，在实施反贫困项目时，除了不采用个体指数进行调整外，有的采用物价总指数(CPI)进行调整，有的采用分类指数进行调整。从物价指数种类看，大多数发达国家采用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如美国采用CPI-U），也有部分国家采用总物价指数。

贫困线调整的目的是为了反映物价变化对贫困人口生活的影响，或者说剔除价格因素对贫困度量的影响，那么能够有效剔除价格因素对贫困度量影响的方法就是较好的方法。一般来讲，物价的变化会在两个方面影响贫困线：一方面是产生收入效应，即物价提高使得贫困人群的真实收入下降，从而促使贫困发生率提高；另一方面是产生分配效应，物价提高会使得收入分配格局朝有利或不利于贫困人群的方向变化。

美国的处理方式通常是按照美国联邦制订的贫困线或与其挂钩的一定比值来确定，而联邦贫困线又根据消费物价的通胀指数每年作出调整。这就使这些项目的资助范围不会因通货膨胀的情况而出现大幅收缩。世界银行为了便于国际比较，专门构造了购买力平价指标，以测算各国的价格水平，对不同国家之间的消费水平进行比较，为此世界银行采用 1993 年购买力平价(PPP)资料。这些资料是根据国际

比较计划(ICP)的新价格而得出的，ICP 所覆盖的国家从 1985 年的 64 个增至目前的 110 个，而商品的种类更多^①，现使用的是 2005 年新调整购买力平价(PPP)。

中国的官方贫困线一直使用 CPI 进行调整，具体实施方案是:在 1985，1990，1994，1997 年家户调查基础上按马丁法估计出贫困线，其他各年按农村消费价格指数来调整。农村 CPI 指数是根据 6.8 万户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记帐资料确定的平均支出比重作为权数来计算的。但是，有的学者提出质疑（朱 晶、王军英（2010）；叶初升、罗连发、邹 欣（2011）），认为 CPI 反映的是全国农村代表性家庭消费组合的价格水平，而不能反映贫困家庭消费品的价格变化。总体代表性家庭代表的是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家户，对贫困家庭的代表性不强。

一些相关研究也证明，低收入人群和贫困家庭往往是受到物价变化影响最大的群体，特别是在总体物价水平是由食品类价格上涨带动的情况下，因为食品消费在贫困群体中的消费支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于，这样的物价上涨使贫困人口的生活成本比非贫困人口上涨幅度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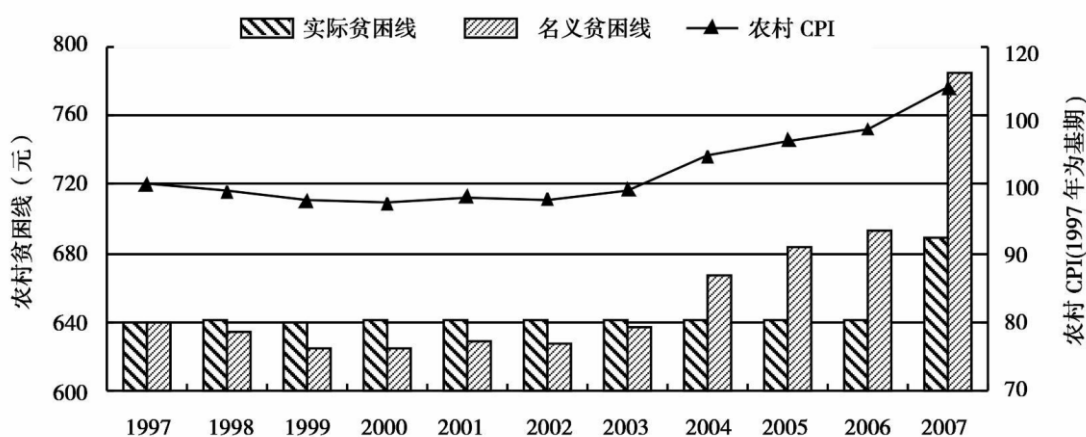


图 6-4 农村贫困线与农村 CPI

资料来源：朱晶，王军英.物价变化、贫困度量与我国农村贫困线调整方法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10，（03）:23.

^① 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编写组. 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5.

6.6.2 指标的选择

既然 CPI 不能准确反映贫困人口的消费价格，那如何办呢？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直接计算贫困人口的价格指数（Price Index for the Poor, PIP）作为价格变化的权重。二是将贫困对不同商品的价格弹性考虑进来可以计算出价格变化的分配效应。朱晶、王军英（2010）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农村贫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的农村贫困线，能够避免物价变化过程中结构性差异，以及贫困人口的消费结构与非贫困人口的差异产生的识别和度量偏差，是一种更加准确的贫困识别和度量方法，此方法如用于国家对贫困线重新测定年份之间阶段的年度贫困线划定的调整，可以更加确切地反映贫困人口受物价变化的真实影响，从而使贫困线的划定、贫困的识别和度量更为准确^①。本文赞同这种观点，并在该维度的指标选择中把中国农村贫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PIP）作为重要指标。

6.7 国际反贫困维度

6.7.1 维度来源的考量

贫困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不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独有的现象，借鉴和学习其他国家或国家组织的反贫困知识、经验、技术和治理形式是人类共同财富，也是人类迈向共同文明的需要。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加快，贫困变成既是国际性的问题，也是地区性的问题，也更加透明化，贫困人群同其他人群一样应该同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其次，中国是 2000 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191 个签约国之一，在 2015 年之前完成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等八项目标是中国中国的庄严承诺，这是政府职责和国家形象的需要。最后，贫困线的制定应该置于人类发展的大背景下的需要。贫困线不是简单几个数据的问题，它涉及人的尊严、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2010）对发展的基本目标的概括是“创造一个有利环境，以使人类享有长寿、健康、富有创造力的生活”。“发展的根本是人的优先发展”^②。促进包

^① 朱晶，王军英.物价变化、贫困度量与我国农村贫困线调整方法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2010，（03）:31.

^②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10 年人类发展报告“国家的真正财富：人类发展进程”
[EB/OL].<http://hdr.undp.org>. :1.

括贫困人群在内的人的发展应该成为一切发展战略和政策的中心，使促进人的优先发展成为所有制度设计的基石和归宿。

基于此，国际可比是制定贫困线的一个重要原则。中国农村贫困线与新近世界银行的几种贫困线对比有较大的差距。使得这种比较更有必要和现实意义，让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感叹与世界发展的差距。下表 5-6 是中国现行农村贫困线与三条国际贫困线（一天 1 美元、一天 1.25 美元和一天 2 美元）的比较。首先，用中国官方农村贫困线观察，十年间，农村贫困发生率（国际上称贫困人口比率）很低，保持在 4% 以下，到 2009 年还提高了 1 个百分点（当然，众所周知这是 2008 年大幅提高贫困线的缘故，否则一直在降低），对应的贫困人口却从 3412 人降低到 2688 人。若采用世界银行的过去衡量发展中国家的一天 1 美元的最低国际贫困线，则无论是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还是贫困人口总量整体显著提高，但下降的趋势也十分明显，前者从 1999 年的 34.62% 下降到 2009 年的 10.86%，使近 24% 的人脱贫，对应的贫困人口也从 2.8 亿降至 8 千万人，2 亿人丢掉了贫困的帽子。

若用世界银行 2008 年的最新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贫困线（一天 1.25 美元）来衡量，这两个指标同样提高，乃至 1999 年中国农村一半的人是贫困人口，但下降的趋势依然显著，前者从 1999 年的 50.92% 下降到 2009 年的 20.57%，让 30% 的人脱贫，对应的贫困人口从 1999 年的 3.48 亿人下降到 2009 年的 1.53 亿人，近 2 亿人摆脱了贫困；如果我们采用过去发达国家的国际贫困线（一天 1.25 美元）来观察，则这两个指标会显著提高，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到了惊人的地步，接近 80% 的人会是穷人，但让人惊奇的是，下降的趋势却更为显著，十年间前者从 79.55% 下降到 46.01%，会使 34% 的人脱贫，相应期间的贫困人口将从 6.48 亿陡然降至 3.43 亿，会有 3.08 亿人走出贫困的陷阱。所以，如果中国在国力允许的条件下采用接近或高于国际贫困线的标准制定新的农村贫困线，那中国的反贫困效果将更加明显，长期贫困将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表 6-6 中国农村贫困线的国际比较

	贫困发生率 (%)	贫困人口 (万人)
--	-----------	-----------

	1999	2002	2005	2008	2009	1999	2002	2005	2008	2009
中国 PL	3.7	3.0	2.5	4.2	3.8	3412	2820	2365	4007	2688
1\$/天	34.62	29.09	14.24	12.04	10.86	28225	23227	11065	9111	8096
1.25\$/	50.92	43.69	26, 11	22.27	20.57	41514	34855	20288	16786	15336
2\$/天	79.55	72.74	55.81	48.93	46.01	64855	58080	43365	36880	34304

资料来源：三条国际贫困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整理计算，使用的是 2005 年购买力平价数据和 PovcalNet 分析工具。中国贫困线数据来源于 2000 年至 2011 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6.7.2 指标的选择

综上所述，国际反贫困维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虽然，我们不可能将一天 1.25 美元和一天 2.5 美元的衡量不同发展水平的国际贫困线，直接纳为中国农村贫困线的分析变量，但发展中国家一天 1.25 美元和过去衡量发达国家的一天 2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可以作为重要的参照系，而一天 1.25 美元最穷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线应该是中国制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底线。

6.8 来自田野的选择

从现有文献来看，在贫困的维度选择上，基本是外生的，研究者主要是根据分析、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指标，却忽视了贫困主体的参与。基思·哈特（Keith Hart）曾言：“精致的度量要求各种连续性的变量根植于社会的组织中。”在这方面，Alkir（2007）作了探索性的工作，他将多个静态的核心维度和贫困主体的真实感受结合起来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指标的综合性和代表性。但是贫困涉及社会学的范畴，正如 Thorbecke（2008）认为的那样，贫困不是一个绝对而是相对的概念，除了将贫困主体的主观评价纳入外，还应该将所有人群对贫困的评价纳入到指标选择上^①。这为有效地选择贫困度量指标提供了一个方向。

^① 贫困线：叶初升，王红霞.多维贫困及其度研究的最新进展：问题与方法[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0，(11):9.

贫困既是一种客观状态，同时也是一种主观感受。不同地区的贫困居民具有不同的生活形态，贫困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其生活方式与消费行为不同于其它非贫困居民。一般而言，这种生活形态特征是可以被生活在他周围的普通居民所辨别的。这样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贫困县的农村贫困户、非贫困户和扶贫管理者三方访谈和调查的基础上，筛选出一套反映贫困县居民主观意愿的新贫困线制定的维度和指标体系。为了增强维度和指标选择中贫困主体的参与性，为此我专门设计两套调查问卷，一套用于非贫困者和扶贫管理部门，以反映与贫困户一起居住的非贫困户和反贫困组织和实施者的意愿；另一套用于反映贫困户的心声。

为了了解中国农村贫困线是否反映了贫困人群的合理需求，我们以“现使用的贫困线（人均 2300 元/年）是否反映了贫困者的最低需求”为问题对贫困户、非贫困户和扶贫管理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得到的结果出现惊人的一致性，甚至连排序都是一致的，只是各自的比重有所差异：认为没有反映贫困者最低需求的比重最高，在贫困者和亲身参与反贫困过程的扶贫管理者接近三分之二，非贫困户也达到 45.71%；而认为“是”的只有在非贫困户眼里超过三分之一，在贫困户和扶贫管理者眼里都为达到 30%；“不清楚”的在三个主体中都较少，所以，再次证明中国农村贫困线偏低是得到多方认可的，是一个铁的事实。

表 6-7 三个主体对现行贫困线的评价

	贫困户		非贫困户		扶贫管理者	
	户数	比重%	户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是	16	28.57	13	37.14	8	26.67
没有	37	66.07	16	45.71	19	63.33
不清楚	3	5.36	6	17.14	3	10.00

资料来源：根据自己调查资料编制。

在这项田野调查中，对贫困户的日常生活消费支出中，最大的五项支出的排序在三个群体中是有差异的：贫困户认为他们最大的开支并不是在食品支出上而是在医疗保健上，其次是教育，第三才是食品，随后的是其他支出和人情费；

在非贫困户的消费篮子里支出最大的项目是教育、其次是医疗保健，再次是居住，接下来的是家庭设备和食品；在扶贫管理者看来第一位的是食品，出人意料的是居住支出、家庭设备支出和教育支出三项的调查结果一致，同时排名第二，跟随其后的是医疗保健。这样我们将只要两个群体选择并进入前五位的支出项目整合在一起共5项，他们就是：医疗保健、教育、食品、居住、家庭设备，这些似乎就可以成为我们构建贫困线维度的重要依据。但有两个重要信息也非常值得关注：一是无论哪个群体医疗保健支出和教育支出都是前三位的选项，那在新的贫困线制定中他们应该成为不可忽视的要素，二是我们和扶贫管理者一样都习惯性地以为食品永远是贫困者难以跨越的第一道门槛，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真实开支中都不是压力最大的前两项支出，这在一直以绝对贫困理论为指导下的中国，特别是马丁法把食物贫困线作为制定贫困线的重点的习惯做法值得商榷，我认为应该将医疗保健和教育作为重点。

表 6-8 贫困农村日常生活支出排序

	排序		
	贫困户	非贫困户	扶贫管理者
食品支出	3	5	1
衣着支出	6	8	4
居住支出	7	3	2
家庭设备支出	9	4	2
通讯支出	10	7	9
交通支出	8	6	5
教育支出	2	1	2
医疗保健支出	1	2	3
社交（人情费）支出	5	11	7
娱乐支出	11	10	8
其他支出	4	9	6

资料来源：根据自己调查资料编制。

进而进一步探讨他们对贫困线应该纳入因素的看法，在对“若要制定新的农村贫困线应该将下列哪些因素纳入”的问题调查中，得到的结果是：贫困户依然认为收入水平还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健康和教育费用几乎处于同等重要的的位置，再次是消费水平，然后是资产和地区经济的初始水平。在非贫困户那里，优先考虑的是教育费用，其次是健康，然后是资产、消费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几乎处于同等重要程度。而在扶贫管理者眼中教育费用和社会保障程度应作为优先因素，其次是消费水平，然后是资产和健康状况。按照西方主观贫困线制定方法的通行做法，只要达到 50%就可作为纳入因素，那就有：收入水平、健康状况、教育费用支出、消费水平、资产状况和社会保障程度等 6 个因素。而西方普遍关注的性别因素，在非贫困者和扶贫管理者看来都不是很重要

表 6-9 贫困线纳入因素比较

	贫困户		非贫困户		扶贫管理者	
	户数	比重%	户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收入水平	52	92.86				
消费水平	42	75.00	7	20.00	12	40.00
资产状况	29	51.79	8	22.86	10	33.33
教育费用支出	45	80.36	21	60.00	15	50.00
健康状况	46	82.14	13	37.14	9	30.00
社会保障程度	15	26.79	7	20.00	15	50.00
性别因素	17	30.36	0	0	2	6.67
地区经济初始水平	22	39.28	11	31.43	4	13.33

*注：（1）收入水平无非贫困户和扶贫管理者的数据，是设计时为了与贫困户对比和观察收入指标的反映，特地将此项排除在外之外。

（2）比重为该项占收回有效问卷的百分比，因为多项选择，故比重之和不为 100%。

资料来源：根据自己调查资料编制。

转而我们看看指标的选择在这三个群体那里又是如何表现的。在对“主要用以下哪些指标来测量农村贫困”的回答，三者也是有所差异。非贫困户和扶贫管

理者的看法顺序一致，差别只在比重的大小上：首选的是人均纯收入指标，然后是总量指标家庭总收入，其次是平均指标人均消费支出，对其他指标关注度不高。但超过 50%的指标只有一个“人均纯收入”

表 6-10 贫困线衡量指标的选择

	非贫困者		扶贫管理者	
	户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家庭总收入	14	40.00	11	36.67
人均纯收入	23	65.71	24	80.00
人均消费支出	10	28.57	7	23.33
其他指标	1	2.86	0	0

*注：资料来源同表 6-9。

为了更好地和这两者对比，同时也是为了观察贫困户最希望用哪一个具体的指标来简单度量贫困线，所以我们在问题和指标的设计上作了小的修改，问题变为“您认为哪一个数据，最能反映农户的贫困状况？”，指标全部调整为平均水平的四个指标，并新增了教育和资产类指标，得到的结果是：第一选择是人均纯收入指标，其次是人均消费指标，然后同等重要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拥有的财产指标，并全部选择均超过 50%。所以，未来的贫困线制定在继续使用受欢迎程度最高的人均纯收入指标的同时，不应该将符合西方纳入原则的另外三个指标排除在外，那就是人均消费、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拥有的财产。

表 6-11 贫困户认为最能反映贫困状况的指标

	户数	比重%
人均纯收入	45	80.36
人均消费	35	62.50
人均受教育年限	30	53.57
人均拥有的财产	30	53.57

*注：资料来源同表 6-9。

综上所述，本章通过学术界、实践界和田野调查两个层面分析和筛选可以获得表 6-12 中的维度和指标。

表 6-12 维度和指标的小结

维度	理论	田野调查
经济发展	GDP 总量、人均 GDP、人均收入和 GDP 增长率。	人均 GDP
社会认可生活标准	人均收入 人均消费	人均纯收入 人均消费 人均拥有的财产
贫困人群需求 (侧重教育、健康和医疗保障 3 个层面)	识字率、平均受教育年限	平均受教育年限
	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某些疾病的发病率	预期寿命 重大疾病发生率
	购买保险的数量、保险支出额	医疗保健支出 新农合参与率
国家资源和战略	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扶贫资金投入、转移支付、贫困发生率和返贫率。	人均财政收入 转移支付 贫困发生率
物价水平	物价总指数、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贫困人口的价格指数 (PIP)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资料来源：自己编制。

7 维度和指标的 Shapley 优选与实证

上面我们将贫困线的维度和支撑指标从理论和贫困人群需求两个角度作了分析，并初步选择出个 5 个维度和常用的指标，这代表了专家、国际组织和贫困人群的意愿，这种选择是否合理，需要做实证分析，用结果来说话。同时，为了验证将上一章中将社会认可人的最低生活水平维度的指标并入经济发展维度和贫困人群需求是否正确，在本章的实证分析中仍还原为 6 个维度，最后让实证的结果来选择。

7.1 Shapley 方法的原理

Shapley 方法是 1953 年 Shapley 提出的为了解决多人合作博弈问题的一种利益分配方案。Shapley 在处理联盟中利益分配或者成本分担的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合作博弈解的新概念，学术界将其称之为 Shapley 值。它是指所有顺序都被平等的考虑进去的前提下，合作博弈中每个参与者收益的数学表达式。之后它被大量运用于成本分配模型中，是因为它较好地满足了有效性、不变性和可加性三大公理。

(1) 不变性(对称性)。不变性是指每个联盟成员获得的收益与他的身份、地位、顺序无关，只与他对联盟的贡献有关，即对任意交换联盟成员的位置不影响他的分配。(2) 可加性。相当于 n 个人同时独立进行两个博弈，而每个联盟的收益刚好等于两个博弈分别进行时的收益之和，简言之就是联盟收益全部分配给参与者，没有剩余。(3) 效率公理(有效性)。有效性是指如果成员对其任意加入的联盟都没有贡献，则他的分配应为 0，也就是说没有贡献者不能参与分配，如果对联盟有贡献，则他就会要求应有自己的收益，简言之就是没有无关人员参与，这是联盟利益分配的前提。

它的基本思想是：任何一个指标是由 n 个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剔除任一影响因素都会对该指标的变化产生一个边际效应，则该因素按任何顺序被剔除所产生的边际效应的均值便是它对这一指标的贡献率，所有 n 个影响因素的贡献率之和即构成了整个指标的变动。

根据这一思想 Shapley 建立了一个分析模型为：

$$\varphi = \sum_{S \subseteq N} w[v - v(-1)] \quad (1)$$

式中， S 表示有 i 个参与者的联盟，即由 i 个人缔结的共享协议； V 表示所有参与人效用的加总值。 $V(-1)$ 表示除参与人 i 后剩余的人的效用值之和； W 为权重，权重之和为 1，可以用计算公式获得：

$$w = \frac{(s-1)!(n-s)!}{n!} \quad (2)$$

在具体因素分解时，为了观察某一个变量的影响，通常把其他变量视为常量。

之所以选择 Shapley 方法来进行贫困线维度分析，是因为贫困线本质上是一个收入再分配问题，它可以视为贫困人口的收入来源之一。参与分配者很好地满足了以上三个公理，即更好地体现了无关者不得享受贫困线的保障，参与分配的人与他的地位、身份和地理位置等因素无关，所有分配只为贫困群体享受。同时它对分解有两个主要的优点：第一无残差。意味着分配给了每个解释变量的影响之和等于被分解变量的观察到的变化，不需要做任何假设或者努力去分配残差，分解过程是完美的。第二，Shapley 分解是对称的(匿名的)：各种因素以公平的方式对待，没有做任何进一步的假设。

使用 Shapley 方法的一般步骤是，首先拟合一个收入决定方程，找出影响收入的显著变量，其次，对收入决定方程中通过检验的变量进行 Shapley 分解，并计算各个显著变量对不平等的贡献率。

7.2 模型变量的选取

变量的选择跟谁维度走，同时兼顾指标选择的两大重要原则：可加性和可得性。根据前面的分析每个维度都会有 1 至 4 个指标，为了减少计算量和数据的方便获取，侧重考虑了贫困人群的意愿和国际习惯，具体的指标（解释变量）选择是这样的（表 7-1）。

表 7-1 贫困线维度和指标初选

维度	学术界和实践界	田野调查	初选指标	变量符号

经济发展	GDP 总量、人均 GDP、人均收入和 GDP 增长率。	人均 GDP	人均 GDP	X ₁
社会认可生活标准	人均收入	人均纯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	X ₂
	人均消费	人均消费 人均拥有的财产	农民人均消费支出	X ₃
贫困人群需求 (侧重教育、健康和医疗保健)	识字率、平均受教育年限	平均受教育年限 家庭教育支出	平均受教育年限	X ₄
	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某些疾病的发病率	健康人数 医疗费用支出	预期寿命	X ₅
	购买保险的数量、保险支出额	医疗保健支出 新农合参与率。	医疗保健支出	X ₆
国家资源和战略	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扶贫资金投入、转移支付、贫困发生率和返贫率。	人均财政收入	人均财政收入	X ₇
		转移支付	人均财政支出	X ₈
		贫困发生率	转移支付	X ₉
			贫困发生率	X ₁₀
物价水平	物价总指数、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贫困人口的价格指数 (PIP)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X ₁₁

资料来源：自己编制。

经济发展维度按国际惯例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指标人均 GDP。社会认可生活标准维度用人均收入和消费指标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只是在田野调查中贫困人群认为人均拥有的财产指标也应该考虑，但资产和财产指标在中国农村数据中很难有时间数列数据，所以，还是使用农村最为关注的两个指标：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农

民人均消费支出。贫困人群需求维度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维度，也是与穷人关联度最高的维度，资产虽然贫困人群认为应该纳入的比例超过了 50%，但它人没有像对教育、健康和医疗保健 3 个层面的排序高，同时数据不易获得，所以侧重考察这 3 个子项；在指标的选择上以国际通行指标为优先因素，分别选择了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寿命和医疗保健支出。国家资源和战略维度可供选择的指标也较多，经过比较学术界与田野调查的结果，初选了分别反映国家财力、对不发达地区的投入和贫困程度的 4 个指标：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支出、转移支付和贫困发生率。物价水平维度近年学术界普遍认同应该用与穷人生活息息相关的贫困人口的价格指数（PIP），我也支持这种观点，但我查遍中国官方年鉴和从 2000 年起发布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还是没有找到 PIP，无奈只能还是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指标来分析。这样一共 6 个维度 11 项指标（变量）。

7.3 数据来源与清洁

7.3.1 数据的来源

根据直接参与中国农村贫困线的制定者王萍萍（2006）的文献记载，中国农村贫困线的制定工作开始于 1984 年，并使用和参考了 1984 年 6.7 万户的抽样调查的数据。所以本文实证的时间段选择为 1984~2010 年 27 年的时间，数据来源于这期间中国统计局、教育部和权威网站历年公布的时间序列数据，采集于中国官方统计出版物和网站，详见表 7-2。原始数据太多，就不再列出。数据符合平行数据的定义和原始性。

表 7-2 数据的来源渠道

变量	含义	符号	来源渠道
被解释变量	贫困线	Y	2000-2012 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7-2011 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发展报告 2012。
解释变量	人均 GDP	x_1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农民人均纯收入	x_2	1990-2011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x_3	2000、2010、2011 中国统计年鉴。
平均受教育年限	x_4	2010 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2011 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预期寿命	x_5	中国统计局数据库国际数据
医疗保健支出	x_6	2011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人均财政收入	x_7	1990、2000、2010、2011 年中国统
人均财政支出	x_8	计年鉴
转移支付	x_9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贫困发生率	x_{10}	2007-2011 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CPI	x_{11}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 2008）和 2011 中国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自己编制。

7.3.2 缺失数据的处理

实证中必须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采用内插法和外推法补齐了缺失的数据，具体为：

1. 平均预期寿命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库国际数据计算出 1984-1997 年的数据，其中 1990 年为入口普查数据。

2. 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根据 2010 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和 1985、2011 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数计算出来的。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推荐的方法。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公式为：

$$\mu = AYS = \sum_{i=1}^n p_i y_i \quad (3)$$

AYS 和 μ 表示平均受教育年限， p_i 表示各教育层次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y_i 表示各种受教育程度的年限。在本文中定义文盲、半文盲为 0.5 年，小学为 6 年，初中为 9 年，高中和中专 12 年，大专以上（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为 16 年。这样得出 1984-2010 年平均受教育年限（见表 7-3）

表 7-3 1984-2010 年中国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

单位：年

时间	受教育年限	时间	受教育年限	时间	受教育年限
1984	5.6308	1993	6.8345	2002	7.835
1985	5.7505	1994	6.9275	2003	7.861
1986	5.8645	1995	7.0565	2004	7.9175
1987	5.955	1996	7.298	2005	8.0645
1988	5.99	1997	7.4035	2006	8.125
1989	6.153	1998	7.516	2007	8.1845
1990	6.3055	1999	7.6	2008	8.2645
1991	6.6225	2000	7.7135	2009	8.3425
1992	6.709	2001	7.7785	2010	8.39785

资料来源：自己编制。

7.3.3 数据的清洁

一、变量的统计描述

这样初选出的 11 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贫困线为被解释变量来探讨他们之间的数量关系。首先来分析各变量的离散程度

表 7-4 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含义	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贫困线	Y	597.33	1.79	200	2300
解释变量	人均 GDP	X1	8804.39	8279.02	857.80	30015.10
	农民人均纯收入	X2	2147.20	1559.42	397.60	5919.00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X3	1673.46	1165.99	317.40	4381.80
	平均受教育年限	X4	7.25	0.85	5.80	8.40
	预期寿命	X5	71.09	2.42	67.50	74.80
	医疗保健支出	X6	94.11	91.46	7.70	326.00

	人均财政收入	X7	1496.69	1705.52	189.40	6197.40
	人均财政支出	X8	1608.65	1812.26	189.30	6702.50
	转移支付	X9	237.32	395.02	10.80	1342.30
	贫困发生率	X10	6.60	4.22	1.60	15.50
	农村 CPI	X11	106.01	6.79	98.50	123.40

资料来源：自己编制。

标准差较大的是反映中国生产、生活和公民收入与支出的指标，如人均 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支出、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等，正好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实力和公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在反映教育、健康和医疗保障的 3 个指标中，医疗保健支出的标准差较大，说明医疗费用支出已经变成中国农村的重要消费支出，增长的势头较快。27 年间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寿命都显著改善，分别达到 7.25 年和 71.09 岁。用于改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转移支付也有显著增长，平均每年达到 237.32 亿元。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变化也较为明显，平均每年上涨 6.01%。贫困发生率更是陡然下降，平均每年降低 6.6%。被解释变量贫困线的标准差较小，只有 1.79，说明贫困线在 27 年间调整的幅度较小。

二、变量的清洁

变量的清洁采用 ADF 单位根检验法，对 12 个数据的平稳性进行了检验，以避免谬误回归的出现。

表 7-5 变量的 ADF 检验

变量		水平值			一阶差分值			二阶差分值		
		nc	c	ct	nc	c	ct	nc	c	ct
LnY	ADF	1.3181	0.4103	- 2.2142	- 0.2550	- 1.0611	- 1.1483	- 8.0225	- 7.9133	- 7.8700
	P 值	0.9478	0.9789	0.4602	0.5832	0.7129	0.8976	0.0000	0.0000	0.0000
X ₁	ADF	3.4724	3.1634	2.3548	2.1428	1.2445	- 1.6701	0.2518	- 0.3830	- 1.0484

	P 值	0.9995	1.0000	1.0000	0.9891	0.9971	0.7283	0.7478	0.8928	0.9101
X ₂	ADF	7.3422	4.0577	1.0416	0.6412	-	-	-	-	-
	P 值	1.0000	1.0000	0.9998	0.8472	0.6963	0.0509	0.0000	0.0002	0.0010
X ₃	ADF	2.4452	1.7439	0.9518	-	-	-	-	-	-
	P 值	0.9948	0.9994	0.9325	0.6271	0.7024	0.3870	0.0003	0.0048	0.0231
X ₄	ADF	-0.152	-3.854	-	-0.778	-	-	-	-	-
	P 值	0.6186	0.0091	0.6706	0.3666	0.8828	0.0002	0.0000	0.0004	0.0017
X ₅	ADF	1.6462	-0.878	-3.008	-0.569	-1.821	-1.604	-10.40	-10.17	-10.14
	P 值	0.9715	0.7764	0.1514	0.4596	0.3610	0.7579	0.0000	0.0000	0.0000
X ₆	ADF	4.8366	9.2765	3.3318	3.1966	1.9707	-	-	-	-4.637
	P 值	1.0000	1.0000	1.0000	0.9990	0.9996	0.8241	0.3321	0.5380	0.0076
X ₇	ADF	1.6965	5.4129	3.9620	4.3171	3.5205	2.1262	1.6327	0.6813	-0.548
	P 值	0.9737	1.0000	1.0000	0.9999	1.0000	1.0000	0.9696	0.9879	0.9679
X ₈	ADF	5.1257	5.9183	4.6698	2.7155	1.8308	0.0295	-2.169	-2.808	-3.812
	P 值	1.0000	1.0000	1.0000	0.9968	0.9994	0.9936	0.0321	0.0750	0.0376
X ₉	ADF	0.9359	8.7138	9.8567	4.3335	4.0520	2.9434	1.4022	0.8439	-4.377
	P 值	0.9002	1.0000	1.0000	0.9999	1.0000	1.0000	0.9536	0.9918	0.0127
X ₁₀	ADF	-4.662	-3.362	0.2544	-1.845	-6.218	-	-3.687	-3.657	-3.454
	P 值	0.0001	0.0230	0.9968	0.0630	0.0000	0.0003	0.0008	0.0133	0.0710
X ₁₁	ADF	-0.712	-3.246	-4.161	-5.146	-5.020	-4.887			
	P 值	0.3960	0.0295	0.0164	0.0000	0.0005	0.0037			

*注: nc、c、ct, 分别表示无常数项、有常数项、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

从上表可知， X_6 、 X_7 和 X_9 三个变量都是二阶单整的非平稳数据，故排除。 X_1 虽是二阶单整的非平稳变量，但是因衡量经济发展维度的指标只有人均GDP，故留下。其余数据都是非平稳的，所以可以进行回归分析而不用担心谬误回归了。

7.3.4 分析工具

用 Eviews 软件处理数据。

7.4 模型的建立

通过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的结果，并结合散点图的情况，贫困线 Y 比较适合拟合半对数模型：

$$\ln Y = \alpha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beta_3 X_3 + \beta_4 X_4 + \beta_5 X_5 + \beta_8 X_8 + \beta_{10} X_{10} + \beta_{11} X_{11} + \mu \quad (4)$$

α 、 β_1 、 β_2 、 β_3 、 β_4 、 β_5 、 β_8 、 β_{10} 和 β_{11} 为待定系数，通过回归可求得。 μ 为残差。

7.5 实证分析

为了提高拟合模型的精度，需进一步做统计检验。将上述数据带入方程(4)进行回归，得到表 7-6 的检验结果。

表 7-6 8 个变量统计检验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21.10944	4.305527	4.902869	0.0001
X1	-4.28E-05	6.65E-05	-0.644112	0.5281
X2	0.000390	0.000225	1.733359	0.1011
X3	-0.000277	0.000374	-0.740998	0.4688
X4	1.069797	0.233315	4.585200	0.0003
X5	-0.334000	0.068014	-4.910776	0.0001
X8	0.000291	0.000155	1.870578	0.0787
X10	-0.021266	0.024208	-0.878474	0.3919
X11	0.007477	0.003953	1.891517	0.0757

R-squared	0.981752	Mean dependent var	6.242308
Adjusted R-squared	0.973164	S.D. dependent var	0.583899
S.E. of regression	0.095653	Akaike info criterion	-1.588765
Sum squared resid	0.155540	Schwarz criterion	-1.153270
Log likelihood	29.65394	F-statistic	114.3233
Durbin-Watson stat	1.633607	Prob(F-statistic)	0.000000

从上表可以看出， R^2 达到 0.9818，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但变量 X_3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X_{10} （贫困发生率）统计检验不明显，所以将其剔除。这样初步选择可纳入模型的解释变量为 6 个：人均 GDP (X_1)、农民人均纯收入 (X_2)、平均受教育年限 (X_4)、预期寿命 (X_5)、人均财政支出 (X_8)、农村 CPI (X_{11})，那贫困线方程为：

$$\ln Y = \alpha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beta_4 X_4 + \beta_5 X_5 + \beta_8 X_8 + \beta_{11} X_{11} + \mu \quad (5)$$

通过回归得到方程中的各个待定系数，这样贫困线的回归方程为：

$$\ln Y = 18.3902 - 0.000086X_1 + 0.000338X_2 + 1.112118X_4 - 0.303759X_5 + 0.000341X_8 + 0.008180X_{11} \quad (6)$$

方程 (6) 表明，人均 GDP 每增加 1 元，贫困线就要下降 0.000086 个单位；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 1 元，贫困线就要增加 0.000338 个单位；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贫困线就要增加 1.112118 个单位；预期寿命每增长 1 岁，贫困线则下降 0.303759 个单位；人均财政支出每增长 1 元，贫困线就要增加 0.000341 个单位；农村 CPI 每上涨 1 个百分点，贫困线就要增加 0.008180 个单位。

取反对数得出贫困线为：

$$Y = 96997910.9851 * 0.999914^{X_1} * 1.00038^{X_2} * 314.3^{X_4} * 0.738039^{X_5} * 1.000341^{X_8} * 1.008214^{X_{11}} \quad (7)$$

由此可以看出影响贫困线因素，从大到小排序为：平均受教育年限 (X_4) → 预期寿命 (X_5) → 农村 CPI (X_{11}) → 人均财政支出 (X_8) → 农民人均纯收入 (X_2) → 人均 GDP (X_1)。

进一步做统计检验，其结果如下（表 7-7）

表 7-7 6 个变量统计检验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18.39020	3.405314	5.400441	0.0000
X1	-8.64E-05	5.18E-05	-1.668131	0.1117
X2	0.000338	0.000174	1.942692	0.0670
X4	1.112118	0.192251	5.784719	0.0000
X5	-0.303759	0.062351	-4.871741	0.0001
X8	0.000341	0.000143	2.379533	0.0280
X11	0.008180	0.003641	2.246560	0.0367
R-squared	0.980164	Mean dependent var	6.242308	
Adjusted R-squared	0.973900	S.D. dependent var	0.583899	
S.E. of regression	0.094332	Akaike info criterion	-1.659189	
Sum squared resid	0.169072	Schwarz criterion	-1.320471	
Log likelihood	28.56946	F-statistic	156.4752	
Durbin-Watson stat	1.886515	Prob(F-statistic)	0.000000	

不难看出 R^2 达到 0.9802，说明方程 (5) 有很高的拟合优度，整体统计检验都通过，但个体指标 X_1 其二阶差分不平稳，未通过 t 检验，所以它不是解释贫困线的最佳变量。

残差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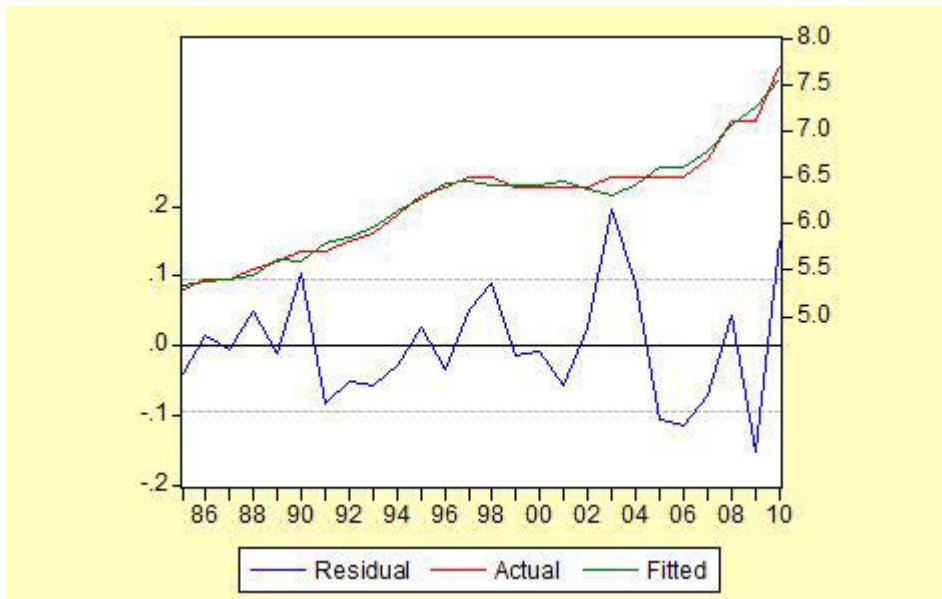


图 7-1 6 个变量残差图

由上图可以看出：数据拟合较好，残差上下均匀波动。

7.6 回归比较

7.6.1 回归值与真实值的比对

为了进一步观察贫困线模型的拟合精度，我们回归出历年的估计值，看其与真实值的差距（表 7-8）。

表 7-8 历年贫困线的估计值 A

年份	Y	回归值	差值	解释度
1985	206.0	198.3	7.7	96.26%
1986	213.0	207.1	5.9	97.25%
1987	227.0	213.3	13.7	93.98%
1988	236.0	228.9	7.1	96.98%
1989	259.0	261.9	-2.9	101.13%
1990	300.0	275.0	25.0	91.66%
1991	304.0	337.2	-33.2	110.92%
1992	317.0	350.3	-33.3	110.52%
1993	350.0	406.6	-58.6	116.17%
1994	440.0	471.9	-31.9	107.26%
1995	530.0	511.6	18.4	96.52%
1996	580.0	619.7	-39.7	106.84%
1997	640.0	632.9	7.1	98.89%
1998	635.0	620.4	14.6	97.70%
1999	625.0	614.9	10.1	98.38%
2000	625.0	626.7	-1.7	100.26%
2001	630.0	625.9	4.1	99.36%
2002	627.0	614.6	12.4	98.02%
2003	637.0	520.1	116.9	81.65%

2004	668.0	614.9	53.1	92.06%
2005	683.0	711.4	-28.4	104.16%
2006	693.0	759.0	-66.0	109.52%
2007	785.0	868.1	-83.1	110.58%
2008	1196.0	1123.0	73.0	93.90%
2009	1196.0	1479.0	-283.0	123.66%
2010	2300.0	1929.1	370.9	83.87%

资料来源：自己编制。

从表中也看出，模型回归的估计值与实际值的离差较小，最小与实际值仅悬殊 1.7 元，离差较大的几年刚好是大幅调整贫困线的年份。从解释度看，80—90%的有 2 年，90—100 的有 13 年；部分年份解释度超过了 100%，这说明残差项中包含未被解释的因素，其中 100—110%有 6 年，110%以上 5 年。总体解释度 81%以上，这说明回归方程能很好地解释变量对贫困线的影响，拟合精度高。

7.6.2 模型优化

由于反应经济发展维度的人均 GDP (X_1) 二阶差分不平稳，且在统计检验中影响不明显，为了得到更优化的贫困线模型，将该变量剔除。但剔除后农村 CPI 的统计检验也不明显，医疗保健支出更为显著，因此，同时将 CPI 变量也剔除，增加医疗保健支出为自变量，得到检验通过的变量如下的估计结果（表 7-9）。

表 7-9 5 个变量统计检验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15.65870	3.398393	4.607678	0.0002
X2	0.000320	0.000124	2.575369	0.0181
X4	0.992935	0.179182	5.541499	0.0000
X5	-0.239669	0.063090	-3.798852	0.0011
X6	-0.010609	0.003417	-3.104725	0.0056
X8	0.000455	0.000124	3.660267	0.0016

R-squared	0.982695	Mean dependent var	6.242308
Adjusted R-squared	0.978368	S.D. dependent var	0.583899
S.E. of regression	0.085878	Akaike info criterion	-1.872601
Sum squared resid	0.147501	Schwarz criterion	-1.582271
Log likelihood	30.34382	F-statistic	227.1431
Durbin-Watson stat	1.724859	Prob(F-statistic)	0.000000

资料来源：自己编制。

从上表可以看出， R^2 达到 0.9827，方程（8）的拟合优度更高，各统计检验均通过，且 5 个变量均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极为难得。这样贫困线的回归方程进一步优化为：

$$\ln Y = \alpha + \beta_2 X_2 + \beta_4 X_4 + \beta_5 X_5 + \beta_6 X_6 + \beta_8 X_8 + \mu \quad (8)$$

回归得出方程中的各个待定系数，这样贫困线模型就为：

$$\ln Y = 15.6587 + 0.0003X_2 + 0.9929X_4 - 0.2397X_5 - 0.0106X_6 + 0.0005X_8 \quad (9)$$

模型（9）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 1 元，贫困线就要增加 0.0003 个单位；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贫困线就要增加 0.9929 个单位；预期寿命每增长 1 岁，贫困线则下降 0.2397 个单位；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每增加 1 元，贫困线则下降 0.0106 个单位；人均财政支出每增长 1 元，贫困线就要增加 0.0005 个单位。其反对数后得贫困线为：

$$Y = 6316652.8 * 1.000320^{X_2} * 2.699145^{X_4} * 0.786888^{X_5} * 0.989447^{X_6} * 1.000455^{X_8} \quad (10)$$

这样，贫困线影响因素大小的排序变为为：平均受教育年限（ X_4 ）→预期寿命（ X_5 ）→医疗保健支出（ X_6 ）→人均财政支出（ X_8 ）→农民人均纯收入（ X_2 ）。这与田野调查的结果非常吻合。

从下面的残差图（图 7-2）可以看出：残差上下波动更为均匀，数据的拟合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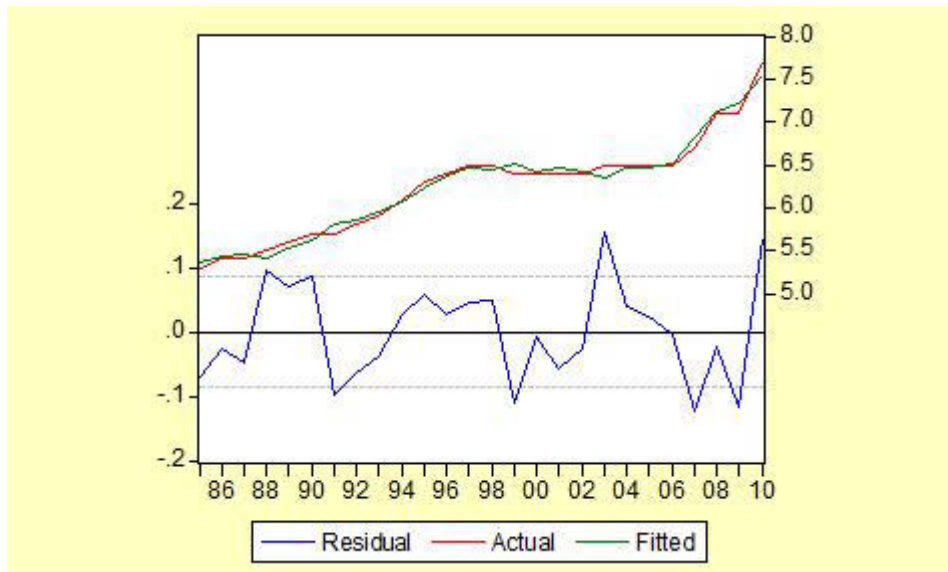


图 7-2 5 个变量残差图

同样回归出历年的贫困线估计值见表 7-10。

表 7-10 历年贫困线的估计值 B

年份	Y	回归值	差值	解释度
1985	206.0	205.4	0.6	99.71%
1986	213.0	217.7	-4.7	102.22%
1987	227.0	223.1	3.9	98.28%
1988	236.0	219.3	16.7	92.93%
1989	259.0	242.4	16.6	93.59%
1990	300.0	279.0	21.0	92.99%
1991	304.0	340.4	-36.4	111.98%
1992	317.0	355.1	-38.1	112.01%
1993	350.0	396.2	-46.2	113.20%
1994	440.0	445.9	-5.9	101.33%
1995	530.0	496.9	33.1	93.76%
1996	580.0	584.6	4.6	100.79%
1997	640.0	636.6	3.4	99.46%

1998	635.0	644.3	-9.3	101.46%
1999	625.0	675.3	-50.3	108.05%
2000	625.0	623.6	1.4	99.78%
2001	630.0	627.2	2.8	99.56%
2002	627.0	643.1	-16.1	102.57%
2003	637.0	544.8	92.2	85.53%
2004	668.0	647.1	20.9	96.87%
2005	683.0	627.3	55.7	91.85%
2006	693.0	679.0	14.0	97.98%
2007	785.0	914.4	-129.4	116.49%
2008	1196.0	1204.6	-8.6	100.72%
2009	1196.0	1423.6	-227.6	119.03%
2010	2300.0	1896.9	403.1	82.47%

资料来源：自己编制。

从上可以看出，在满足统计检验的条件下，剔除人均 GDP 和农村 CPI 影响均不明显的变量后，现在贫困线的回归结果比模型（公式 6）总体更好。解释度也更为优化，达到 82.5% 以上，拟合的精度也更高。这是很难得的结果，几乎可以用模型（公式 9）来实际编制中国农村贫困线。

这样贫困线模型（9）在满足第五章提出的贫困线构成维度和指标的各项要求下，使贫困线的构成维度由 6 个递减为 4 个，其中 3 个为可量化维度（社会认可生活标准、贫困人群需求和国家资源和战略），1 个为柔性维度（国家反贫困维度）作为各国贫困线制定标准高低的检验标杆。对应的分析指标（解释变量）由 11 个缩减为 5 个（见表 7-11），从而使得贫困线的制定更为经济和具有可操作性。

表 7-11 贫困线维度和指标的终选

维度	理论	田野调查	Shapley 结果
经济发展	人均 GDP (x_1)	人均 GDP	
	农民人均纯收入(x_2)	农民人均纯收入	

社会认可生活标准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x_3)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人均拥有的财产	农民人均纯收入
贫困人群需求 (侧重教育、健康和医疗保健3个)	平均受教育年限 (x_4)	平均受教育年限 预期寿命	平均受教育年限
	预期寿命(x_5)	医疗保健支出	预期寿命
	医疗保健支出(x_6)		医疗保健支出
国家资源和战略	人均财政收入(x_7)	人均财政支出	人均财政支出
	人均财政支出(x_8)	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 (x_9)		
	贫困发生率(x_{10})		
物价水平	农村 CPI (x_{11})	农村 CPI	

资料来源：自己编制。

7.7 结果的政策含义

Shapley 方法使贫困线构成维度理论界、实践界和贫困群体三者不同的声音找到了合成一个声音的渠道，并使面对指标的不同争议找到了共同遵循的依据，从而产生了如下的结论：

一、贫困线是存在构成维度并可用其来解释和分析贫困线的

说明前几章对维度的理论和内容的设计是成立的，特别是上一章对具体维度构建和指标的初选具有可行性。

二、从实证的结果看，总体上无论选择最初提出 6 个维度还是模型优化后 4 个维度，都能很好地解释现实中国农村贫困线的制定的标准

如果是不顾及统计检验的显著性的话，贫困线的构成维度可以是最初设计的 6 个维度，用不着将社会认可生活标准维度合并到其他维度中，而且它的支撑指标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无论选择 6 个维度还是 4 个维度都是贫困线可接纳的解释变量。但是 4 个维度模拟的精度更高，这样可作为今后制定贫困线的一种选择。

三、庞大而复杂的贫困线制定工作是可以多元回归模型代替的

也就是说，贫困线可以用模型来编制，而用不着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收集食物篮子和非食物篮子的大量信息，也用不着先计算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直接用本研究在贫困线构成维度的前提下建立的两个模型（公式6和公式9）都可以得出贫困线的数值，而且它们都可以很好地逼近过去中国农村贫困线的真实值，两个贫困线模型的最低解释度都在81%以上，解释度和模型拟合精度都很高，这样会极大的提高贫困线的制定效率，减少扶贫瞄准中的时滞问题，为国家节约资源。

四、关于指标筛选的结果，有几个难得的发现

这是本研究最丰富的成果区：（1）剔除指标。本研究通过三次多种统计检验共依次剔除了7个不合理变量，特别让人惊奇的是两个指标：人均GDP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作为普遍公认的反映经济发展的经典指标人均GDP，在做单位根检验的时候就通不过，统计量检验也不显著，并表现为负相关，反复检验了其理论、方法和数据来源及计算都没有问题，即使是在第一个贫困线模型（公式6）中“强行”使用，但他对贫困线的影响程度也排在最后一位。这说明，中国人均GDP的增长对贫困线的影响并不显著，且是负相关。换句话说，它不是解释贫困线的好变量，这是一个难得的发现。同时也再次证明经济增长并不是反贫困的唯一手段，但它引出的几个问题值得思考：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不利于贫困线的提高；是不是这种增长的效应没有很好地传导到贫困人群那里；还是增长之后的分配方式不利于贫困人口都值得深究。

第二个是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在做统计量检验时，因显著性赶不上农民人均纯收入而被剔除，这也与国际通行的消费指标优于收入指标的观点相悖，但却与田野调查的结果高度吻合，贫困人群人认为农民人均纯收入是衡量贫困的第一指标，这说明中国贫困农村持续获取收入的能力不足，加之消费水平低，还不足于进入贫困人群视野。

第三是农村CPI。本来在6维度条件下是贫困线的重要解释变量，影响程度排列第三，并独撑一个维度，但为了提高贫困线模型的拟合精度，剔除人均GDP指标后，反而农村CPI的统计检验显著性不高被同时剔除，但它反而说明农村

CPI 对贫困人口生活消费的物价水平代表性不强的事实，应该尽快编制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消费价格指数（PIP）。

至于其他被剔除的指标，如医疗保健支出（ X_6 ）、人均财政收入（ X_7 ）和转移支付（ X_9 ）三个变量都是二阶单整的非平稳数据，没有满足变量检验被剔除的，同时也说明这几个变量不如该维度的其他变量代表性强。只有医疗保健支出在 4 维度条件下，剔除人均 GDP 指标后，反而重新满足了变量检验被纳入贫困线模型，成为第三位影响贫困线因素的重要指标。

（2）纳入指标。贫困线的优化模型在严格的筛选条件下，只纳入了 5 个指标，即：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寿命、医疗保健支出、人均财政支出、农民人均纯收入。前 2 个指标是国际上分析人类发展和人类贫困指数的常用指标，这样贫困线在支撑指标的国际可比性会显著提高。

五、无论采用哪个贫困线模型，有两个指标都是影响贫困线高低的重要指标，他们是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寿命

在两个贫困线模型中的重要性排序都一致，分别为一、二位，这和田野调查的结果非常吻合，充分说明教育和健康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最大的两项开支和致贫因素，但令人遗憾的至今还没有被纳入贫困线的制定要素中。

六、农民人均纯收入是贫困线的解释变量，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 6 维度条件下排第五位，在 4 维度条件下排最后一位。这就说明，在中国农村贫困不仅仅体现在收入上，还体现在其他多个方面。

8 结论和政策建议

8.1 主要结论

本研究在简单回顾西方贫困线理论和方法的演进的历史逻辑后，对中国现行农村贫困线进行了适应面和不适应面粗线条评价，然后通过理论分析、田野调查资料和使用 Shapley 方法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一、我国现行的农村贫困线“过去可行但现在不合理”

毋庸置疑，这条贫困线在过去的反贫困中发挥了积极和有时代意义的作用，尽管与国际贫困标准有较大的差距，但仍是“过去可行但现在不合理的”的贫困线，需要重新作出调整，这种调整需求从在中国哪些内容是贫困线不可或缺的纳入因素入手，即贫困线到底由哪些维度构成。

二、贫困是多维度的，反映贫困者需求的贫困线也应该是多维度的

贫困的多维度应成为认识贫困的基本共识，但贫困维度 \neq 贫困线的维度。研究贫困维度目的在于找到诱发和导致贫困的原因，以便更准确地瞄准贫困人口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分类救助措施。而研究贫困线的构成维度的目的是搞清楚哪些是贫困线制定中不可忽略的因素，哪些因素左右着政策制定者对最终贫困线的高低选择，乃至不得不做出取舍。很明显，大多数贫困维度不可能都成为贫困线的构成维度，但它们可以为分析贫困线的构成维度提供参考基础，特别是多维贫困的思想和分析方法值得借鉴。因为贫困线关注的生活水准，即什么样的生活是穷人应该享有的。而多维贫困关注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贫困。

三、制定贫困线不能看成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本质上是如何处理发展方式的问题

发展问题并一直成为发展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关注的持久主题。所以我们应该从更高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如何发展一直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长期思考并艰难探索的问题，以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来看，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从这个视角看贫困线的制定就变成了一场公平与效率的抉择问题。事实上二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最佳的选择是“效率与公平兼顾”，其关键点在于我们到底

愿意以多少效率为代价去换取更多的公平。所以，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平衡是制定贫困线的哲学基础。除此之外，还要考虑理论基础、可比性、成本与效益、主体参与性和调整的机制体制等问题

四、贫困线的构成维度是客观存在、可构建并能够转化为实际政策的

研究中使用了专家认定法、基于权利法和参与式选择法并结合田野调查贫困人群的真实需求，初选出贫困线构成的五个维度：经济发展、贫困人群需求（侧重教育、健康和医疗保健 3 个层面）国家资源和战略、物价水平和国际反贫困。最后用 Shapley 方法实证的结果是：如果不顾及统计检验的显著性的话，贫困线的构成维度可以是最初设计的 6 个维度，即用不着将社会认可生活标准维度合并到其他维度中，但是在满足了统计量检验的条件下 4 个维度模拟的精度更高，这样可作为今后制定贫困线的一种方案。

五、维度不是越多越好

本研究证明 6 维度的贫困线模型的拟合精度并不优于 4 维度条件下的贫困线模型，若采用 4 维度的模型来制定贫困线，这将使得一贯复杂和庞大的贫困线制定的系统工程，变成一个统计人员在家就可以完成的工作。贫困线的制定、发布、执行和监测工作就会经常化，反贫困资源的筹措和投入也就会更加及时，这将大大提高贫困线的制定效率。

六、解释指标的几个实证新结果

人均 GDP 并不是解释贫困线的好变量，这也说明经济增长是减贫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原因是首先要考量这种增长是否是益贫式的增长；二是这种增长的结果是如何传递到贫困人群哪里的，即分配方式是否采取了有利于贫困人群的方式；三是增长中贫困人群的所得份额和增长速度是否快于一般公众，否则，这种增长不但对贫困人群不利，还会扩大已有的收入差距，使已经是穷的人更穷，并制造出更多的穷人，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更大。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显著性赶不上农民人均纯收入而被剔除，这也与国际通行的消费指标优于收入指标的观点相悖，这说明中国农村贫困是收入依赖型，而不是西方国家常见的消费依赖型。这与田野调查的结果高度吻合，贫困

人群认为农民人均纯收入是衡量贫困的第一指标，中国应继续坚持将收入指标而不是西方乐推的消费指标作为贫困线制定的主体指标，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

农村 CPI 并非对农村贫困线产生深刻影响，所以，应该尽快编制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消费价格指数（PIP）取代前者。无论采用哪个贫困线模型，有两个指标都是影响贫困线高低的重要指标，他们是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寿命，且重要性排序都一致，分别为一、二位，这和田野调查的结果非常吻合，教育和健康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最大的两项开支和致贫因素，但令人遗憾的至今还没有被纳入贫困线的制定要素中。

七、更新贫困线制定的理念和思维模式

贫困线解决的不仅仅是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而是解决贫困人群的发展问题，应把人的优先发展作为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石。

8.2 政策建议

8.2.1 优化贫困线的三个立足点

一、理念创新：将包括穷人在内的人的优先发展作为贫困线制定的指针

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给我们这样的警醒：一个富裕和文明的社会应该提供社会所有人维持最正常的生活所需的收入，让父母的不幸遭遇不论应得与否，都不会传递到子女的身上。

我们要从人类发展的大背景下来思考和设计贫困线制定的思维模式和制度基础。深刻秉承“发展是人的优先发展”的理念，所有的发展战略、政策和制度、计划和规划都应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把人的优先发展作为其设计、制定、推行和评价的出发点和归宿。尊重包括穷人在内所有人的发展、促进人的发展和为人的发展提供机会，真正转变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方式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把是否促进人的发展和怎样促进人的发展成为一切发展政策的检验标准。

改变就贫困线制定贫困线的思维模式。贫困线制定不是简单几个数据大小和救济标准高低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一个经济问题和道义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多个层面的问题，是以人为中心的问题，说到底最终是一个发

展的问题。它应该将人置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人的发展，特别是贫困人群的发展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中应给以多大的关注和份额，我们应该尊重贫困人群的哪些需求，满足他们哪些社会认可最低生活标准等等，这些问题应该置于国家或地区层面大的发展战略、长期规划和计划中，才能为和谐、文明的小康社会提供制度基础。

人的优先发展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将促进人的发展置于一切发展的优先位置；二是一切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追求以人为本；三是包括贫困人群在内的所有人的发展和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检验是否达到人的优先发展的基本标准。

二、方法创新：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贫困线制定的方法体系

如前所述，中国农村贫困线是以绝对贫困为理论基础，采用马丁法制定的，“引进”的成分较重。要不要继续引进，回答是肯定，中国改革开放 30 余年的主要成就就是靠引进，同时制定贫困线的方法在西方研究和实践的成果都较为成熟，但长期以来，这与中国在世界反贫困阵营中的地位和分量不相称。中国的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贫困线的探索阶段也到了应该画句号的时候了，30 多年的反贫困历程和为世界反贫困所树立的旗帜，除了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之外，持续不断地制定和调整贫困线也功不可没。所以，中国反贫困进入了向世界贡献知识、经验技术的阶段，贫困线的制定自然不应该被排除在外。同时中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饮食习惯差异较大，加之南北气候差别和东西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方面的因素，也迫切需要改变一条线通全国的做法，到了因地制宜地制定贫困线的时候了。再加之中国贫困人口分布已经由集中化向大分散、小聚群的趋势发展，贫困线的瞄准机制也应随之作出调整。所以，系统总结和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制定贫困线的方法体系，应该被提到新的议事日程上，并纳入扶贫发展纲要中。

如何构建呢？班恩与艾尔伍德在 1986 提出的一套贫困研究的经验分析架构很值得借鉴，他已被今天的西方学者普遍采用。这套构架的具体内容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创新研究分析单位与分析取向。除了采用贯时性数据与存活分析技术探讨动态贫困问题外，他们还采用新的分析单位——贫困时段（poverty spell），

成为后来动态贫困研究中广泛运用的分析单位。二是建立经验分析的概念架构模型。他们将影响的因素归纳成两种生命事件——人口事件（家庭需求）与收入事件（盈利能力）。这一经验分析架构成为后来动态贫困研究最广泛运用的概念架构，而这也带动了一些欧洲学者将生命进程(life course)理论运用于动态贫困分析上^①。

中国贫困线的方法体系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但这四个层面的内容是应该重点考虑的：首先以绝对还是相对以及多种方法为主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其次，瞄准目标是短期贫困还是长期贫困；三是贫困线制定的主体问题，贫困线的制定永远是政府行为，还是应该倾听和尊重穷人的声音；四是贫困线的制定和调整的机制问题。

三、制度创新：从政策提升为制度

贫困线不应该同它的名称一样只是一条线，它从十七世纪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济贫法》（1601年）产生以来，从来就是一项维护公民基本生存权的制度。这项制度从立法开始包括贫困线制定方案的设计、测算、预算编制、议会讨论、资金的筹集与管理、信息的收集与检测、政策的发布与实施和运行与管理及监督机制等一系列的内容，可以说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国的农村贫困线从1986年第一条贫困线诞生至今也不过27年的时间，与英国的济贫法自1601年颁布至1948年废除，历经300多年的时间，几乎贯穿了英国自传统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国的全过程相比，可以说只是历史的瞬间。但我们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学习和借鉴这些成功的经验，少走弯路，从现在的贫困线政策提升为国家层面的一项基本国策。

尽管建立贫困线制度中国还有很多路要走，但这个方向是必然的。这制度在目前还没有制定和颁布扶贫法或反贫困法的条件下，可以将以下因素纳入新贫困线的制定和优化中：明确制定的主体、制定的依据、制定的方法与程序、资金的来源与管理、发布与调整机制、组织和服务体系、监督和评估等主要内容，并设计出这些政策的优先顺序，逐一推进。

^① 江山. 国外动态贫困研究的发展与述评 [J]. 兰州学刊, 2009(03): 139.

当前来讲，最重要的是将建立新的贫困线制度置于中国反贫困各项政策的优先序中。首先是对现有的贫困线制定进行系统回顾和总结，提出调整优化的思路，重新设计、定位和扩展现有贫困线职能。长期目标应该是从修修补补的项目设计转变为向脆弱人口和脆弱家庭提供支持的“制度”，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参与到发展进程中来，分享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成为中国复兴之路的一支重要力量。

8.2.2 具体政策建议

一、贫困线制定主体重心下移

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步伐加快，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各省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增强，各省内部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和生活结构差异也进一步扩大，物价水平和购买力差别也进一步扩大，在此背景下，全国只用一个贫困标准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制定区域性（东、中、西）、分省和地方贫困线，以准确识别贫困户和贫困人口。

二、把相对贫困线作为中国贫困线制定的有益补充

尽管本研究的数量模型有很好的拟合精度，但西方主导的相对贫困线方法在使用中更为简单。中国在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无法获得住房、教育、医疗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是因为贫困是一个社会现象，贫困的本质属性在于其社会性（贫困主要与社会相关，而非与个人相关）。鉴于社会性是贫困的本质属性，从相对贫困或者主观贫困的角度设定贫困线对贫困问题进行研究更为科学合理。

三、把国际贫困线作为农村反贫困的最低标准

国际贫困线是全球反贫困的底线，现在执行的一天 1.25 美元的标准，它是最穷的 15 个国家贫困识别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从国家现有的财力和提高中国农村反贫困的质量及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应设定贫困线提高的目标系：将此标准作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而将一天 2 美元作为农村贫困线的最低标准，一天 2.5 美元作为目标。

四、应用多维贫困的思想，把教育、医疗、社会最低保障纳入新贫困线

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这三个因素是影响贫困线最重要的因素，在 4 维度条件下成为贫困线解释变量的头三位，而且同时纳入这三个变量后对贫困线的拟合精度显著提高。换句话说，这三个因素是影响中国农村贫困线的核心变量，至关重要。再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社会主义初级的长期性决定了农村贫困将长期存在。随着绝大部分极端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解决，今后扶贫的目标应强调提高贫困人口的生存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因此，在制定新贫困标准时，要适当考虑非食品需求的重要性。因为只有穷人在教育、医疗、交通及社会服务方面支出的增加，其生存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才能从根本上得以提高，才不容易返贫。

五、回归以家庭为主导单位的贫困线瞄准机制

为何要强调这一方面，有几个相关的原因：一是田野调查的结果，贫困户、非贫困户和扶贫管理者三方均认为家庭是贫困度量的最好单位。第二是农村消费支出模式决定的，中国农村的消费基本上是以家庭来计划和安排预算及支出的，个人的消费是服从并依赖于家庭消费有剩余的前提下做出的。三是庞大且日益增长的劳动力流动规模已经弱化了专门基于地区的扶贫项目的承诺。随着迁移前景的更加看好，投资于人（那些流动性日益增强的人）而不是投资于他们来源的地区已经变得更加重要。所以，用面向家庭的扶贫方法和干预来取代传统的面向地区的扶贫计划，应成为中国农村未来反贫困的转折点。

8.3 局限性和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尽管我想强调本文使用的方法和贫困线构成维度的优点，但认为不应该把本次研究看作是决定性的。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能否通过一个简单而实用的途径来确定贫困线。本文采用的是维度构成的多元分析和 Shapley 方法，得到的贫困线两个模型与中国农村现行的农村贫困线有很高的拟合精度，但是否还有比这更简单的方法，需要另作研究。

本研究的 6 个维度，特别是减至 4 个维度时有更好的拟合精度，是否存在比这还好的贫困线构成维度，值得进一步探讨。

田野调查得到的贫困人群的需求指标与本文最终的研究结果有很高的吻合性，限于时间和经费的困惑，样本量不够大，但进一步扩充样本之后是否也保持这样的吻合度需要另外的研究予以验证。

有些因素由于数据获取的困难在研究中未加以考虑，例如资产、儿童入学率、购买保险的数量、家庭规模和返贫率，若纳入这些因素一同分析后，是否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分析变量也需要进一步验证。

附录

1. 《中国农村贫困线的适应性调查》问卷 A

(扶贫管理部门和非贫困者使用)

问卷编号:

收回序号:

尊敬的受访者:

您好!我是云南财经大学的课题调查员,目前正在进行《中国农村贫困线的适应性调查》。目的在于了解人们对当前贫困测量指标的看法和意见,以便更好地促进 2011~2020 扶贫新阶段对贫困者识别精度的提高和优化反贫困政策。本次调查采用无记名方式,您的回答无所谓对错,只要真实地反映了您的情况和看法,就达到了这次调查的目的。我们承诺调查结果仅供课题统计分析之用,对您提供的任何信息我们都会严格保密,请您真实作答,不必有任何顾虑。调查要耽搁您一些时间,请您谅解。谢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请您在以下的选项中选出您认为合适的答案,并在选项前面的□内打“√”。

1. 在测量农村贫困的指标中,现使用的主要是收入指标,假设用消费水平作为衡量贫困的指标,并用“生活消费支出”作为具体指标,您认为,较好的观察对象(计量单位)是:

贫困县 贫困村 贫困户 贫困个人

2. 假设用消费支出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指标,那么在贫困户的日常生活消费支出中,最大的五项支出依次是(将序号 1 最大→2→3→4→5 填入□内):

食品支出 衣着支出 居住支出 家庭设备支出

- 通讯支出 交通支出 教育支出 医疗保健支出
社交（人情费）支出 娱乐支出 其他支出

3. 假设用资产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指标，您认为以下哪个方面是应该首先考虑的：

- 人均住房面积 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① 生产性固定资产^②
存款和现金 人均耕地面积 牲畜数量

4. 假设用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指标，您认为哪一个指标是首选：

-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的年限 家庭教育支出额/年
儿童在校率 政府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5. 在受教育程度中，您认为脱贫者应该完成哪个阶段的教育，才能使贫困的状况有所缓解：

- 学前教育 小学 初中 高中（或职高） 中专 大专及以上

6. 在初中毕业以后，您认为选择以下哪种方式的继续学习对脱贫最有帮助：

- 技校 中专 职业高中 高中 短期培训
其他_____（请注明）

7. 在贵县的扶贫过程中，您认为教育支出占扶贫资金的支出状况是：

- 大 较大 一般 不大 极少

8. 假设用健康状况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指标，您认为应该用以下哪个指标较为恰当：

- 健康人数 医疗费用支出 劳动力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

^① 家庭耐用消费品包括大型家具、家庭设备等。如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电话、手机、电视等。

^② 生产性固定资产如用于生产的房屋、汽车、大型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三轮车、胶轮大车和其他农机具等。

其他_____（请注明）

9. 从健康角度看下列哪三种情况对一个人陷入贫困影响较大：

残疾 患有大病 长期慢性病 体弱多病 健康

10. 现在农村有病不能及时就医的原因主要是：

经济困难 医院太远 没有时间 本人不重视 小病不用医
其他

11. 假设用社会保障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指标，您认为应该选择以下哪个方面：

社会保险 社会救济 社会福利 优抚安置
农村合作医疗

12. 如果现有的社会保障不完善，您认为以下哪些社会保障是政府应该首先完善的：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购买商业保险
其他_____（请注明）

13. 您认为个人能力对贫困的影响程度有多大：

大 较大 一般 不大 极小

14. 您认为以下哪些个人能力对贫困者的状况有影响：

改变其生存状况的能力 抵御各种生产或生活风险的能力
抓住经济机会的能力 获取经济收益的能力
人际关系处理能力 勤劳能力

15. 您认为以下哪个选项最能改善贫困者的状况：

改变其生存状况的能力 抵御各种生产或生活风险的能力
抓住经济机会的能力 获取经济收益的能力
人际关系处理能力 勤劳能力

16. 您认为性别在反贫困中的影响程度：

大 较大 一般 不大 极小

17. 您认为家庭子女的性别结构，对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程度的影响：

大 较大 一般 不大 极小

18. 总结以上问题，在下列测量农村贫困的指标中，请您勾选出最重要的3个：

收入 消费 资产 教育 健康 社会保障

个人能力 性别 其他_____（请注明）

19. 在贵扶贫部门中，您们主要是用以下哪些指标来测量农村贫困的：

家庭总收入 人均纯收入 人均消费支出

其他指标_____（请注明）

20. 现使用的贫困线（人均2300元/年）是否反映了贫困者的最低需求：

是 没有 不清楚

21. 若要制定新的农村贫困线除收入水平以外还应该将下列哪些因素纳入：

消费水平 资产状况 教育费用支出 健康状况

社会保障程度 性别因素 地区经济初始水平

22. 您认为贫困最显著的特征是：

多元化的 单一性的 不清楚

23. 您认为在以下的扶贫项目中，哪三项是政府应该优先考虑的：

种植业 林业 养殖业 农产品加工业 基本农业建设

修建及改扩建道路 电力设施 技术培训

24. 您认为现有的贫困监测指标是否能很好地反映了扶贫的绩效：

好 较好 一般 不好 非常不好

25. 您认为现有的贫困监测手段是否能有效地满足扶贫的需要：

好 较好 一般 不好 非常不好

谢谢合作！

《中国农村贫困线的适应性调查》课题组

2012年7月

2. 《中国农村贫困线的适应性调查》问卷B

(贫困农户用)

问卷编号:

收回序号:

尊敬的受访者:

您好!我是云南财经大学的课题调查员,目前正在进行《中国农村贫困线的适应性调查》。目的在于了解人们对当前贫困测量指标的看法和意见,以便更好地促进2011~2020扶贫新阶段对贫困者识别精度的提高和优化反贫困政策。本次调查采用无记名方式,您的回答无所谓对错,只要真实地反映了您的情况和看法,就达到了这次调查的目的。我们承诺调查结果仅供课题统计分析之用,对您提供的任何信息我们都会严格保密,请您真实作答,不必有任何顾虑。调查要耽搁您一些时间,请您谅解。谢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请您回答以下问题,然后由调查员在选项前面的□内打“√”。

一、受访户基本情况

受访者性别_____；年龄_____；教育程度_____；
家庭人数_____；劳动力人数_____；无劳动能力人数_____；
上学人数_____。

二、访问问题

1.您认为以下哪些因素是导致贫困发生的原因:

收入低下 资产匮乏 受教育年限少 健康状况差
社会保障程度低 个人致富能力弱

2.您认为在你们村至少每年要有多少的人均纯收入才能维持一个人的正常生活:

不低于1196元 不低于2300元 不低于3000 不低于3500

4000 以上 不低于_____（自己估计数）

3.您家在 2011 年的人均纯收入是否处于贫困线以下（即低于国家规定贫困线 2300 元/年）:

是 否

4.您家在过去三年内人均年纯收入处于以下哪个水平:

不高于 785 元 不高于 1087 元 不高于 1196 元
不高于 2300 元 高于 2500 元

5.您认为以下哪些方面的改善有助于缓解农村贫困的发生:

市场参与程度 社会发展平衡程度 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
社会保障 其他_____（请注明）

6.您是否得到过扶贫资金（或项目）的资助:

是 否

7.如果您得到过扶贫资金的资助，那么以下哪些资助是您得到过的:

无偿扶贫款 退耕还林补贴 低保金 种粮补贴
救灾救济 其他_____（请注明）

8.您们村里面有没有扶贫项目:

有 没有

9.如果有扶贫项目的支持，请问是以下哪些项目:

小型水利工程 乡村道路建设 村文化站 卫生所
小学建设 其他_____（请注明）

10.您认为当前的扶贫项目是否能有效地改善了您的贫困状况:

能 较能 一般 不能 非常不能

11.您是否申请过扶贫贷款:

是 否

12.您认为您申请到的扶贫贷款的金额是否理想:

理想 较理想 一般 不理想 非常不理想

13.您认为扶贫贷款对家里脱贫的影响程度怎么样:

大 较大 一般 不大 极小

14.您家里是否有外出打工人员:

有 没有

15.一般外出打工的时间是多长:

1个月 3个月 6个月 1年 1年以上

16.您认为外出打工人员对家庭贫困状况的改善有多大:

大 较大 一般 不大 极小

17.您认为在您们村以下哪三项基础设施是最需要解决的:

供电 通讯 交通 饮用水 炊事用燃料

18.您认为家庭中最大的五项支出依次是(将序号 1 最大→2→3→4→5 填入□内):

食品支出 衣着支出 居住支出 家庭设备支出
通讯支出 交通支出 教育支出 医疗保健支出
社交(人情费)支出 娱乐支出 其他支出

19.您认为哪一个数据,最能反映农户的贫困状况:

人均纯收入 人均消费 人均受教育年限 人均拥有的财产

20.现使用的贫困线（人均纯收入 2300 元/年）是否反映了贫困者的最低需求：

是 没有 不清楚 21.若要制定新的农村贫困线应该将下列哪些因素纳入：

素纳入：

收入水平 消费水平 资产状况 教育费用支出

健康状况 社会保障程度 性别因素 地区经济初始水平

谢谢合作！

《中国农村贫困线的适应性调查》课题组

2012 年 7 月

参考文献

- [1] Alcock Pete. Understanding Poverty [M]. Palgrave Macmillan, 1993.
- [2] Atkinson Anthony B. Measurement of Poverty and Differences in Family Composition [J]. *Econometrica*, 1992, 59:1-16.
- [3] Atkinson Anthony B. On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J]. *Econometrica*, 1987, 55:749-764.
- [4] B. Seebohm Rowntree. Poverty: A Study of a Town [M]. Life. Bristol: policy Press, 2000.
- [5] Bernard M.S. Van Praag, Jan S. Spit, and Huib van de Stadt.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Food Ratio Poverty Line and the Leyden Poverty Line [J].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1982, (03):691-694.
- [6] Bernard Van Praag, Theo Goedhart, and Arie Kapteyn. The Poverty Line——A Pilot Survey in Europe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0, 62 (03) : 461-465.
- [7] Björn Gustafsson. Assessing povert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literature [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995, (08): 363-381.
- [8] Bourguignon, Francois. The Measurement of Household Welfa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9] Brian Nolan, Christopher T. Whelan. Poverty and deprivation in Europe [M].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10] By Aldi J. M. Hagenaars and Bernard M. S. Van Praag. A Synthesis of Poverty Line Definitions [J]. *Rev. Income Wealth*, 1985, 31 (02) : 139-154.
- [11] Chen Shaohua and Martin Ravallion. China is Poorer than We Thought, But No Less Successful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621, World Bank, 2008.
- [12] Chen Shaohua and Martin Ravallion. How Have the World's Poorest Fared since the Early 1980s [R]. Discussion Paper WPS3341, World Bank, 2004.
- [13] Christopher Deeming. Minimum income Standards: How Might Budget Standards be Set for the UK? [J].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005, 34(04): 619-636.
- [14] D. Jayaraj, S. Subramanian. Poverty, inequality, and population: essays in development and applied measurement [M]. Oxfor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5] Datt, G. Computational tools for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R].FCND Discussion Paper, 1998.
- [16] Foster J,Greer J, and Thorbecke E. A Class of Decomposable Poverty Measures [J]. *Econometrica*, 1984, 52 (03) : 761-766 .
- [17] Foster, James E. On economic poverty: a survey of aggregate measures[J]. *Advances in Econometrics*, 1984, 3: 215-251.
- [18] Gillie,Alan. The Origin of the Poverty Line[J].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96, 49(04):715-730.
- [19] Hagenaars, Aldi J.M et al. A Synthesis of Poverty Line Definition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1985, 31(02):139-154.
- [20] Juzhong Zhuang.Poverty, Inequality, and Inclusive Growth in Asia: Measurement, Policy Issues, and Country Studies. [M] London: Anthem Press, 2010.
- [21] Kristian Niemietz. A New Understanding of poverty: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M].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2011.
- [22] Lines, Thomas. Making poverty : a history[M]. London ; New York : Zed Books ; New York : Distributed in the USA by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 [23] Martin Ravallion. Testing Poverty Lines [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06,52(03): 399-421.
- [24] Niemietz, Kristian. A new understanding of poverty :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M].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2011.
- [25] OECD. Public Expenditure on Income Maintenance Programmes [J].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s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76:69.
- [26] Orshansky M. Counting the Poor: Another Look at the Poverty Profile [J].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1965, 28(01): 3-29.
- [27] Peter Alcock. Understanding poverty [M]. Basingstoke, England : Palgrave, c1997.
- [28] Peter L. Poverty and Houshold Size [J]. *Economic Journal*, 1995(05).
- [29] Ravallion M and Chen S. Measuring pro-poor growth [J]. *Economic Letters*, 2003, 78(01).
- [30] Ravallion M. Poverty Comparisons [M].London: academic publishers, 1994.
- [31] Ravallion Martin, Lokshin Michael .Testing Poverty Lines [J]. *Review of Income & Wealth*, 2006, 52(3): 399-421.

- [32] Ravallion Martin. Poverty Lin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R]. LSMS Working Paper, Number 133.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1998.
- [33] Satya Paul. A Model of Constructing The Poverty Line [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9,(30):129-144.
- [34] Sen Amartya K. On Economic Inequality[M].2nd edu,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35] Sen. Amartya. Inequality Reexamined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36] Son H. A New Poverty Decomposition[C].Working paper, 2003.
- [37] Sudhir Anand, Paul Segal, Joseph E. Stiglitz .Debates on the measurement of global poverty . Oxford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38] Theo Goedhar,Victor Halberstadt, Arie Kapteyn and Bernard van Praa.The Poverty Line: Concept and Measurement[J].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76(12): 503-520.
- [39] Thomas Lines. Making poverty: a history[M]. London ; New York : Zed Books ; New York : Distributed in the USA by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 [40] Thorbecke, 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Conceptual and Measurement Issues [C]//The Many Dimensions of Poverty.London : Palgrave-Macmillan, 2008: 3-19.
- [41] Tony Addison, David Hulme, and Ravi Kanbur.Poverty dynamics: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M]. Oxfor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42] Townsend Peter. Measures and Explanations of Poverty in High Income and Low Income Countries: The Problems of Operationalizing the Concepts of Development, Class and Poverty. In Townsend P. ed.,The Concept of PovertyM[.].London:Heinemann,1970.
- [43] Townsend Peter. Measuring Poverty [J].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4,5(2): 130-136.
- [44] Townsend Peter.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M]. 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 [45] Townsend Peter. The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Poverty[M].New York: Harvestter,1993.
- [46] Townsend. Poverty in th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House-hold Resource and Living Standard [M] . Allen Lane and Pengu in Books, 1979.
- [47] Townsend Peter. The Meaning of Poverty [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2,13(03): 210-236.

- [48] Wahidul K,Biswas, Paul Bryce, Mark Diesendorf, Model for empowering rural poor through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in Bangladesh.Environmental Science &Policy, 2001, 4(06):333-344.
- [49] Watts H. An Economic Definition of Poverty [M] .in Daniel P Moynihan(Ed),New York: Basics Books, 1968.
- [50]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0[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51] World Bank. China: Strategies for Reducing Poverty in the 1990s [R].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1992.
- [52] World Bank. Health, Nutrition, Population (HNP) and Poverty at the World Bank: A Summary of Knowledge Gen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Activities[C], 2000.
- [53] [印]阿玛蒂亚·森. 生活水准[M]. 徐大建, 译.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 [54] [印]阿玛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 任贇, 于真,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 [55] [印]阿玛蒂亚·森. 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M]. 王利文, 于占杰,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56] [印]阿玛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M]. 王宇, 王文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57] [美]阿瑟·奥肯. 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0.
- [58] 安树伟. 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症结与出路[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9.
- [59] (英) 安东尼·B·阿特金森, (法) 弗兰科伊斯·布吉尼. 收入分配经济学手册 [K] . 蔡继明等, 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 [60] 程丹峰. 中国反贫困——经济分析与机制设计[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 [61] 冈纳·缪尔达尔. 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M].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1.
- [62]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 走出贫困的选择丛书[M]. 北京: 改革出版社 1990—1992.
- [63]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外贫困研究文献译丛第一册[M]. 北京: 改革出版社, 1993.
- [64] 亨利·乔治. 进步与贫困[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65] 黄承伟. 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实践与思考[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 [66] I·盖托碧、K·山姆斯. 有效地摆脱贫困[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6.

- [67] 康晓光. 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
- [68] [美]克里斯托弗·贝里. 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M]. 江红,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69] 刘坚主编. 新阶段扶贫开发的成就与挑战——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期评估报告[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 [70] 刘义安. 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 ——美国、瑞典模式的比较与借鉴[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
- [71] [法]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 [72] [美]马丁·瑞沃林. 贫困的比较[M]. 赵俊超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73] 彭华民. 社会福利与需要满足[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153.
- [74] [英]萨比娜·阿尔基尔. 贫困的缺失维度[M]. 刘民权, 韩华为,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 [75] 萨米尔·阿明. 不平等的发展[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 [76] [美]萨米尔森, 若德豪斯. 萨米尔森谈效率、公平与混合经济[M]. 萧琛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77] [英]萨比娜·阿尔基尔. 贫困的缺失维度[M]. 刘民权, 韩华为,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 [78] 2000, 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编写组. 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 [79] 谭诗斌. 现代贫困学导论[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2.
- [80] UNDP. 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国家的真正财富: 人类发展进程[M]. UN Plaza, New York, NY10017, USA. 2010, <http://hdr.undp.org>, 85-86.
- [81] 王碧玉. 中国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
- [82] 王小林. 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83] [美]威尔逊. 真正的穷人: 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M]. 成伯清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84] [美]西奥多·W·舒尔茨. 论人力资本投资[M]. 北京:北京经济出版社, 1990.
- [85] 谢和平. 反贫困与国际区域合作[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

- [86] 伊恩·莫法特. 可持续发展——原则、分析和政策[M]. 宋国君,译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 [87] 约翰·伊特韦尔、默里·密尔盖特、彼得·纽曼.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 K-P[K].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 [88] 张建华. 贫困测度与政策评估——基于中国转型时期城镇贫困问题的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 [89] 张岩松. 发展与中国农村反贫困[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 [90] 赵曦. 我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战略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91] 赵昌文. 贫困地区可持续扶贫开发战略模式及管理系统研究[M].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 [92] 赵俊臣. 中国扶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M].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1997.
- [93] 周彬彬. 向贫困挑战[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94] 中国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K].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0、2000、2010、2011.
- [95] 中国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K].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0-2011.
- [96] 中国统计局. 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K].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0-2012.
- [97] 中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 中国教育年鉴[K].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2011.
- [98] 中国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K].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2011.
- [99] 中国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1949-2008) [G].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 [100] 中国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农业部. 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数据汇编 (1986-1999) [G].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1.
- [101] 中国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00-2012[R].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0-2012.
- [102] 中国统计局. 中国发展报告[R].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2012.
- [103] 云南统计局. 云南统计年鉴 (1998-2012) [K].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2012.
- [104] [印]阿马蒂亚·森. 论社会排斥[J]. 王燕燕,摘译.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5, (03): 1-7.

- [105] Björn Gustafsson, 魏 众. 为什么中国农村人口贫富不同?[J]. 世界经济文汇, 2002, (03):3-13.
- [106] (荷兰) 伯纳·范·普拉格等. 贫困线的定义及其计量方法[J]. 罗国梁, 译. 外国经济与管理, 1983, (06):31-35.
- [107] 陈 明, 张莉娜, 董长征, 唐立健, 秦小岸, 沈其君.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贫困线的测算[J]. 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2009, (21):2465-2467.
- [108] 陈见影, 王 哲. 新疆扶贫重点县贫困线确定[J]. 新疆农垦经济, 2008, (02):63-65.
- [109] 陈立中、张建华. 中国转型时期城镇贫困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南方经济, 2006, (08):55-67.
- [110] 池振合, 杨宜勇. 贫困线研究综述[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2, (07):56-64.
- [111] 曹扶生, 武前波. 国外城市反贫困理论研究综述[J]. 城市问题, 2008, (10): 75-80.
- [112] 常 婕. 将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我国贫富标准的适用性研究. 当代经理人(下旬刊), 2006, (07):6.
- [113] 丁萌萌, 卓玛措. 贫困线与我国农村贫困[J]. 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6, (01):20-23.
- [114] 顾 昕. 贫困度量的国际探索与中国贫困线的确定[J]. 天津社会科学, 2011, (01):56-65.
- [115] 郭 宏. 京郊农村贫困线的测定[J]. 北京统计, 1995, (11): 15.
- [116] 郭佩霞. 论民族地区反贫困目标瞄准机制的建构[J]. 贵州社会科学, 2007, (12): 79-82.
- [117] 侯 震. 我国现行农村贫困线问题研究[J]. 黑河学刊, 2007, (01):24-26.
- [118] 黄安年. 战后美国的贫困、贫困结构和贫困线. 史学月刊, 1997, (04):90-98.
- [119] 黄承伟. 贫困程度动态监测模型与方法[J]. 广西社会科学, 2001, (01):62-63.
- [120] 黄大利, 李亚奇. 恩格尔系数法测算居民最低生活费用保障线的局限性[J]. 统计与决策, 1996, (11): 34-35.
- [121] 江 山. 国外动态贫困研究的发展与述评 [J]. 兰州学刊, 2009, (03):138-142.
- [122] 李 博. 贫困线测定问题研究综述[J]. 当代经济, 2008, (02)(上):40-41.

- [123] 李翠锦. 新疆农村贫困的测度及其变动原因分析[J]. 安徽农业科学, 2010, 38(11):5956-5959.
- [124] 李锡明. 新扶贫标准和国际贫困线[J]. 学理论, 2009, (24): 122-123.
- [125] 李 泉、王 茜. 贫困的度量: 贫困线与公理化标准[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0, (01):99-104.
- [126] 李享章. 贫困理论研究概述[J]. 社会科学动态, 1997, (05):27-30.
- [127] 李佳路. 农户资产贫困分析——以 S 省 30 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为例[J]. 农业技术经济, 2011, (04):13-18.
- [128] 李小云等. 参与式贫困指数的开发与验证[J]. 中国农村经济, 2005, (05): 39-45.
- [129] 李小云等. 我国农村贫困状况报告[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04, (01): 1-8.
- [130] 李秀娟. 应制定西部地区农村贫困标准[J]. 中国统计, 2009, (03): 24-26.
- [131] 梁柠欣、陈云嫦. 贫困标准测算的理论与决策实践:以广州市为例[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8, (04):45-51.
- [132] 刘福成. 我国农村居民贫困线的测定 [J]. 农业经济问题, 1998, (05): 52-55.
- [133] 刘建平. 贫困程度测度方法与实证分析 [J]. 济南学报, 2003, (03):53-55.
- [134] 刘祖云, 刘 敏. 香港的贫困及救助:从理论到现实的探讨[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07):72-79.
- [135] 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EB/OL]. [2013-03-11]
<http://www.un.org/zh/millenniumgoals/bkgd.shtml>.
- [136] 罗楚亮. 农村贫困的动态变化[J]. 经济研究, 2010, (05): 123-128.
- [137] 骆祚炎. 对恩格尔系数测定贫困线的思考. 改革与战略, 2006, (02):21-24.
- [138] 马蔚云. 俄罗斯贫困线:基本概念与测定方法[J].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8, (05):26-34.
- [139] 马俊贤. 农村贫困线的划分及扶贫对策研究[J]. 统计研究, 2001, (06):30-34.
- [140] 马骏贤. 湖北农村贫困线及脱贫标准与测算[J]. 统计与决策, 1993, (05): 20-22.
- [141] 马 琼. 阿拉尔地区居民贫困线概算[J]. 塔里木农垦大学学报, 1999, (03):35-37.
- [142] 潘家华, 朱仙丽. 人文发展的基本需要分析及其在国际气候制度设计中的应用——以中国能源与碳排放需要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6, 16(06):23-30.

- [143] 屈锡华,左 齐. 贫困与反贫困——定义、度量与目标[J]. 社会学研究, 1997, (03):104-115.
- [144] 曲大维. 主观贫困线研究述评[J]. 当代经济, 2011, (09)下:166-168.
- [145] 申付亮、朱红菠. 基于购买力平价思想测算地区农村贫困线[J]. 网络财富, 2010, (04):165-167.
- [146] 世界银行. 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 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EB/OL]. (2009-3-21)<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a>.
- [147] (美)舒尔茨. 向穷人投资: 一个经济学家的见解[J].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1965, (11): 12-15.
- [148] 唐 均. 国际确定最低社会保障线方法之研究[J]. 中国民政, 1995, (03): 6.
- [149] 唐 钧. 确定中国城镇贫困线方法的探讨[J]. 社会学研究, 1997, (02): 60-71.
- [150] 唐钧,王婴. 我们往“菜篮子”里装什么[J]. 民政论坛, 1995, (05): 1-6.
- [151] 唐钧. 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 [J]. 江苏社会科学, 2002, (03):41-47.
- [152] 唐运舒,于 彪. 贫困线几种测量方法的实证比较[J]. 当代经济管理, 2009, (05):66-69.
- [153] 田 飞. 用贫困指数测度安徽农村贫困线[J]. 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03):32-36.
- [154] 田飞、张颖. 我国供方贫困线的实证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 2010, 38(31):17842-17844.
- [155] 童星、林闽钢. 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1994, (03):86-98.
- [156] 万广华、张茵. 收入增长与不平等对我国贫困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06, (06):112-123.
- [157] 汪三贵, Albert Park.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估计与瞄准问题[J]. 贵州社会科学, 2010, (02):68-72.
- [158] 汪三贵,王 姮,王萍萍.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的识别[J]. 农业技术经济, 2007, (01):20-31
- [159] 汪三贵. 中国新时期农村扶贫与村级贫困瞄准[J]. 管理世界, 2007, (01):56-64.

- [160] 汪晓文, 马凌云, 李玉洁. 基于 ELES 方法的甘肃农村贫困线测定分析[J].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05):1-6.
- [161] 王增文. 中国农村贫困线及贫困率的测定: 基于拟合收入分布函数法[J]. 西北人口, 2009, (05):1-6.
- [162] 王大超. 关于重新构建我国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的思考 [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2003, (06): 6-9.
- [163] 王萍萍, 闰芳. 农村贫困的影响面、持续性和返贫情况[J]. 调研世界, 2010, (03):5-7.
- [164] 王萍萍, 方湖柳, 李兴平. 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准的比较[J]. 中国农村经济, 2006, (12) 62-68.
- [165] 王萍萍. 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准的比较[J]. 调研世界, 2007, (01): 5—8.
- [166] 王荣党. 农村区域性反贫困度量指标体系的设计与实证——以云南为例. 中国农村经济, 2006, (12):69-76.
- [167] 王荣党. 农村贫困线的测度与优化[J]. 华东经济管理, 2006, (03):42-47.
- [168] 王荣党. 贫困测度的三维度指标优选:主体、客体和尺度[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6, (03): 163-169.
- [169] 王春萍. 当代贫困的测度体系及其经济学涵义分析. 2009, (02):120-123.
- [170] 王建军, 王 臻.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布对新疆城市居民贫困变动的的影响. 新疆财经, 2006, (05):14-17.
- [171] 王小林, Sabina Alkire.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估计和政策含义[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 (12): 4-10+23.
- [172] 王维红, 赵晓康. 论贫困统计指标体系的构建[J]. 上海统计, 2002, (01): 25-28.
- [173] 王振军, 牛叔文. 农民食品消费与最低生活保障的关联[J]. 改革, 2008, (03):93-97.
- [174] 王致萍, 王振军, 马利邦. 甘肃农村贫困线研究.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03): 126-128.
- [175] 王祖祥, 范传强, 何 耀, 张 奎, 王红霞. 农村贫困与极化问题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 (06):73-88.

- [176] 魏后凯, 邬晓霞. 中国的反贫困政策: 评价与展望[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9, (03):56-68.
- [177] 吴国宝. 贫困线建立的理论和方法述评[J]. 经济学动态, 1995, (11):70-74.
- [178] 吴国宝. 调整扶贫标准要考虑哪些因素[J]. 时事报告, 2011, (06):44-45.
- [179] 巫继学, 王建生. 贫困线以下的生活状态是绝对贫困化的社会表现之一[J]. 兰州学刊, 1985, (06):28-32.
- [180] 夏振坤. 贫困问题研究视觉转换的理论综述[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2004, (04):61-65.
- [181] 夏庆杰, 宋丽娜, Simon Appleton. 经济增长与农村反贫困[J]. 经济学(季刊), 2010, (04):852-870.
- [182] 向国春, 朱静秋, 阎正民. 界定贫困的标准研究综述[J]. 中国卫生资源, 2009, (06):262-264.
- [183] 徐万坪. 贫困度量指标[J]. 经济师, 2004, (11):35-37.
- [184] 杨颖. 中国农村反贫困研究的新视野——基于文献视角的评述与展望[J]. 开发研究, 2010, (02):27-33.
- [185] 杨冬民, 韦苇. 贫困理论中若干问题的比较研究及对西部反贫困实践的启示[J]. 经济问题探索, 2005, (01):4-7.
- [186] 杨国涛. 贫困线理论及其在中国农村的实践[J]. 乡镇经济, 2005, (09):5-7.
- [187] 杨颖. 中国农村反贫困研究的新视野——基于文献视角的评述与展望[J]. 开发研究, 2010, (02):27-33.
- [188] 杨立雄. 贫困线计算方法及调整机制比较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0, (05):52-62.
- [189] 杨立雄. 物价波动、收入增长和地区差距.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9, (11):12-18.
- [190] 姚金海. 基于 ELES 方法的贫困线测量[J]. 统计与决策, 2007, (01):115-117.
- [191] 叶初升, 王红霞. 多维贫困及其度研究的最新进展: 问题与方法[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0, (11):5-11.
- [192] 叶初升, 罗连发, 邹欣. 贫困线调整与贫困发生率比较问题研究评析[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1, (05):17-23.
- [193] 余方东. 国际上常用的贫困监测统计方法[J]. 中国统计, 2004, (08):54-55.

- [194] 张宏升, 赵玉. 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的重新检视[J]. 理论探索, 2008, (03): 98-91.
- [195] 张立冬、李岳云、潘辉. 收入流动性与贫困的动态发展: 基于中国农村的经验分析. 农业经济问题, 2009, (06): 73-81.
- [196] 张全红, 张建华. 中国农村贫困变动: 1981-2005——基于不同贫困线标准和指数的对比分析[J]. 统计研究, 2010, (02): 28-35.
- [197] 张全红. 对中国农村贫困线和贫困人口再测算[J]. 农村经济, 2010 (02): 51-54.
- [198] 张全红. 中国农村扶贫资金投入与贫困减少的经验分析[J]. 经济评论, 2010, (02): 42-50.
- [199] 张全红, 张建华. 中国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变动: 1981—2001——基于城乡统一框架的分析[J]. 经济科学, 2007, (04): 15-24.
- [200] 张艳涛, 白云涛, 韩国栋. 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来测算贫困线[J]. 市场周刊(理论研究), 2007, (11): 143-144.
- [201] 詹姆斯·亚当斯, 杜大伟, 尼赫鲁, 戴高, 曹书. 中国贫困状况评估(节选)[J]. 老区建设, 2009, (11): 12.
- [202] 赵冬缓, 兰徐民. 我国测贫指标体系及其量化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1994, (03): 45-49.
- [203]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课题组. 世界各国贫困标准研究[R]. 2010, (01) 1-21.
- [204] 中国统计局农调总队.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研究 [J]. 统计研究, 1990, (06): 37-42.
- [205] 周金城. 谈谈如何确定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费用标准[J]. 中国统计, 1988, (07): 27—29.
- [206] 朱晶, 王军英. 物价变化、贫困度量与我国农村贫困线调整方法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10, (03): 22-31.